

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

巴盐 与盐巴

三峡古代盐业

白九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白九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7
(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王川平主编)
ISBN 978-7-5366-8948-0

I.巴... II.白... III.盐业史—研究—四川省—古代 IV.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758 号

(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

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

BAYAN YU YANBA——SANXIA GUDAI YANYE

白九江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卢军 孙华
责任编辑:饶亚
责任校对:郑小石
装帧设计: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 7.75 字数 169 千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8948-0

定价:15.7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三峡古代历史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成员：罗小卫 王川平 马岱良 孙 华
刘豫川 周永健 卢 军 刘 嘉
魏光飏 白九江 柳春鸣 汤羽杨
杨小刚 袁东山 黄晓东

编委会主任：罗小卫

副 主 任：王川平 马岱良

主 编：王川平

副 主 编：刘豫川

策 划：卢 军 孙 华

责 编：刘 嘉 曾海龙 饶 亚 卢 军

执 行 编 委：邵卫东 卢 军 刘 嘉

目 录

人文三峡(代绪论)

第一章 盐的故事

- 2 / 1. 食盐的趣话
- 7 / 2. 三峡的恩赐
- 13 / 3. 巴盐与盐巴
- 16 / 4. 致命的财富

第二章 五千年盐业生产历史的见证 ——忠县 井沟

- 23 / 1. 中国通史——中坝遗址的发掘
- 31 / 2. 令人费解的尖底杯与圜底罐
- 42 / 3. 制盐猜想

第三章 从《山海经》说开去——宁厂白鹿盐泉

54 /

1. 上古盐都

60 /

2. 白鹿引泉

65 /

3. 千年盐场

70 /

4. 永远的宁厂

第四章 大山里的盐业基地——云安镇的兴衰

75 /

1. 白兔井的故事

80 /

2. 首屈一指的制盐业

85 /

3. 三峡盐都

第五章 巴盐遍天下

92 /

1. 川盐济楚

98 /

2. 栈道千里

105 /

3. 乌江通道

人文三峡(代绪论)

王川平

随着三峡考古的开展,长江三峡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开:三峡不但以它的雄奇壮美,成为长江的标志性河段,更以它古老文明绵绵不尽的人文情怀,成为长江文明最华彩的乐章,成为世界上最富人文渊薮的大峡谷。

东方人类发源地

在距今 6 亿至 2.7 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三峡地区仍是一片海洋。中生代三叠纪末期,距今 1.8 亿年前后,“印支运动”使华南地区形成陆地,与华北陆地连成整体,但西南地区仍为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东高西低是当时的景象。由古云梦泽、古巴蜀湖、古西昌湖、古滇湖连为一体的古长江从东向西流向古地中海。中生代末期,距今 8000 万~7000 万年前,燕山造山运动使巫山山脉自北而南隆起,切断古长江。于是,巫山以东的古长江即向东流,巫山以西的古长江仍向西流。新生代之初,距今 4000 万年前左右,规模宏大的喜马拉雅山运动气势非凡,形成世界第三极高峰和整个青藏高原,强迫浩渺的西部之水向东流去,去冲刷、去切割阻挡长江的巫山山脉,这便形成了壮丽的三峡。三峡是山与水共同撞击、共同孕育的结果。

三峡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降雨充沛,适宜生物生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在三峡地区寻找到 5 种与人类起源有密切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化石,并发现了 204 万年前的“巫山人”和距今 200 万年的“建始人”,以及他们使用的石器。三峡与非洲奥杜威大裂谷一样,是寻找人类起源最理想也是最可靠的大峡谷。

1956 年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钟家湾,发现了距今 12 万年的“长阳人”化石,并发掘了一批与“长阳人”共生的动物化石。近年来,黄万波先生在奉节兴隆洞发现距今 14 万~12 万年的“奉节人”。

在三峡工程 175 米水位以下及移民迁建区,有 50 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遗迹。考古学家在对重庆丰都县高家镇、烟墩堡、井水湾、枣子坪四处旧石器文化中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石制品,尤其是发现了露天石器加工场,这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一带是极为罕见的。它表明在 10 万~5 万

年前,三峡的古人们以常见的河流砾石(即鹅卵石)为原料打制石器,以这种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就石器制造技术而言,三峡旧石器汇集了我 国华南、华北的特点,这是三峡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通道的有力证据,也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向晚期文化过渡的重要证明。

新石器时代:东传西递的文化大动脉

巫山县大溪镇坐落在瞿塘峡东口,大溪河与长江交汇处,长江南岸。1957 年与 1975 年多次发掘,20 世纪 70 年代被命名为“大溪文化”,其时间为距今 6000~5000 年,近年来对此遗址进行了全方位发掘。如果要复原这种历史场景的话,那画面大致是这样的:距今 6000 年前后,大溪一带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种植稻谷,打鱼狩猎,制作彩陶,用玉石、兽骨、象牙来打扮自己;他们生前食用大量的鱼,死后还用鱼作为随葬品,甚至把鱼尾衔在口中。这让后人猜想他们可能是以鱼作为氏族的图腾;还猜想这种鱼一定是经过盐加工后才能够作为随葬品的,因为鲜鱼极易腐烂变质;进一步的判断就是那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开采并利用三峡地区丰富的盐矿、盐泉了;他们盛行屈肢葬、多人合葬,葬式非常丰富而奇特;他们仍生活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的社会结构中,但后期已出现财富不均和父系氏族的早期征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找到了距今 8000~7000 年的新石器文化。一处在大溪遗址的下层,一处 在丰都玉溪坪。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湖南澧水彭头山遗存和湖北城背溪遗存的影响。也就是说,三峡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主要受江汉平原和湘西山地的同类文化影响。到新石器晚期,重庆忠县哨棚嘴下层遗存,则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有近似的风格。三峡新石器考古表明:三峡,一头担着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一头担着成都平原,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东传西递上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北纬 30°上的巴人之谜

翻开世界地图,三峡地区位于北纬 28°~32°,即人们常说的北纬 30°线附近。神秘的北纬 30°!神秘的埃及金字塔、神秘的北美玛雅文化、神秘的百慕大,都处在这条纬线上。三峡的神秘就是那撩人的巴人之谜。在公元前的上千年这段漫长岁月里,巴人为开发大巴山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三大地区,开发清江流域、沅水澧水流域、汉水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众多江河流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巴人是古代开发三峡地区的最重要的成员。

据成书于秦汉的《世本》记载,巴人是“廪君之种”。可惜《世本》早已佚失。好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录下了廪君的事。这段夹杂神话色彩的文字,是研究巴人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它向人们透露出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据考证,武落钟离山在湖北清江下游的长阳,今称佷山。这一带是土家族的聚居地,土家族自认是巴人的后裔。“武落钟离山”应是巴人语言。在土家族中,“钟离”是公虎的意思。

——廪君是通过掷剑比武与驾舟比赛而成为领袖的。

——巴人为夺取盐业资源曾与以“盐水女神”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氏族展开战争,并赢得了战争。这是巴人与盐的第一次结合。其后,“巴盐”与“盐巴”在三峡一带上演了一场横贯 4000 年的大剧。

——廪君战胜盐水女神后,在清江边(清江古称夷水)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

——巴人以虎为图腾,好鬼神,崇拜祖先。廪君则是他们最伟大的祖先。

在以后的历史中,透过文献与考古材料,人们大致知道巴国的一些情况。巴国的军队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成为前锋部队,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殷商军队。战后巴人受封子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巴子国”。公元前 703 年春,巴国与楚国的联军击败了位于今河南南部的邓国。公元前 689 年,巴楚开战,巴国失败。公元前 632 年,晋秦联军大败楚军,巴国向秦致贡,意图以秦制楚,但不久秦楚修好。公元前 611 年,位于今鄂西北的庸国乘楚国大饥荒之际,联合江汉平原诸国反抗楚国,连败楚军,秦国与巴国的援军与楚一道,灭掉庸国并三分其地,巴国分得原属于庸国的巫山、巫溪一带。公元前 477 年,巴楚又开战,巴败。公元前 377 年,巴蜀联军从清江出兵,一度攻占了楚国的兹方即今湖北松滋,直指楚国都城——郢都,但终因战线太长后援不济为楚所败。公元前 316 年,秦国先后灭掉蜀国与巴国,并对巴民族实行类似于民族自治的政策以巴制楚。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中可见其在秦楚两个大国的挤压下处境的艰难。

从考古材料来看,巴人在三峡地区各条长江支流上建立了相当多的聚居点,并留下众多的战士墓葬。巫山大宁河谷曾是巴人早期的活动中心地带。云阳和开县的澎溪河一线已发掘出数以百计的巴族战士的墓,随葬有巴式矛、巴人柳叶剑、巴式钺及其他铜器、陶器。涪陵小田溪曾出土了中国第一套战国编钟,共 14 枚。印证了史书上关于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说法。三峡地区大量悬棺中也出土有巴人的兵器。20 世纪 50 年代,在重庆冬笋坝、嘉陵江上游的四川宝轮院出土了大量的船棺葬,随葬品中的铜兵器、陶器带有明显的巴人特点。近年在成都闹市发掘出土的大片船棺群也是如此,其墓主人的遗骨带有明显的二次迁葬的性质。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古书关于蜀王杜宇禅让给巴人鳖灵(即蜀王开明)的故事,也印证了不少学者关于巴人建立了蜀国开明王朝的研究结论。

“巴盐”与“盐巴”:古代三峡的经济命脉

巴楚战争不断,目的非常明确,为了一个盐字。盐在巴蜀俗称“盐巴”。盐是巴国的经济命脉。

三峡及四川盆地原是一片汪洋,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以后四川盆地成为内海、内湖,由海盆、湖盆而成为陆盆。巫山山脉隆起后海底的含盐层上升,经雨水顺裂隙渗透溶化后再流出地表,便形成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据地质部门测算,仅万州及附近每年流失的岩盐资源约有 30 万吨之多。

在《山海经·大荒经》中描述了一个不种而食、不织而衣、鸾鸟歌舞、百兽相处、百谷所聚的巫国,这里群巫聚于灵山,采长生不死之药,好一派极乐世界。专家们考证,灵山即巫山。长江北岸的巫山中有巫溪宝源山盐泉(即今天的宁厂),有大宁河的舟船之利。长江南岸的巫山中有清江盐泉,有古大溪河的舟船之利。这里的盐行销楚蜀乃至更广大地区,换来不尽的衣食奇货,当然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在四川自贡井盐没有开发之前即李冰治蜀之前,巴国的盐雄踞长江中游、上游一带数千年。秦灭巴后,与楚人展开了对盐的争夺,并很快控制了三峡地区的盐,三峡之盐便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资源。

三峡与战争

三峡上连巴蜀滇黔,下扼湘鄂吴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在三峡上演了无数征战大剧。

巴楚之战绵延不断,前文已述。巴楚之间,留下三座关隘,这就是有名的扞关、江关、沔关。扞关在清江上,江关在重庆奉节瞿塘峡口。《华阳国志》误将江关记作扞关,因而便有了两个扞关。沔关在汉水上游。巴人退守渝东,又在今重庆长寿的长江北岸设置阳关,可见巴国的衰微了。

秦灭巴蜀是秦统一中国的重要举措。巴地有盐、铜、造船的木材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有勇敢的士兵和对楚的居高临下的上游优势,以及蜀的财富。公元前 308 年,秦武王令司马错出夔门伐楚,秦军大船万艘,军 10 万,米 600 万斛。这可能是三峡江面上出现的创当时纪录的船队了。秦军这次征讨得楚的“商于之地”,楚的黔中郡成了秦的黔中郡。不久,楚夺回该地。公元前 280 年秦楚再战,秦胜,秦又夺取黔中郡。其后仍有反复,到公元前 253 年,经过反复较量后,秦迫使楚都由郢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秦完全控制了三峡一带。

东汉初年,公孙述称白帝,都成都。光武帝刘秀为统一中国,与公孙述的部队在三峡一带展开大战。从公元 33~37 年,双方在三峡及荆州一带,陆攻、水战、江南、江北、骑兵、火兵。最后,刘秀的大将岑彭从荆州、夷陵(今宜昌)一路破秭归,夺巫山,穿越三峡,夺得重庆,最后夺取成都。重庆奉节白帝城即为公孙述为巩固

成汉小朝廷而设的军事城堡。

夷陵之战是三峡地区上演的一场著名大战。公元 219 年,蜀将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后,为吴杀害。公元 211 年,刘备称帝后,即于七月率大军攻吴,为关羽报仇。刘备大军的前锋一路在巫山打败吴军前哨,攻克秭归。蜀军又在长阳巴人的支援下,纵深吴境数百里。从公元 222 年正月到六月,蜀军凭借三峡天险,居高临下;吴军且战且退,集中兵力,以逸待劳,伺机决战。吴国年轻的大将陆逊利用炎热与火攻,烧毁蜀营 40 余座,即史称火烧七百里连营。刘备侥幸逃回奉节,在永安宫上演托孤的故事后病死。时间是公元 223 年夏。四年内,刘、关、张三兄弟先后去世,蜀汉已是独木难支。

公元 279 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 20 万分六路讨伐吴国,以成就统一大业。其中一路由益州刺史王濬统率 7 万水军由巴蜀出发攻吴。公元 280 年,吴国举起降旗。这便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诗中唱道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汉晋以降,分分合合,朝代更替,三峡就像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目睹硝烟散尽而烽火又起。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末世,起义军与割据者常以三峡为天险,拥兵自立,如元末的明玉珍、明末的张献忠、太平军的石达开。而每一个新立的王朝,几乎都有一段经三峡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的征讨史,如隋文帝令杨素伐陈,元蒙的攻宋,朱元璋逆江而上讨伐明夏,清初的平定三峡,以及在三峡和重庆平定吴三桂势力。古往今来,三峡本身就是一部无字的兵书。三峡有山水之险,给军事家们提供了以少胜多的条件;三峡有水利舟途,为大规模的兵力调运提供了条件;三峡有优秀男儿,他们是最好的兵源;三峡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对持久战以实物支援。三峡就像一块巨大的军事技术、战术、战略实验场,为升华军事理论和实践奉献着。直到抗日战争,它仍然是一道屏障,守卫着中国大后方,守卫着中国战时首都与陪都,忍受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并敞开胸怀,把中国的有生力量运送到大后方,为最终赢得这场民族保卫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歌三峡

三峡又是诗的三峡,民歌的三峡。据统计,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 4000 首,历代知名诗人超过千人献出他们歌咏三峡的激情。其中屈原是国际承认的世界文化名人,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创立的骚体诗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屈原是一位饱受三峡山水孕育的诗人,是一位饱受巴楚人民忠勇诚信品格孕育,饱受巴楚巫风孕育的诗人。

稍晚于屈原的宋玉则是直接歌咏三峡的诗人,其《神女赋》、《高唐赋》是以三峡为题材的诗作。

西汉时,无名氏一首《巫山高》成为历代诗人咏颂三峡的一种诗歌体裁,从汉代到清代绵绵不绝。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仅以《巫山高》饶歌体咏三峡的,从南北朝至清就有 46 位诗人,其中有唐李白、李贺、张九龄、孟郊,南唐后主李煜,宋王安石、司马光、范成大、苏轼,清李调元等知名诗人。

李白三次进入三峡,先后写下《峨眉山月歌》、《夜宿巫山下》、《王昭君》等诗作,尤其是《早发白帝城》成为歌咏三峡的千古绝唱,是李白才华横溢的天才杰作。

杜甫的夔州诗 400 多首,约占他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是诗人旅居奉节两年间的创作。杜甫的三峡诗苍凉古劲,叩击胸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将他的精品诗作奉献给三峡,三峡为他抒发悲凉情怀提供了创作平台。

白居易曾在三峡中的忠州任刺史两年,写下 120 多首诗作,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抒发了自己被贬官的悲凉心情。白诗本来就通俗易懂,在三峡期间,更对巴渝民歌“竹枝词”情有独钟,与刘禹锡一道开创了诗歌通俗化、民歌化的改良运动。

刘禹锡于公元 821 年任夔州刺史,是竹枝词的集大成者。他的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为古典情歌中的绝唱。

宋代的知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三峡,并吟唱过、赞美过三峡。如寇准、欧阳修、苏东坡父子、王安石、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三峡诗作非常多,还写有著名的《入蜀记》,以日记方式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是研究宋时三峡极好的资料。

元明清以降,出入三峡歌咏三峡的文人墨客难以计数。重要的有赵孟頫、宋濂、杨慎、张居正、王士禛、张船山、张之洞等,进入 20 世纪,毛泽东、刘伯承、董必武、陈毅、郭沫若等都曾赋诗题咏三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鼎盛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五四”以后,三峡诗也形成高峰。三峡的壮丽山川与美妙人文为中国的诗学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竞技场,而名词、名诗、名赋、名文的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三峡新的人文景观。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峡谷像三峡这样富于诗意、诗情和诗作。诗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影,是一个民族精神境界和教养的评价尺度,是一个民族对美与善追求的最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情趣的核。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我们在鉴赏、品评三峡诗时,才能掂出三峡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三峡在民族精神中的分量,才能掂出这份以三峡的名义形成的文化遗产的分量。

三峡工程:现代版的人文巨著

三峡工程的建设,为三峡人文谱写了新的篇章。

1919 年,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

划》中首次提出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坝以得水利的宏伟设想。1924年,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提出在三峡建立水力发电站的构想。从1932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多次动议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一些世界知名的水电专家也多次来华调查三峡地区,进行坝址选择、人员培训。1944年5月,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世界最负盛名的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受邀考察三峡并提出了《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

1953年,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大坝,根治长江水患问题。1956年7月,他的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水调歌头·游泳》问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对三峡工程做出具体的指示。1992年4月3日15时20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并获得通过。

1993年三峡工程终于上马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

1997年,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诞生了。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世界级难题有了破解的保证;三峡的经济、文化有了一个靠得住的支撑点;中国西部开发的号角吹响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这条巨龙终于有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重庆龙尾,为长江经济带的腾飞注入新的动力。

长江文明,由于有了三峡工程而新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河文明所不可比拟的。三峡工程及移民工程、环境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工程,正成为三峡新的人文资源,成为三峡文化崭新的生长点。

三峡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的结合,产生了三峡文化的核——三峡人文精神。它是三峡人民依托三峡山水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精神,它包括以巴人为代表的忠勇刚烈的品格、以楚人为代表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承担大义、舍己为国的牺牲精神(在三峡移民中这一精神得到全新的升华);与山水和谐相处,乐山乐水的仁智精神;幽默乐观,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及舒畅旷达、热情奔放的文化风格。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三峡人文精神在三峡工程建设、三峡移民、三峡文化建设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光大,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传承在长江文明的血脉里。

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批学者,大多是工作在三峡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具有较高素养和丰富实作经验的某一方面的专家,编写了这套人文三峡丛书。我们力图浅近生动地从多个侧面展示三峡人文的博大与富饶,神奇与情趣,悠远和年轻。但愿我们的努力会与你共鸣。

第一章 盐的故事

1. 食盐的趣话

盐,地球上没有一种物质像它那样普遍,用“无处不在”这个词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动、植物,体内都含有或多或少的盐分。这种游离于生命体内的物质,虽然普通但却珍贵。是它,参与了生命的创造;是它,让世界变得有生气而丰富多彩。

科学告诉我们:凡是金属离子与酸根离子结合的化合物,广义上都被称做盐。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盐,却是一种叫做氯化钠的化学成分。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化学表达式中,盐的表现形式却十分简单: NaCl 。化学实验显示,当一个叫做“金属钠离子(Na^+)”的物质与一个叫做“酸根氯离子(Cl^-)”的物质邂逅时,一段姻缘产生了,它们美丽结合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盐”。

纯盐是无色透明的。我们通常用“洁白”、“白花花”等来形容盐,其实那是由于盐里面含有杂质的缘故。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会看到黄的、红的、蓝的盐,这是由于杂质透过盐晶幻化出五颜六色的光彩,盐的本来面目反倒被蒙蔽。此时的盐,就像多彩的水晶。通常说来,海盐、湖盐的杂质要多一些,颜色比较丰富,而井盐最单纯,显得洁白细腻。

盐具有吸潮、防腐、可溶、易渗透、杀菌等特点,人们利用盐的这些特点,巧妙地为人服务。例如,用它来腌渍咸菜、做腊肉,也用其化雪。据说埃及人首先用盐来腌制肉和鱼,他们通过蒸发尼罗河水来制盐。我国文献上有关腌鱼的第一批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但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的某些墓穴中找到了腌制的禽类和鱼类,那些随葬品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在盐的利用上,古埃及人显然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最



盐业专家认为,三峡地区史前人群盛行腌鱼、腌肉。这是大溪遗址发现的鱼骨坑,有人认为是腌鱼的遗留。

突出的成就表现在殡葬方面——制作木乃伊。埃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但尸体被埋葬后灵魂还会回来,因此要把有肉和骨骼的尸体保存下来。从原理上看,这个过程与腌制食物很类似。

但盐对于人来说,最大的功用还是维持生命。可以说,世界上除了空气和水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物质能像盐那样,与生命连接如此紧密,与人类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溶于生命之盐,堪称生命的维护者、保障者。盐是一个人的终生伴侣,无时无刻不在参与我们生命的运转。人体对于盐分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生理需要上,它是维持人体生理平衡的必需品。食盐对人体肌肉、神经、心脏等器官以及消化、血压、荷尔蒙等功能有很大的影响。盐分中的钠主要是扮演控制者的角色:帮助维持正常的血量,控制人体细胞对水的吸收和排放。此外,钠对于刺激信号在神经系统中的传导,以及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盐分中的氯可以保持人体内的酸平衡,并使某些酶产生作用。食盐也是制造胃液和胆汁的重要原料。

食盐经过人体小肠吸收进入血液,它像一个调节水流的抽水泵。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主妇们将盐涂抹在生菜、生肉等上面,或者将这些东西置于盐水中,里面的水分就会外溢,而盐分则乘虚而入。盐在人体组织里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对渗透压维持一定的调节作用,可以向细胞内输送水分,并有保持液体的中性功能的作用。调节人体内的盐分维持含量不变的器官是肾脏;对于钠离子和氯离子再吸收而加以控制的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在人体中约有 200 万个汗腺,汗腺分泌的汗液中含有 0.35% ~ 0.7% 的盐分。

科学家们研究了盐对人体的影响,发现盐有两面性,既对人体有益,有时也对人体有害。他们发现,倘若人体内盐缺乏,将引起肌肉痉挛、头痛、恶心、下痢、全身懒散、心律不齐等症状,严重者还会因心脏功能衰竭而导致死亡。但是如果一个人因此而过量摄盐,那么,水肿、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等病患会造成较大危险,甚至中毒死亡。可见,盐这种不



大佛头佛教摩崖造像,位于云阳县产盐的汤溪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古代盐商赞助开凿的。



巫溪县宁厂白鹿盐泉,因富含硫酸镁和硫酸钙,当地人用以治疗皮肤病和眼疾。

可或缺的化合物,与人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人体有着多么强烈的影响。

食盐在人体内的含量并不高,大约占人体重的 0.66% 左右。一个体重 75 公斤的人,所含盐分不过区区 0.5 公斤左右。通常,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要从各种饮食中摄取 15 ~ 20 克左右的盐分,每年摄取约 5.5 ~ 7.3 公斤。人体通过食物获得盐分,其来源通常有以下三种:一是食物中的自然含盐量;二是食品加工时添加的盐;三是烹调或进餐时加入的盐。这些储藏于食物中的盐,通过味觉的品尝和感知,使人们激发出强烈的食欲。

渗入生命之盐,自然也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因了这些洁白的盐,过起来才更有味道。盐与土壤、空气、水和火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五大要素。自古以来,盐在人们心目中便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曾在他的诗歌中歌颂过盐的种种美妙好处。而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认为:盐与水、火一样,都是生命最原始、最神圣的构成要素。在人类的文字记载中,圣经是最早对盐

发出歌颂的著作之一，它常将盐和圣洁连在一起，认为其重要性堪与面包媲美。在其他宗教的崇拜仪式中，盐的象征意义也很重要，常常是奉献给诸神的供品之一。在四川地区，隋唐时期盐业生产遗址附近常有佛教和道教石刻；在更早的忠县中坝制盐遗址，就发现有卜骨的存在，显示宗教在盐业生产上有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沙漠里的游牧民族则把盐当做是殷勤好客的表示。盐是酸、碱反应的产物，它有许多传奇故事。在古希伯来人和现代的犹太人心目中，盐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永久联盟的象征。在伊斯兰教中，人们用盐封存永远不变的契约，因为即便是盐溶化在水中，在水分蒸发后，盐仍然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晶体状态。在基督教里，盐与长寿、真诚和知识联系在一起。从前，罗马人习惯在刚刚出生的婴儿口中放一点点盐，为的是将来他们变得聪明、睿智。威尔士人习惯在棺木中放上面包和盐，以此让已故的亲人安息。

在传说中，邪恶的神对盐都有奇怪的恐惧感，也许是因为盐那神秘的来源。在日本的剧场中，每次演出前总要在舞台上撒盐，以此避邪和保护演员。而在海地，据说人们甚至用盐来使一具僵尸恢复生命。不管迷信与否，有关盐能够驱除邪恶的说法流传得相当广。例如，犹太人和穆斯林一直都认为，盐可以预防眼病。在欧洲有一种普遍做法，那就是基督教的洗礼形式：把刚刚出生的婴儿放到盐水中洗一洗，或者把一点盐放到婴儿的舌尖上。后来这种做法在法国进一步演变：婴儿接受洗礼之前要放入盐水中浸一浸。直到1408年，这种做法才在法国被明令取缔。在很早以前，原始文化中一度把盐看做精液，而罗马人就曾常用“盐”(Sal)的演变字“Salax”(好色)，来形容一个人开始恋爱了。在法国某些地方，新郎的衣兜里总装着一小袋盐，以预防阳痿。埃及的神职人员为了保持其独身生活，都拒绝吃盐，因为他们认为盐会刺激性欲。

历史上因盐而起的争端也层出不穷。为了它，有多少人揭竿而起，又有多少联盟竞相建立；是它，点燃了多次革命和战争的导火线。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与盐的历史水乳交融，为了它，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国家大动干戈，剑拔弩张。盐所带来的收入供养过军队，成就过帝国，修建过无数工程。古代中国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据说就是因争夺盐业资源而起。古罗马人也常常因盐而发动战争，并曾修筑一条称为“盐路”的大道供军队使用。18世纪末，每年有3000多法国人由于反对交纳盐税而被判刑。这项税收后来变成了政府所有不公正的象征，从而也成为法国革命的导火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个印度人撮起一点盐意味着什么？那是严重的犯罪，同时也成为印度独立的起因。当时，英国政府禁止开采和自由买卖盐，目的是让这个殖民地国家消费的盐只能来自英国利物浦公司。1930年4月6日，圣雄甘地在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妇女和穷人的陪同下，经过长时期、远距离跋涉之后来到了丹达海岸。他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法律，用手捧起了一把盐巴。一周之后，甘地的举动引发了一场席卷印度全国的运动，无数人效仿他的做法。17年后，

印度终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

盐是古代国家财力的重要象征。历代为盐业生产、销售、税赋的控制而产生了各种政策。汉代的时候,一些文人士大夫对政府的盐、铁、酒专卖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由盐、铁的讨论进而对国计民生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辩,最后甚至形成了名垂千秋的《盐铁论》著作。

中国古代经济的龙头非盐莫属,正因为盐业经济的发展变化,促进了中国古代纸币的产生。在三峡一些偏远地区,宋明时期仍然存在以盐作中间交易品,进行物物交换的情况,盐一度成为硬通货。北宋时,一些贩盐的大商人,其申报的卖盐数量往往与实际数目相差很大,导致政府税收大量流失,而商人却从中谋取巨额利润。当时与北方的辽国、西夏国战事频仍,政府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于是试行“盐钞”,由盐商在官府处购买这些“有价证券”(后来又叫盐引),按照钞上的规定,持钞到指定的盐池,按指定的数量支盐,再到指定的地区出售。这些盐钞事实上促进了纸币的诞生,由此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有价证券”,这就是“交子”纸币的最初来历。

盐与钱的关系,在国外也被延伸到“盐”与“薪水”这两个词的关联上。英语中的后者(Salary)就是由前者(Salt)派生出来的。英文的薪水一词源于拉丁文的 Salarium,这八个字母组合的原意就是“买盐钱”,原指罗马时代发给士兵买盐的钱。盐是如此重要,以致在历史上曾被当做通货使用。盐的价值由生产和运输的难易度以及所投入劳力和资本的多少而定。古代的中东地区,盐十分珍贵,可用来兑换黄金;非洲黄金海岸曾有一段时期,一把盐便可以换一个奴隶,有些地区甚至把盐看得比奴隶还贵重;中国在抗战期间也曾有过一斤盐换 100 斤粮食的纪录。

威尼斯的海上贸易有一段时期也是依赖运盐才得以维持。不少矗立在大运河旁的壮丽华宅,便是靠了这种白色结晶体才盖起来的。当欧洲步出黑暗时代,财富与智慧快速起飞,随即分化成两种国家形态:盐的生产国和盐的消费国。食盐与丝绸、香料、酒和饰物等,随着骆驼商队及海路运输传送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一些干旱的盐湖中,人们用盐直接修筑公路和铁路。在青藏高原上有一个盐的巨大仓库,那就是察尔汗盐湖。说它是湖,有点名不副实,因为那里一滴水也没有。盐湖上面是一层厚约 80 厘米的硬邦邦的盐壳,据测量,它的承载力为每平方米 43 吨,足以经受数十吨大卡车的荷重。于是这里就有了一座独特的、令人惊叹的桥梁,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桥墩和桥梁的、架设在盐湖上的桥。这座桥全长超过 30 公里,折合成中国传统的长度单位“丈”,约有一万丈,因此这座桥又被叫做“万丈盐桥”。万丈盐桥所在的察尔汗盐湖,拥有巨量的钾盐和钠盐,其中的氯化钠储量达 550 亿吨,够世界人民食用两千年!盐湖桥的路面比世界上最好的柏油路还要平滑。汽车飞驰在这条公路上,就像奔驰在大理石上。远远看去,这条公路亮晶晶的,还有些透明,简直就像水晶。我们知道,盐遇到水就会溶化,如果下雨,这条美丽的水晶桥不就完了吗?别担心,不会的。察尔汗盐湖里之所以能用盐来筑公路,除了那里盐多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气候比较干燥,难得下雨。就是偶尔下场小雨,这条公路也不会有什么损坏。假如有些损坏,修补起来也很方便。只要

从路边挖点盐,然后放到损坏处,再浇点水,干了后就又变得平整光滑了。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上就把食盐和煤炭、石油、石灰、硫磺合称为五大基本工业原料,故食盐有“化学工业之母”的美誉,其消耗量甚至被视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尺度”。盐的用途非常广泛,至少有 1.4 万多种,除了调味、防腐,更多的用在农业和化工方面。一般而言,工业先进的国家大多是盐的大消耗国,也是大生产国。目前全球产盐量约 2 亿吨,美国居首位,中国大陆居次,之后是德国。

在我国,食盐的生产以原盐为主,其次是粉碎盐、精制盐等。以食盐为主体,通过增加添加剂构成的产品是其直系亲属。如加碘盐、餐桌盐、低钠盐、虾味盐、饲料盐、营养盐、佐料盐、健康盐、肠衣盐等。同时,通过在饲料中加钙、磷、铁、钴等,以及添加防蝇剂、防腐剂、防腐药物等,可以构成新的食盐品种。除上述品种外,食盐的直接亲属还包括蒜味盐、葱味盐、芥菜盐、维生素盐、辣椒盐、胡椒盐、调味盐、香料盐、海味盐、肉类调味盐、加锌盐等数百种产品。还有以食盐为原料制得的化工产品及其衍生物,它们是食盐的旁系亲属,主要有纯碱、烧碱、盐酸等,其数量之多,举不胜举。同时,制盐工业的副产品硼、钾、溴、碘、锂、锶、钡、钙、镁、钆、铯、镭等盐类或其他单质,也是极为宝贵的化工原料和再加工产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种特殊用途的需要,食盐的品种还会越来越多,食盐家族也会越来越大。

2. 三峡的恩赐

地球厚厚的地壳中,普遍存在盐这种物质。由于盐极易溶于水,因此常随水流淌,进而被雨水带进河川,再流入大海。据统计,每年从陆地流入海洋的盐大约有 1.1 亿吨,而全球海洋所含盐分约 4500 亿吨以上。

依照自然存在的状况,盐又可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四种。

海盐是资源最为丰富的,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也是现代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盐。只要在气候和地质条件适合的地方,都可以开采海盐。海边开发盐田,依靠日晒和自然蒸发,从而使盐分析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海边都出产海盐,如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欧洲的地中海沿岸等都是海盐的大产地。中国是世界产盐大国,以海水为原料生产的海盐居世界第 1 位。

湖盐是内陆地区人们开采的主要盐种。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含盐量较高的湖泊,这些与淡水湖相对的咸湖,数量虽然不多,但对早期人类来说,却意义重大。比较著名的咸湖如死海、咸海。人类采盐最早使用的方法是从含盐量高的干涸河床或湖床刮下盐结晶块。采集湖盐最有特色的地方当属非洲塞内加尔的瑞特巴。当地人制盐的方法很简单,湖边各村庄的男女老少全体出动,搭乘小船,将几百个塑胶桶放在湖里,排成圆圈,从空



1956 年航空照片显示的香港大澳海盐盐田

中俯瞰下来就像一条七彩缤纷的项链。而后利用赤道的烈日将桶里的湖水晒干,于是桶底便留下了一层洁白的盐。我国山西运城盐湖,就是一座干涸的咸湖,先秦时期的中原经济、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依靠这座湖的恩赐。青海的察尔汗盐湖,更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重要基地。

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做“井盐”。井盐的开采在我国古代有着特殊的意义,饱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汗水和智慧。早期非洲许多地区的居民都是从含盐量高的盐土中采盐。他们在盐地里挖出约 2 米深的盐井,含盐的地下水冒出后,经蒸发便析出盐晶,井盐便这么开采出来了。世界上著名的井盐产地有中国的自贡、波兰的魏里奇卡等。

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或泛称为“矿盐”。开采矿盐比利用盐田晒盐的方式晚许多。波兰的考古学家曾发掘出一些将盐土加热析出结晶盐的用具。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天然盐矿,如伊朗、伊拉克、美国西南部、澳大利亚和玻利维亚等。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盐丘和盐山,如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约有 300 座圆形盐丘;巴基斯坦境内有绵延的盐山等。

在古代中国,有关制盐及盐业技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必然要联系到四川盆地的井盐了。钻井取盐、小口井、天然气煮盐等是井盐的代名词。而四川盆地的井盐,又以自贡最为有名。自贡的井盐历史虽然非常悠久,但却不是最早的,相对于那些更古老的盐泉,自贡至多也就是一个年轻的后生。事实上,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峡江地区,汉唐以来就一直燃烧着漠漠盐火,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峡江地区的制盐历史至少可以上推到距今 4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

三峡地区之所以具有如此悠久的盐业历史,是与三峡给予三峡先民的恩赐分不开



近代自贡盐场井群



四川盆地在西汉中叶宣帝时就开采天然气制盐,这是自贡盐场过去的采气装置。

的。在生存条件如此艰难的地方,汨汨流淌的盐泉堪称上天的厚礼,让三峡先民能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盐卤喷薄而出时,总是会带给人们沉沉的思索:是什么力量推动它们出来的?它们来自哪里?它们会经久不竭吗?

答案来自上亿年前。原来,四川盆地在元古代时并不是现在这番模样,当时在冰川消融后,由于海浸,被海水淹没,形成了一片叫做“扬子海”的地区,这里蒸发强烈,形成了很厚的膏盐沉积。元古代时,扬子海频繁受到海浸和海退的影响,扬子海亦分分合合,其间沉积了大量的海相堆积和盐类物质。

中生代时,全球大陆逐渐形成,现四川盆地属于古地中海的主体部分,在干旱气候环境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咸化海域——“上扬子蒸发海”。上扬子蒸发海,其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由于海水进退频繁和多水道补给,成盐环境多样,四川盆地中部在早三叠纪形成一大盐盆。至中三叠世,东部抬升使蒸发海内发育泻湖——盐湖类型的成盐盆地,从而构成多级含盐盆地,具有良好的成盐条件。三叠纪末的印支运动(Indosinian Mvt.),使三叠纪及其以下地层,几乎全部褶皱隆起。西部横断山系、龙门山;北部大巴山、米仓山;东部黄陵背斜和川鄂湘黔部分山地;南部的大娄山等,均相继崛起,四川从此结束海浸历史,东部转为内陆湖盆环境。湖盆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今四川盆地全境,这就是著名的“巴蜀湖”。

侏罗纪末,燕山运动(Yanshan Mvt.)兴起,华蓥山以东形成一系列北东向延伸的梳状或阻挡式的褶皱及逆冲断层。渝东南的川鄂湘黔山地发生继承性活动,产生一些小型山间盆地。此时,巴蜀湖面积逐渐缩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仅2万平方公里左右,称为蜀湖。白垩纪盆南在合江、泸州、自贡以南的大娄山前地带形成了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的巴湖,巴湖汇集周围诸水后,从綦江东北角经万县,沿巫山及黄陵背斜的低洼部进入江汉平原,长江水系发育基本完成。

盐矿形成与四川盆地沉积环境密切相关,一是海洋中盐类物质在干燥气候条件下,蒸发结晶。二是古构造凹陷盆地范围大,地形沉降幅度大,封闭性好,沉积稳定,咸化时间长。四川盆地的盐矿除了彭水郁山盐泉来自奥陶纪地层外,主要分布于侏罗纪、三叠纪岩层中,与上扬子蒸发海相沉积和川滇盆地湖相沉积相关,分布范围东到巫溪,西至盐源、西昌,南到宜宾、长宁,北抵广元、旺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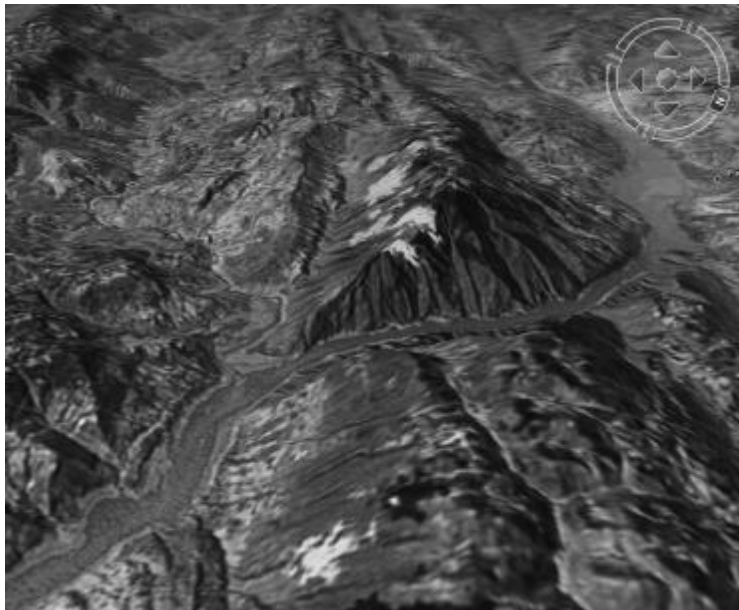
四川盆地盐矿种类有黄卤、黑卤、岩盐、白卤等几种,除岩盐为固态外,余均为液态。其中白卤主要分布于今重庆东部的巫溪、奉节、开县等地,系由卤盐溶解而成,含泥质杂质少,含硫酸镁和硫酸钙甚多,故呈白色。

这些卤水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与地质构造有关,一是位于褶皱构造背斜轴部,卤水受压,易于富集;二是卤水沿断层面富集并沿断层上升或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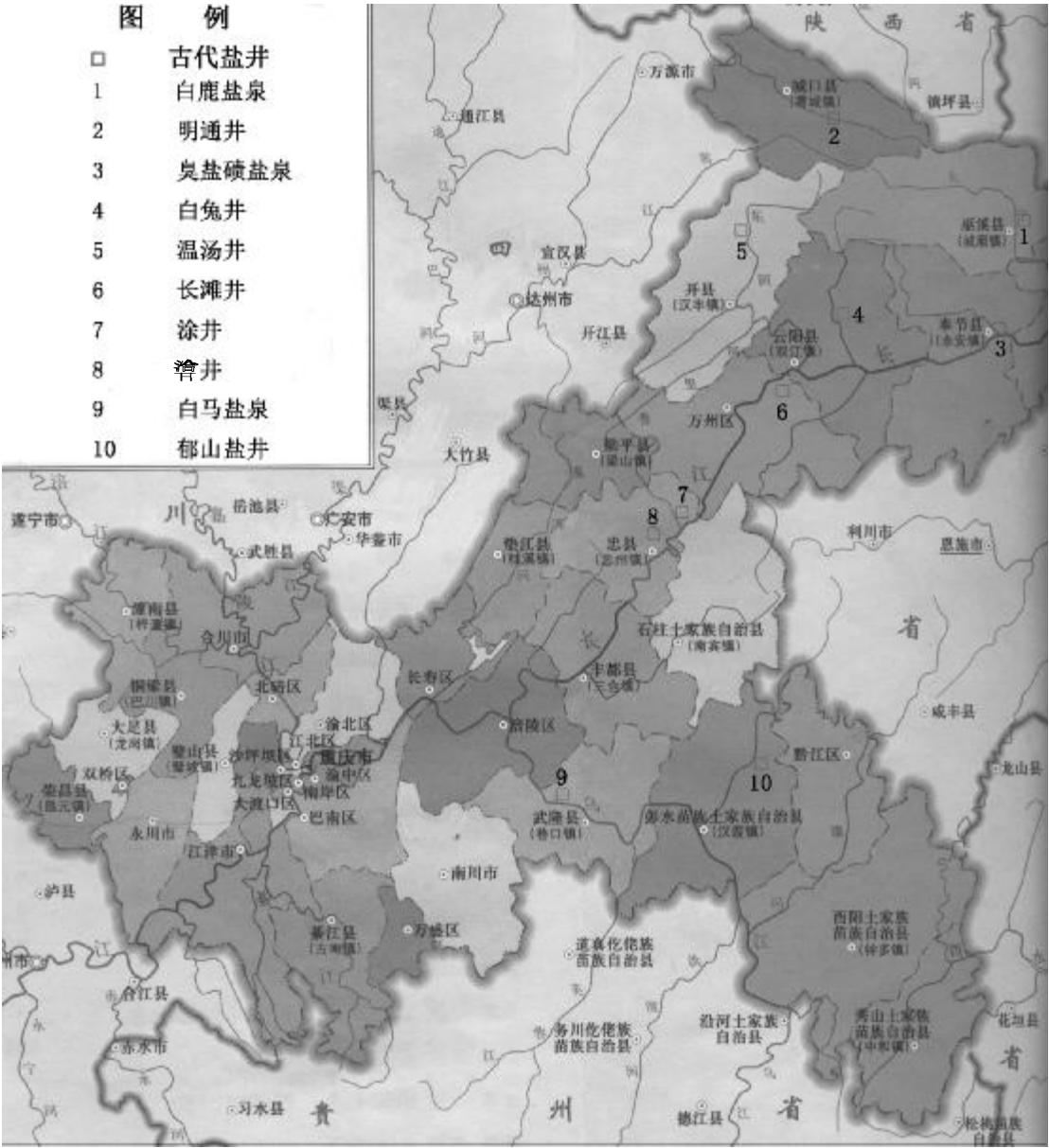
渝东的三峡地区,由于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一系列褶皱带,背斜轴部多为三叠纪、侏罗纪地层,两翼则为白垩纪地层。盐矿集中分布于背斜轴部,再加上长江水系的强烈侵蚀下切,该区多天然出露盐泉和浅层埋藏盐矿。

三峡地区含盐的背斜较多,这为三峡地区远古先民最早开始人工制盐带来了便利的先天条件。

瞿塘峡背斜:分布于奉节、石柱、涪陵一带,呈北东—南西向,奉节盐矿位于背斜西北的大冶组石灰岩中,盐井在白帝城下长江沙洲上。



瞿塘峡背斜局部三维地形图。图中箭头所指处为奉节县臭盐磺盐泉,其废弃的简陋生产设施被后人认为是诸葛亮的八阵图。



重庆地区古代著名盐井(泉)

云安镇背斜:云安场盐卤自巴东系岩层流出。盐井多位于汤溪河以南。在云阳县长江以南,故陵长滩亦有古盐井。

温汤镇背斜:开县盐井位于背斜轴部大冶组石灰岩内。

大池至𡇗井背斜:该背斜是方斗山背斜和万县向斜之间的次级构造。由南西石帽子至北东武陵西消失,轴线长达 33 公里。忠县古代盐场在𡇗井镇和涂井镇,含盐层位于三



汝溪河、涂井东汉六朝崖墓发掘现场；这些崖墓主人可能是文献中“豪门亦家有盐井”中的盐商。

叠纪巴东组和嘉陵江组岩层中，涂井河、汝溪河的侵蚀使盐层接近地表。

宁厂背斜：大巴山南坡地带，山脉多呈东西向排列，海拔 1000 ~ 2000 米，位于北大巴山褶皱带、南大巴山拗褶带、川东褶皱带、川鄂湘隆褶带汇集处，宁厂背斜是其中之一。由于大宁河及其支流后溪河的强烈侵蚀下切，相对高差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峡谷随处可见。三叠纪嘉陵江组含盐层暴露于地表，在压力作用下，形成盐泉，顺山势流下。巫溪至涂家坝的大宁河两岸，天然盐泉有 13 处。

郁山背斜：郁山背斜长 100 公里，背斜南段，从水面坡至黑木耳，轴部开阔，岩层平缓，东翼岩层倾角 40° ，西翼岩层倾角 $40^{\circ} \sim 60^{\circ}$ ，轴面直立，轴向北 45° 。东轴部由中、上寒武纪地层组成，两翼由奥陶系及志留系地层组成，东翼地层出露完整，西翼遭郁山正断层破坏，使奥陶系地层出露极不连续。总之，郁山背斜枢纽呈波状起伏，轴部开阔，两翼陡峭，为标准的箱状褶曲形态。盐矿储存于寒武奥陶两纪地层中。由于中井河、后灶河大约呈东西向侵蚀切割郁山背斜，使含盐岩层出露或接近地表，再加上多断裂，卤水极易开采。

3. 巴盐与盐巴

一个人饥饿时,他首先渴望的是吃;一个人口渴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喝。可是,一般没有人说他想要吃盐。盐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吗?

是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体离不开盐,盐是维持生命体征的重要物质。是不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吃盐呢?

不是。因为人体对于盐的需求量是非常微小的,人类从食物中能够获取盐分,且基本能满足身体的需要。也就是说,人类并不需要专门在食物中添加盐,吃盐是人类后天形成的一种习惯!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吃盐太多反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人类对于各种味道的追求,并不特别在意咸味。所以中国人将“咸”排在“酸、甜、苦、辣”之后,咸属于五味中的最后一味。

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自己的祖先为什么要吃盐?也许,最初人们只是将食物抹上盐,发现它不容易变质,并进一步用以储藏食物(特别是肉食),以弥补食物在某些季节的短缺。也许,人们在食用经过含盐的水淘洗过的食物时,发现自己不容易生病,因为盐分具有消毒的作用。也许,人们在用盐水煮食物时,发现煮出来的食物特别香,特别可口,就养成了食盐的习惯。也许,当某个人体内缺乏盐分时,偶尔吃了一次盐后,感觉精神特别好,消除了疲乏,于是人们群起而效之……

第一个人吃的盐必定是天然的盐水。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有这种资源,所以那时,吃盐必定是一种奢侈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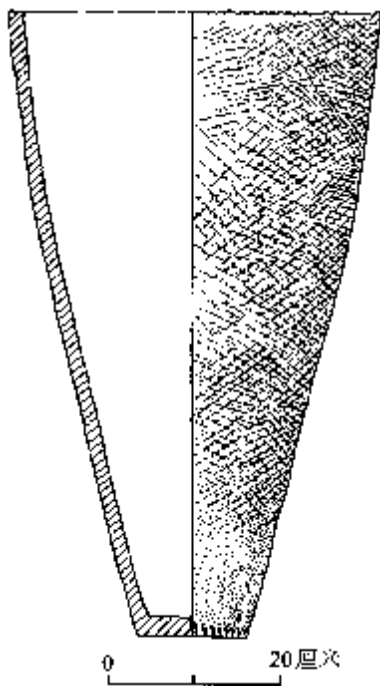
是谁将这种奢侈的行为变成了大众行为?应归功于那位第一个人熬出盐的人。这个人是谁?

据我国的文献记载,这个人叫宿沙氏。宿沙氏是我国古代制盐始祖。《汉书》上说“宿沙初煮盐”,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盐进行了解释:“卤咸也。从卤,监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宿沙氏可能是山东半岛一个部落的首领,古籍中有的称他是炎帝神农氏的儿子,有的称他是黄帝的臣子,《太平御览》又说他是春秋时“齐灵公臣”,具体年代很难断定。宿沙氏后来被尊为“盐宗”,后来很多产盐的地方都有祭祀他的庙宇。宋代罗泌撰写的《路史·后纪四》载:“今安邑(山西夏县)东南十里有盐宗庙……宿沙氏煮盐之神,谓之盐宗,尊之也。”

但是各地关于始作盐者的传说并不完全相同。在天津一带,人们有自己的盐神,至今滨海一带还流传着盐母教人“煮土成盐”的神话。盐起源的具体年代聚讼难断,学者们各有所见。盐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那上面说“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相传《尚书》为孔子编选,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上古重要史料,这是古文献中有关盐的最早记载。明朝邱仲深在《盐法考略》中认为:“考盐名,始于禹。”宋应星《天工开物》将《尚书·洪范》中的“润下作咸”作为制盐之始,认为“润下”这个人就是制盐的始祖。《作咸第五》上说:“宋子曰: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咸就是盐的意思,“作咸”就是制作盐。



忠县哨棚嘴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小平底陶缸，是尖底陶缸的前身，据认为是与制盐相关的陶器。



哨棚嘴新石器时代陶缸线图

即使宿沙氏初煮海盐的记载是可信的，也不能就此认定他是中国盐最早的发现和利用者。因为宿沙氏只是煮海水为盐的创始者。《天工开物》中将盐分作“海、池、井、土、崖、砂石”等六种，海盐只是其中之一，宿沙氏只是开创了海盐的提取技术而已。

那么，中国最早制盐的地方在哪里呢？还得从三峡地区说起。

在千里峡江，人们对于盐的称呼相当奇特——“盐巴”。为什么要在“盐”字后再添个“巴”字作后缀呢？须知“巴”字在现代汉语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语汇，在古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要从盐与巴人的关系说起。

三峡地区的盐哺育了巴国先民，孕育了巴国文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今峡江地区的古巴国，地质条件特殊，形成了一眼眼富含钠盐的山泉，这些大地的恩赐，给巴人祖先取卤制盐提供了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制盐基地之一，其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4000 ~ 5000 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先秦时期从巴地出产的盐，远销四方，以致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巴的特产就是盐，且巴地的盐质量上乘，成为市场上的一种品牌。于是，就像现代天津的“泥人张”、四川的“麻婆豆腐”一样，产自巴国的食盐在流通中也赢得了其口碑——“盐巴”，以示其地位。

当然，对于巴人自身来说，他们早就有将自身的一些东西称呼为“巴”的嗜好。例如将“嘴”称为“嘴巴”，“牙”称为“牙巴”，“手掌”则称为“巴掌”……现在，他们又将自己出产的“盐”称为“盐巴”，充分体现了一贯的命名作风。由此看来，“巴”不但在古代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表达自我的意味。

在我国其他地区，盐卤资源也非常丰富，唯独三峡地区的盐卤资源得到最早开发利用，这显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我们已经知道，三峡盐卤资源在西南地区属于富集地区。这里的地质褶皱较发育，盐卤矿藏主要储存在背斜的轴部。虽然埋藏所在的地层地质年代较早，但相对于背斜的两翼来说，并不算深。在雨水和地壳中自身水流运动下，含盐的矿藏溶解后，在



巴人利用天然盐卤资源——竹笕接卤



画家笔下的巴人煮盐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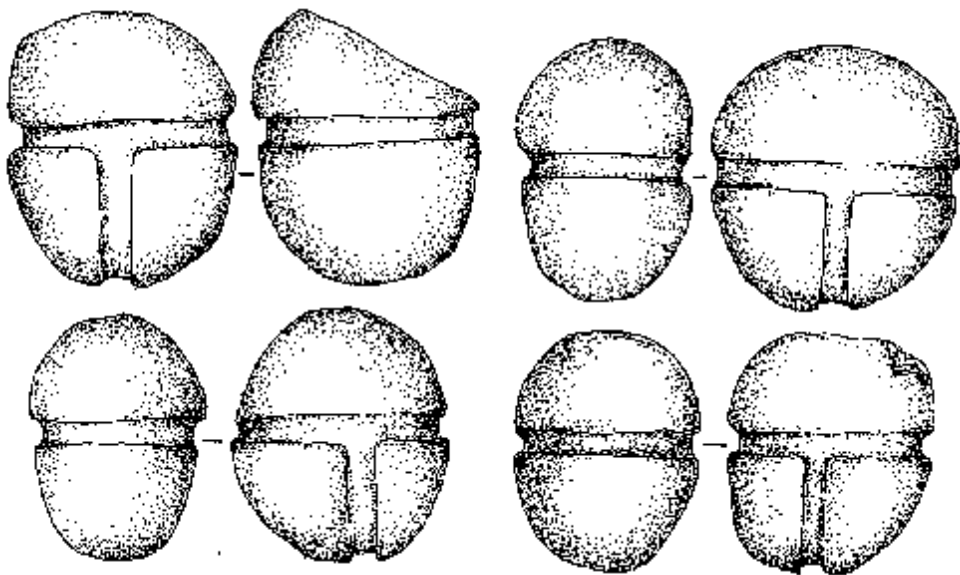
压力和地球引力的双重作用下,容易沿着背斜顶向两翼下渗。此外,三峡地区沟壑纵横,河流密布,沟谷深切,加上地壳运动形成的断层,致使很多含盐的岩层出露或接近地表。这样就在三峡地区形成了许多地表盐泉。加上这些盐泉一般多位于河流下切处,而早期人类亦多活动于河谷台地,这些自然露头的盐泉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被发现,所以最早被利用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在三峡地区,可考的最早制盐者很可能是一个叫做“巫咸国”的人们。巫咸国的得名来自于“灵山十巫”中的巫咸。学术界一般认为,巫咸是早期巴人中最早兴盛起来的一个部落。它占据的地盘,据已故川大教授任乃强考证,就是今天巫山县和巫溪县的全部地域。咸字在古代就代表盐,盐字是后起字。《说文》:“盐,咸也”。可以设想,巫咸大概是一个制盐的巫师,得到人民的拥戴,国名也以其名而命之。巫咸国所在地区恰好有一股大的地表盐泉,这就是著名的白鹿盐泉。

其实,在古代巴人的心目中,巫咸尚不能作为盐巴的代表,光听这名字,就有一些邪气。真正能够作为巴盐形象代表的是一位被尊为“盐神”的美丽女性——文献上称做“盐水女神”!在现代土家族巫师(梯玛)的口中,盐神仍是歌颂的对象。

盐水女神居住在今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清江系长江冲出三峡后接纳的第一条大江。这一条发源于渝鄂交界处的江,冲破重重群山的阻隔,向东北蜿蜒曲折流经整个鄂西南地区,长达 440 公里。这里是巴人的故乡。商周时期,巴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廪君就居住在这里。那时候的清江也叫盐水,因为这条江盛产盐。翻开现今的地图,就可以发现在清江的中游北岸,有一条叫做咸池河(或称建始河)的支流注入清江。咸池河所在地区山高崖峭,远古的含盐地层时有出露,形成了弥足珍贵、可供开采利用的盐泉。如今,在咸池河流入清江的交汇处,仍有大股冒着热气的盐泉出露,已被当地开辟为温泉度假中心。然而,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在几千年前,战争和爱情曾经在这里同时上演过。

那时候,这块现在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叫做“盐阳”,因为它位于盐水的北岸;那时候,



在三峡地区,鱼和盐是一对冤家,人们常用“鱼盐所出”来形容这里的物产,这是三峡东部地区出土的商代捕鱼网坠。

有一位美丽的女人是这块地方的主人。这里是“鱼盐”所出的地方,盐泉中流出的宝藏使她们富足而善良,并且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这里是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她们率先识别出那些泉水中蕴涵着盐,并且以自己的智慧开发了它。这里的盐远销四方,声名远播。人们一边享用着盐阳精致的盐,一边怀想着这个部落年轻温柔的女首领。人们以“盐水女神”的名字称呼她,以表彰她在盐业开发中卓著的贡献。自此以后,每当巴人提起盐,就会想到“盐水女神”,即使在她因盐而引来杀身之祸后。

4. 致命的财富

巴人因最早人工制作出了盐巴而名扬天下,虽然三峡地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太好,但盐泉中的财富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巴人。占有这批巨大财富的人们引起了远方的敌人的觊觎,他们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它;内部的邻居们也因为这些轻易就获得的财富而妒忌,他们伺机占有它。

控制、争夺、战争、杀戮开始了,白白的盐卤成了致命的财富。

首先,在夏代夏启的时候,夏王朝刚刚建立,虽然他们在山西南部拥有自己的巨大的解湖盐池,但似乎仍不能满足整个国家对盐的需要,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财富。他们逐渐向

四周扩张,企图控制山东沿海的海盐,又进一步瞄向南方,垂涎三峡的井盐。但三峡毕竟离那时的中原太远,难以直接通过侵略达到掠夺的目的。显然,间接控制这一地方,然后通过贸易或贡纳等渠道,向王朝提供质优价廉的盐是最可行的。

于是,夏启派出了自己的使臣赴三峡地区,这就像后来的中国天朝向蛮夷之地派出特使,让他们归顺一样。这位使臣的名字叫“孟涂”。此事见载于《山海经·海内南经》(第十)。那上面说: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

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略记载: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大巫山在古代又称丹山,丹山之西,恰好正是宁厂盐泉所在之地。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认定,夏代始于公元前 2070 年。可以推断,作为夏启之臣的孟涂入巴莅讼,其时大约在公元前 2060 年左右。夏启袭位后,即放弃其父禹所都之地——阳翟,将政治中心向西方迁移,建都安邑。安邑之地,临近河东解池,可见启欲将盛产食盐的解池牢牢控制在手中。据考古专家研究,晋南地区此时期普遍发现有一种叫做蛋形瓮的陶器,形体高大,是为储盐的器具,另外还发现有一些特殊的房址,亦可能是储藏食盐的仓库。三峡地区虽然远离夏都,但早期巴人以盐立国而致繁荣兴盛,以天下为家有的夏启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故派遣孟涂入巴主持讼事。

孟涂到巴地的目的,本来是来司神的,却干起了主持诉讼的副业。孟涂的这一系列行为,无非是在当地建立权威,笼络人心,进而控制巴盐的运输和贸易。

围绕这笔天降财富,最为令人唏嘘的争斗却发生在巴人内部。这就是著名的廩君和盐水女神的故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谓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天日,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从这段记载来看,巴人先祖之一的巴氏五姓,起于武落钟离山一带。这个武落钟离山,据《水经注·夷水》说就是假山,又说山有难留城。《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长阳县”条

下也记有留难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廩君所出处也。”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的清江北岸。那时的巴人五姓尚没有君长,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相约通过向山洞中投剑来确定君长。其他四姓的人都没有投中,唯天生神力的务相一投而进,让大家十分惊叹!但是四姓之人认为就此尚不具备资格做大家的君长。于是又加赛造土船,结果务相造的土船不但雕纹画栋,而且结实实用。其他四姓的土船还没乘到江中就沉没了,独务相驾舟在江中航行自如。于是众人叹服,共同推举务相为首领,号称廩君。

廩君在这场选战比试中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文治武功。他是一个志向远大而意志坚定的人,他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国家”的政权,廩君深知扩张势力和获得支撑国家的财富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两个目标。其实,这两个目标是可以通通过一件事情解决的。廩君胸有成竹,他知道即将有一场战争要发生。但他未曾料到,同时有一场难舍的爱情正向他袭来。

廩君的目标是温婉可人的盐水女神!

廩君率领族人从夷水下至盐阳。盐阳的主人盐水女神早就听说了廩君的英雄故事。现在,当这位传说中的阳刚、智慧的男人站到自己面前时,即使贵为“女神”的她也倾倒了,在她的心中,廩君刮起了一阵阵的风暴。她一见倾心。被爱情击倒的女神,来不及观察廩君脸上的杀气,来不及细想这位不速之客的居心。盐神完全放弃了警惕,她只顾向心中的偶像忙不迭地讨好,她想与他结为连理。她想向廩君献出自己的大礼,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善良的女人向廩君说:“我们这里地盘很大,又出产鱼盐!希望你能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

在美丽、善良的女神面前,在浪漫的爱情面前,廩君的心曾经有一些动摇。他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他脸颊的杀气却慢慢退了下来。在廩君的默许下,盐神天天夜晚来与廩君同宿,试图以柔情俘获他的心。天亮以后,盐水女神就化装成她们的图腾,与众多族众一起,在廩君面前跳起了飞翔的舞蹈。她们的图腾看起来是一些昆虫,美丽而毫无杀气。

廩君在这样的温柔乡里度过了十余天,他差一点就此迷失在蜜一样的日子里。但是有一种盐阳才有的东西始终萦绕在心头,这个东西在提醒他,他必须从梦里清醒过来,他需要斩钉截铁地斩断这段情愫。

廩君想让他的情人离开得甜蜜一些。他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十分浪漫,但又充满悲情的杀戮计划。他派人给盐水女神送去象征爱情的青色丝巾,深情地说:“你戴上它吧,那表示我们互相爱恋。我愿与你同生共死!”痴情的女神接受了廩君的爱情宣言,佩戴上了爱的丝巾。她脸上充满了爱的喜悦,图腾舞跳得更欢了。丝巾在众多装扮成昆虫的舞者中飞



巫山神女故事的原型可能就是盐水女神,这是画家傅抱石笔下的女神画像。



宋玉——这位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也许知道盐水女神和巫山神女的关系。

扬,显得那么轻灵和醒目。站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观看这场盛会的麋君,瞄准青丝巾,弯弓搭箭向她射出了决裂之箭。可怜的盐水女神中箭而死,漫天飞翔的“昆虫”四散而走。舞会在盐水女神不解的目光中停止,阳光照耀下来,流淌的鲜血像鲜花一样绽放。

在后来的巴人后裔中,这段凄美的爱情成了祭祀歌谣的一部分:

麋君姬兮为女神,神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共兮皆随唱,何以斗兮使勇武?
中箭落兮为鬼雄,魂魄飞兮在天灵。
神逝去兮天地在,歌巫祭兮以安神。

盐水女神至死也不明白她深爱的麋君为什么要杀她?盐神与麋君不可理喻的爱情,

也许早就被人注意到了。作为这个传说的“修订”版,“巫山神女”的传说就把楚襄王和巫山神女间的云雨故事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很可能,后来的楚人也不能理解麇君的乖张。

麇君自己知道这个理由,那就是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东西——盐。

盐,一种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白色结晶物质,对当时的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人很难体会没有盐的痛苦。还原远古时代的生活环境,我们才能理解盐对远古巴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可以一生不吃鱼,却不可一日无盐;有水之地必有鱼,但并非有水之地必有盐。盐就是这样一种物质,它对于古代的人类,正如石油对于今天的世界。谁掌握了盐,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这就是这个怪异故事的真相。真相背后的杀伐故事,其实要一直延续到千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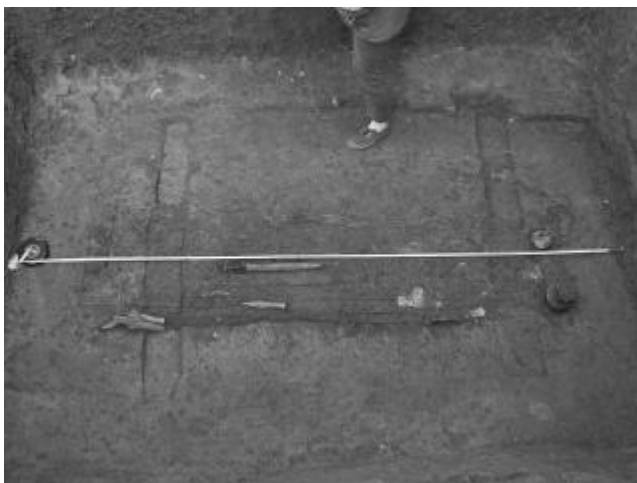
巴国丰富的井盐,让周边强邻眼红不已。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已经兴起成为江汉地区的大国,他们参与中原的争霸活动,并灭掉了大量江汉平原的小国,国势日盛。这时候,楚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部。公元前 634 年秋,楚以“夔国不祀祝融与鬻熊”的强词夺理式的理由,派遣成得臣与宜申率大军攻打夔国,很快就灭掉了夔国,并将夔王押回楚国郢都。随后命令成得臣在夔地筑城,驻守原夔国地盘。夔国的主要领地在今巫山、秭归一带,很可能还包括了清江流域的一些地方。至今,三峡的夔门就是由夔国而来的,瞿塘峡也被称为夔峡。夔国的上层统治者来自于楚国王室,但其下层普通大众却是巴人。



三峡地区发现的春秋中晚期楚文化陶器



三峡地区出土的具有秦文化遗风的西汉铜蒜头壶



奉节营盘包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墓



三峡地区发现的战国中晚期楚文化铜器

紧接着在公元前 611 年,楚国乘着庸人与其交恶,联合巴、秦两国灭掉了庸国。庸的政治中心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楚国通过这一次战争,不仅控制了原属庸国的鄂西北与渝东北交界的广大地区,更加强了对现今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的控制和统治,并修筑了城池。

近年来,在巫山大宁河内的蓝家寨遗址,瞿塘峡东口的大溪遗址等,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以鬲、盆、豆、罐等陶器为主的,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一批遗存,而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巴文化系统遗存基本消失。清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也与巫山地区的相一

致。为此,从考古学上证实了这一段历史。

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的楚国为什么对西部的这片高山大川感兴趣?当然并不全是为了扩张领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控制了盐。在这片地方,有两大著名的盐泉,一是清江流域的盐阳,一是大宁河流域的宁厂。当时,楚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既不能直接获取海盐,中原的池盐也鞭长莫及,而楚国原先所控制的地区是基本不出产盐的。有了三峡东部地区的这两大盐泉,对于巩固楚国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同时也解除了民生之忧。这也为后来楚国的强大和扩张奠定了基础。

巴人的盐业不仅吸引了楚国贪婪的目光,拥有“虎狼之师”的秦国亦加入了劫掠的行列。三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

战国中期,楚王就认识到秦有吞并巴蜀的意图。秦国的司马错就认为:“(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著名盐史专家任桂园教授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三峡的盐业资源。

楚国首先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楚威王(前339—前329年)时,先是派遣将军庄乔将兵循长江而上,扫荡了“巴、蜀、黔中”以西的广大地区,进一步拓展在西部的势力,最后庄乔进入云南境内,在滇国称王。到秦灭巴蜀之前不久,楚国曾出兵峡江地区助巴平乱。《华阳国志·巴志》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楚国军队在巴国平乱后,是否得到巴国三城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设想楚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峡江地区的,其军队很可能并没有撤出巴国。或许控制了巴国的一些地区。

巴与楚相争,自然远不是楚国的对手。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繁荣一时的巴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舞台上,昙花一现后就永远地沉没在历史的烟波之中了。巴国财富的角逐者变成了秦、楚两国。就在巴、蜀被灭的同一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秦国在巴蜀地区开始直接与楚国正面交锋。秦占领黔中以后不久,可能楚国又反攻收回了失地。到了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又使司马错伐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公元前278年,白起大举攻楚,拔郢,楚襄王败退陈城。约公元前278年,楚人又再度反攻,曾经一度反攻夺回黔中郡。公元前277年,秦再“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黔中郡一带主要有郁山盐泉。这一带的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目前尚难有证据说明秦楚是围绕这些盐泉开战的。但在三峡地区,在忠县涪井盐泉所在的涪井河流入长江交汇处,近年来却发现了大量的战国中期楚人土墓。同样的发现在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地一再出现。这些随葬品以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文化墓葬,从分布范围看,它主要集中在沿长江干流一带,这些地点要么附近有盐泉,要么属战略要地。同时,考古专家们也注意到,在深入长江支流内的盐泉出产地,却很少有楚墓发现。典型的楚墓多数就在出产盐卤的支流的入江口,说明楚人并不直接涉及盐业的生产,但却控制了盐业运输和流通的关键之地。显示楚人一改春秋时期直接占有的作风,变得更注重间接控制,以继续利用巴人及其盐业生产技术为楚国服务。

第二章 五千年盐业生产 历史的见证——忠县 井沟

1. 中国通史——中坝遗址的发掘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三峡”展厅，有一面高达6米的土幕从屋顶悬垂而下。这一片土幕宽约4米，自上而下布满了一道道不同颜色的土，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陶片。如果观看仔细的话，可以看出不同土色中的陶片是不一样的。这一幕土墙很薄，不过1厘米厚，绝不是一般的地层复原，它是从一个真实的考古发掘“探方”剖面壁上揭下来的，所采用的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强力胶布，粘贴在探方壁上，就可以从上面揭下一层“皮”来。

“土幕”不仅出现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也有一块胶布与其他国宝文物一起静静地躺在保管箱里。这两块土幕来自于同一个遗址。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土幕，本来有12米多高，但由于展厅高度限制，人们不得不把它截去一半。这个巨大土幕来自什么遗址呢？

这个遗址的发现令人震惊，其发掘令世界关注；它被誉为三峡库区最具价值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说：“谁能解决它的性质问题，谁就应该被评为院士。”它就是神秘的中坝遗址。目前，中外专家正携手试图破解其中的众多谜团。

“中坝”这样的名字在三峡地区比比皆是，那些江中的沙洲很多都叫“中坝”。但是我们要



用胶布粘取下来的中坝遗址的部分地层



胶布揭取后裹在一起的地层



河中的土堆即中坝遗址,近处的石圈为盐井。



忠县井河三维鸟瞰(中坝为制盐遗址、瓦渣地遗址专门生产制盐用的陶器,崖脚墓地则发现了大量的楚国入侵者墓葬)。



中坝遗址发掘场景

谈到的这个中坝和一般的江心小洲很不一样,它的历史是如此悠久,甚至超过了一些小洲的形成年龄。这个遗址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忠县井河,面积不大,总面积也不超过约5万平方米。

在多年以前,中坝这个地方仅为当地人所知,它一直在那里默默地沉睡和成长,而很少有外界的人注意到它。因为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它太偏僻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似乎不会与它挂上钩。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当时来自四川省的一批文物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它。那时,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已经在拟议中,人们为了避免一些古文化遗址被淹没,开始调查沿江的一些古代文化遗存。调查者在忠县境内行走时,听说井河中的一个地方到处都有他们需要寻找的东西,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井河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发源于重庆市梁平县南境,自北向东南流经忠县县境,在忠县县城东北约3公里处注入长江。井河的上游名黄金河,在忠县黄金镇绍溪与同发源于梁平县西南、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忠县县境的威家河汇流后,始称井河。考古调查人员从井河入长江口处开始,沿着河谷地带向上穿行,所过之处地势并不开阔,似乎并不是古代人类喜欢的活动场所。当他们经过半天6公里的跋涉,抵达一个以这条河命名的场镇时,发现虽然两岸依然高山耸峙,但河谷地带却陡然开阔了许多。在这条小河的江心,有一大片高耸的土堆,经访问,这个土堆的名字叫“中坝”。中坝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坝遗址那些陡峭的断崖上,那些河滩上,到处都是红色的、灰色的陶器残片。这些陶片

的火候不是很高,应该是远古的一些遗留。

令所有人惊奇的是,这个所谓的土堆,竟然是由陶片、人工石片、动物骨渣堆起来的!虽然也有大量的土,但好像土却是夹杂在人工制品之间的,与一般的遗址完全不同。考古专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在土里寻找远古的人工遗物,而这个遗址,随手一抓,却泥少遗物多!他们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像这样大体量的堆积,需要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垒积成一座小山样的土堆?如果是生活的废弃物堆积,又需要多少人打烂多少个陶罐,用残多少把石斧才能形成如此壮观的景象?须知,中坝遗址的江心洲有近 7000 平方米的堆积,加上河流两岸的堆积,面积几近 50 000 平方米!

当时,专家们在这个遗址上试着开挖了三条长方形小沟。他们想知道眼睛所见到的是否仅为表面现象,他们想深入遗址内部看一看。从试掘情况看,遗址完全印证了他们的所见,而且在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还有很深厚的堆积。最后出于安全考虑,考古者们放弃了继续下挖的念头,而且来不及细细思考这一奇怪的发现,因为还有其他的调查任务在等着他们。自考古者走后,人们除了知道这个遗址的名称外,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中坝似乎被遗忘了。

但像中坝这样的遗址注定是不会沉默太久的。将近 30 年后,它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失忆的神经。1987 年,全国开展文物大普查,中坝遗址被重新发现和确认。这一次,它没有再让人们从它身边溜走。由于考古学科的进步,中坝遗址独特的堆积景观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们感觉这个遗址太特别了!太不可思议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文博研究单位,在了解到这一世界少有的遗址后,纷至沓来,多次对该遗址进行深入的调查、复查。人们站在高高的江心洲上,想知道地下究竟埋藏有什么秘密?想知道这座巨大的土堆上,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在 1990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试掘。通过这次小面积的试掘,人们开始感觉到这个遗址的历史太悠久了,而且有十分重要的发掘价值。于是,进一步的大规模发掘计划开始酝酿。

正在这时,三峡工程的修建加快了这一计划的进程。按照三峡水库的蓄水计划,中坝遗址将在 2007 年被由长江倒漫进来的江水淹没,最后,它最高海拔 147 米的身姿将永沉江底。时间的发条已经上满,必须抢在江水来袭前让这个遗址得到抢救,必须让那些地下的宝物吐露全部的秘密。

1997 年,按照重庆市文化局的安排,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支援三峡文物保护发掘工作中,承担了忠县中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说它艰巨,是因为发掘工作量太大;说它光荣,是因为这是三峡库区最为重要的地下文物点之一,被列入了最高保护级别——A 级发掘。

主持发掘工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孙智彬。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的考古人,已经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可谓久经沙场,具有极为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高深的学识。孙智彬的个头并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作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余名领队之一,单位之所以选派他来发掘中坝遗址,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是一个有韧劲的人,而且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孙智彬当时已经预料到这可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抛妻别子,来到了三峡,准备



中坝遗址深达 12 米的古代人类文化堆积

迎接即将到来的发掘工作。他带领一帮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中坝的地下秘密。发掘工作艰苦而漫长,须忍受长时间的单调和寂寞,须牺牲家庭生活和个人的业余爱好。孙智彬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工作光是野外发掘就耗时 8 年!在年复一年的发掘工作中,除了夏季和春节可以停下手中的工作外,其余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这座遗址!孙智彬手下的考古队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却唯独只有他——工地的负责人,一直枯守着这片文化遗产。8 年以后,当他丢掉手铲,从最后一个探方中抬头仰望天空,他感到天色是那么的蓝,身体是那么的轻松,心是那么的自豪。对于他来说,俯查大地的颜色太久了,天空的颜色、树木的颜色都是那么的久违,就像千年遗址重见阳光一样,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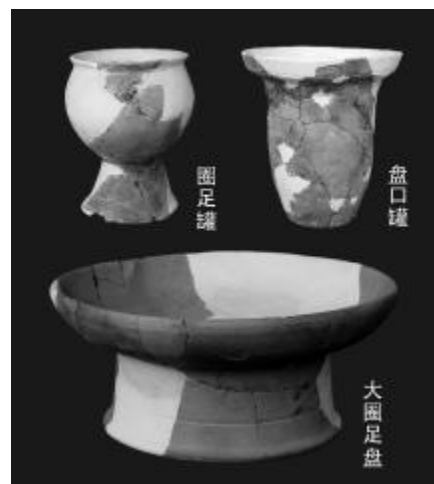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在孙智彬的手中 8 年来如画卷般展开。从 1997 年至 2003 年,遗址内发现的房址、灰坑、墓葬、灰沟、灶、路、墙、窖、水池等遗迹有 1414 个,出土的文物包括:陶、瓷、石、骨、铜、铁等质地的各类器物小件 4035 件,经过整理统计的出土器物 144 490 件,另有陶片 2643 袋,总计约 20 万件。面对枯燥的数字,你无法想象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20 万件出土文物总量,相当于一个国内大型博物馆的藏品数量!

虽然自始至终都没有太多的重器出土,但这依然是令人震惊的发现。让历史说话,多数时候并不需要那些精美豪华的东西,历史也并不完全是帝王将相书写的。对于三峡地区来说,只要能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要能窥见一些历史的影子和历史的足迹,就已经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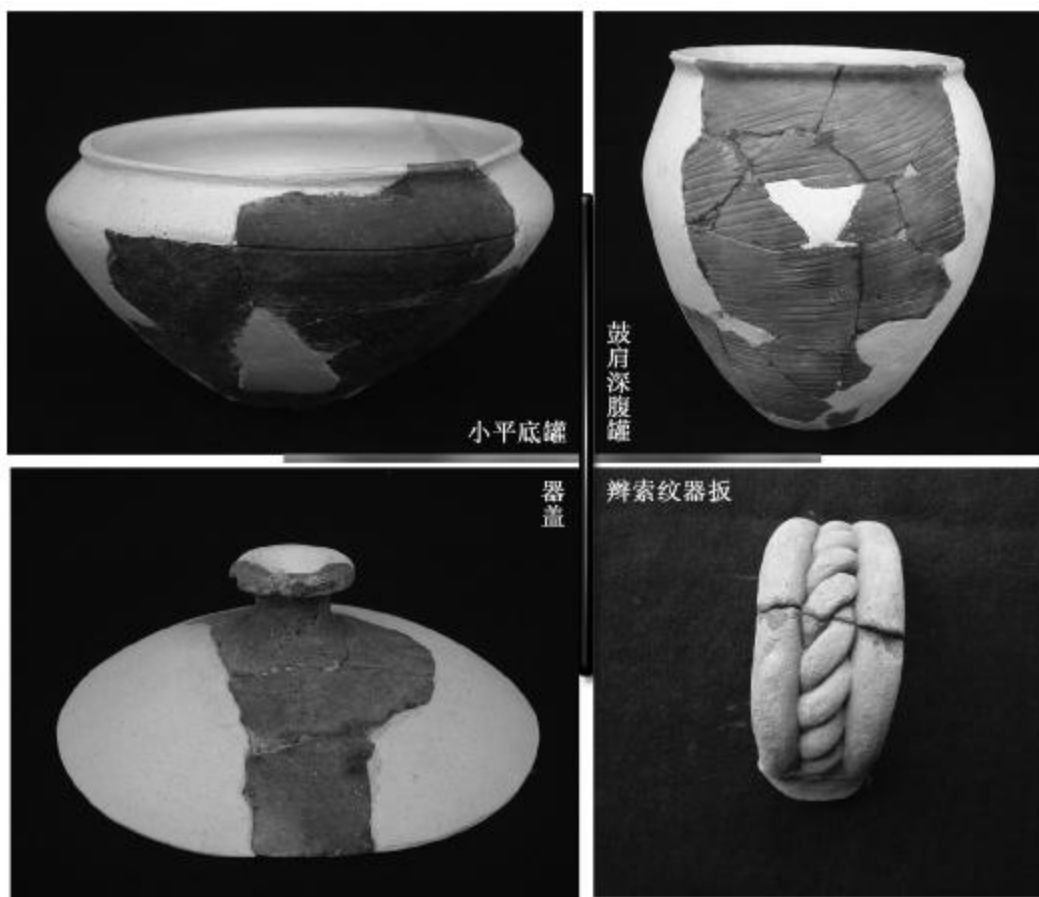
事实上,众多的遗迹和遗物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让我们看一看考古者们花了整整 8 年的时间来逐层剥离的“通史”:这是一本迄今世界上最为厚重的书,书的厚度最多可达 12.5 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总共书写了 70 余页。书页里的文字多是用陶片、动物残骨、石制品和各种遗迹写就的。

孙智彬们阅读了这本书的真义,虽然有些地方还近似囫圇吞枣,需要慢慢消化。但是,专家们说,像中坝发掘的“通史”式遗址,在国内属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同时,该遗址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生产类遗址,填补了我国这类考古遗址的空白。书上记录了12个时期的“事件”: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西汉、南朝、唐、宋和明清,十分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前至今连续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

——距今 5000 ~ 4600 年间,中坝有了第一批人类,他们的足迹遍及盐井河两岸。考古学者们将这批人类创造的文化叫做玉溪坪文化。那时候,中坝一带水草丰美、山林茂密,人们主要以渔猎为生,并将捕获到的动物肢解,分给族人享用。农业仅处于辅助的地位。盐业考古专家们说,可能中坝人已经开始了制盐,



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



中坝遗址出土的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陶器

并将盐当做商品进行交换。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也许正是他们首先在中坝发现了宝贵的盐泉。

——时光翻到了距今约 4600~3800 年,中坝已从一个荒僻小村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那时候,人们完全继承了玉溪坪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顶峰,进而有了一些新的创造。考古者们为了区分于前一阶段的文化,将这一时期中坝人留下的遗存作为当时整个重庆地区土著文化的代表,称为“中坝文化”(或“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的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制盐,因为制盐活动的频繁和繁荣,故人们留下了大量的废陶器残片。但是在中坝文化末期,由于整个峡江地区遭遇了一场来自自然界的劫难,中坝文化没落了。而这场灾难就是遍及全球的气温下降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三峡地区的渔猎采集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坝的盐业经济可谓独木难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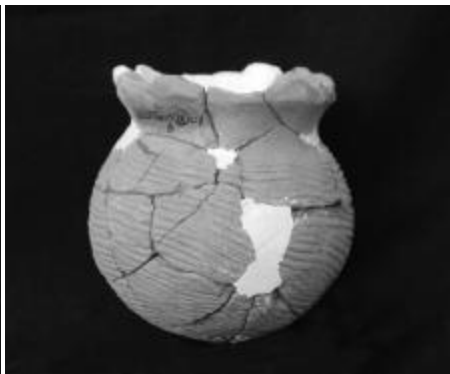
——夏代至商代早中期,一支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统治了整个三峡地区,这个文化叫做三星堆文化。在中坝,三星堆文化彻底替代了中坝文化,考古者们无法判断是来自三星堆文化核心地区的人们占领了中坝呢?还是原有的中坝人在强大文化的攻势下,受到影响而“三星堆”化了呢?抑或是三星堆文化本来就是包括三峡地区的古人在内的人们适应了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共同创造的呢?他们无法做出结论,他们只是从那些成堆的陶片中看到了人们用具的变化,看到了传统的中断。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种完全迥异于三星堆文化的考古文化再一次出现在中坝,这种文化被称为石地坝文化。考古者们说,或许石地坝文化及鄂西地区的同时期文化的西进,甚至使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也被十二桥文化所取代,而后的内核里拥有太多的来自东边的文化因素。在中坝厚厚的地层里,石地坝文化的地层恰好紧紧压在三星堆文化地层之上,那些残缺的、完整的尖底杯堆积厚达几米,并且其大小接近一致,人们认为,尖底杯正是中坝人的制盐工具。看来,经过风风雨雨后的中坝,其盐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了!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一种叫做“花边圜底罐”的东西频频出现在考古者的视野



中坝遗址出土的角杯、尖底盏



春秋时期的花边圜底罐



近代沿海的盐田

里,它取代尖底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堆积,而且也是中坝遗址中堆积最为深厚的遗存之一。那时候,这些圜底罐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颈部收束,器身布满了绳纹。那时候,中坝人既饲养家畜,也大量狩猎野生动物,以弥补肉食之不足。人们的食物构成中,主要以旱作农业的黍和粟为主,而水稻的比例则相当低。

——战国时期,花边圜底小罐继续存在,只是更加小了,口部变得越来越直。与圜底罐共存的还有少量的带三足的陶甗,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楚人文化的色彩。巴与楚,这是一对能够使人产生强烈联想的字,总是让人浮想起金戈铁马一类的词汇。事实上,巴与楚,可能确实在这里有过交锋。此外,这里还发掘出了东周时期的房址 300 多座,显示当时人口的增多和盐业加工能力的增强。

——汉唐时期,中坝发现的陶器突然大大减小了。考古者们说,那是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导致陶器的使用量大大减少,而铁器却经久耐用。在汉代,中坝还发现了一些所谓中国最早的“龙窑”之一。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坝的土著文化基本消失,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已经完全与中原地区一致。孙智彬说:“频繁交流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政治因素,是三峡地区土著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

——宋元时期,中坝的财富累积越来越多,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填满瓷器的窖藏。窖藏中出土的铜、铁、瓷器达 108 件,有锅、碗、瓢、盆、盘、碟等,基本囊括了日常生活用品,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部分瓷器表面虽然黏连了代表岁月的土锈,但依然难掩其灼灼碧光。这些重见阳光的瓷器,经重庆市博物馆专家陈丽琼鉴定,属于当时著名的五大名窑——龙泉窑的产品。它们是从遥远的地方运输而来,再从商贩的手中转到了中坝人的手中。中坝,以它的盐换来了这些当时堪称奢侈品的东西,依稀可见当时商业贸易的繁华。



中坝遗址“龙窑”的发掘



盐井河畔的盐井

——明清时期,中坝附近的盐井河两岸兴起了 72 口盐井,每一口盐井内都有流不完的卤水。那些盐井深达十多米甚至几十米,井沿上则被卤水桶磨得十分光滑。当然,这些盐井盖虽然高出河面许多,但仍时不时遭到洪水的侵袭,淡水漫过井沿流入井中,致使当时的煮盐设施亦时不时地面临毁灭的危险,而洪水淹没之处,也留下了大量的沙层为考古者所发现。

中坝,就这样向人们展示了它的五千年文化、文明史。孙智彬说:“中坝遗址考古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了解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三峡地区古代土著居民的详尽情况。”中坝因为具有三峡通史式的性质,1998 年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参观中坝时,亦深深为中坝遗址的考古发现所震撼,同时也为其迷惑不解,他认为这里面隐藏了巨大的秘密需要揭开,他说:“谁要是能解开中坝的秘密,谁就能做院士。”

2. 令人费解的尖底杯与圜底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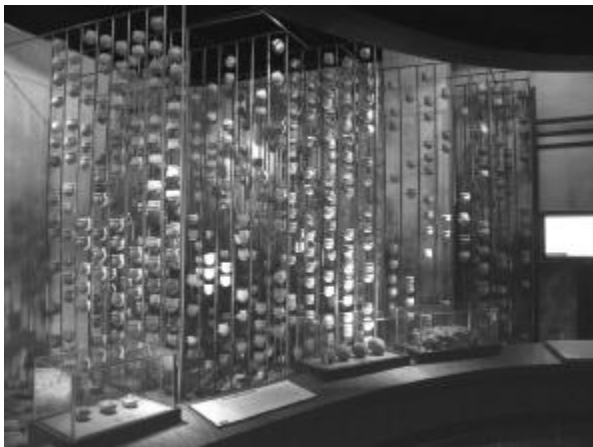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移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是在“远古巴渝”展厅,有一个十分惹眼的场景,也是一个极富创意和充满想象力的场景,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场景。

这个场景由 800 个土陶罐组成! 它们的颜色比较一致,那些陶罐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见的经过修复的夹杂白石膏颜色的陶器,它们每一个都是完整的! 陶罐的大小一致,形态相同,均为圜底、小口,口部捏有花边。

这些圜底罐不太好放置,因为它的圜底形态不稳定。展览者想了一个办法,把圜底罐放在一个个的钢圈上,钢圈套在圜底罐底三分之一处,使其稳稳地立在那里,这样就解决了圜底罐的搁置问题。那些钢圈被焊在一根根竖立的钢管上,每一根钢管上距离不等地焊接了几十个钢圈,而钢管则树立了几十根。这样,被放置在上面的陶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形成了很好的欣赏效果,极富气势。

作为一个展览,形式美当然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全部,它必须为内容服务。那么,这个场景背后所要反映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那些钢管是插在细沙地上的,而且有一些红色的光线时不时地



三峡博物馆内圜底罐制盐陈列场景



三峡博物馆内展示的圜底罐制盐工艺



考古队资料整理场所之一：塑料筐里堆满了圆底罐

在陶罐上晃来晃去。那些红色的光线是从参观者脚下发出的。一块红色的绸布在鼓风机的吹动下,向前飘摇着,时不时地露出红光,好像火苗在跳跃。沙地、“火苗”、陶罐这些元素就是展览者要表现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仍然显得太过隐晦,使观众难以明白。观众理解不及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将要在后文中探讨的秘密。

其实,看似数量庞大的完整圆底罐,与三峡库区的一个县——忠县文物管理所的库房内的完整圆底罐的数量相比,也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且这八百个圆底罐,正是从那里调集而来的。也许,若干年后,当忠县博物馆建立起来后,人们就会轻易地看到更多的圆底罐。

在亲手抚摸过这些圆底罐的孙智彬看来,即使忠县文物管理所库房内的陶罐,也远远不是他所见过的圆底罐的全部。因为这些圆底罐来自于他发掘的中坝遗址,他知道,那些数量庞大的圆底罐也不过是所有圆底罐中的极小部分,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中坝的圆底罐简直太多了!在12米多深的文化层中,圆底罐最先出现在靠近下部的商代地层。商代的圆底罐较多,器壁较薄,可以称之为圆底釜。进入西周中晚期后,圆底罐器身变得接近椭圆,器壁开始增厚。春秋时期,圆底罐变得更小了,器壁变厚,器表装饰粗疏的绳纹,颈部收束,器口捏压粗花边。战国时期,圆底罐进一步变小,器壁更厚,但口部不再收缩或略收缩,变为直口。此时,圆底罐已多到占出土陶器总量的95.98%以上!战国



忠县文物库房内的小花边圆底罐

以后,历经近千年的花边圜底罐突然消失,至此失去了踪影。

中坝的圜底罐虽然各时代略有区别,但在同一时期,圜底罐的大小和形制却是非常相近的,尤其是在春秋时期。中坝除了大量完整的圜底罐外,更多的是圜底罐的残陶片。当考古者挖掘到这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地层时,他们的眼中几乎全是圜底罐陶片。这些陶片太多,屋内的库房和考古经费都有限,以致收集它们竟变成了一种负担。到后来,人们只有将那些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陶罐收集回去。而那些残陶片,就随着泥土一起倾倒了去了。

这些圜底的陶器并不太精美,甚至可以用粗糙来形容。因为它的表面既不光洁,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纹饰或图案,而且胎质中掺杂了许多石英砂。考古者们一时难以想象它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当时的人还要大量使用和拥有它?

类似的疑问还出现在中坝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文化层内。孙智彬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虽然商代已经出现圜底罐,但数量很少,那时的主导器物却是一种叫做尖底杯的器物。尖底杯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人们在距中坝遗址6公里远的长江岸边,进行调查和试掘时,首次发现了这种器物。顾名思义,尖底杯的底是尖的,人们最早见到的尖底杯,是一种夹杂大量细粉沙、红色的、敞口的、近底部有一道凸棱的、胎壁较薄的杯,很像羊的角,于是考古学家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角杯。除了角杯外,考古发掘中还常能发现另一种尖底杯:器表常磨光或泥质灰陶、基本不含沙、器壁极薄的、大口略收的、器形较大的杯,其形状与炮弹很接近,考古学家们于是将这种杯起名叫做炮弹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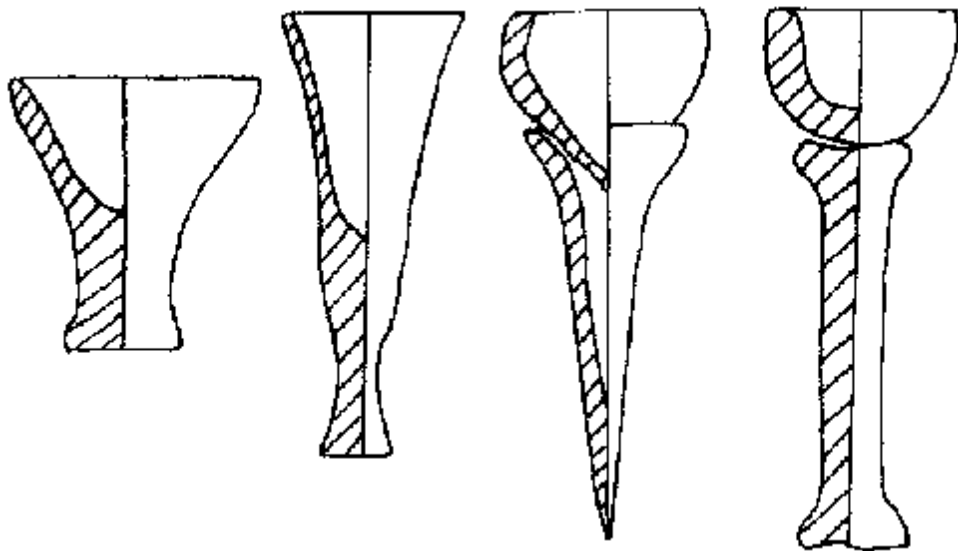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发现的尖底杯主要是角杯。它主要叠压在含大量圜底罐堆积层的下面。这些由角杯为主堆积起来的文化层,陶片比土还要多!人们在发掘时,为了剥离下这些器物而不伤及其余,常常无从下手。

尖底杯和圜底罐——中坝最常见、数量最多的两种器物,是最容易引起人们思索的。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它们的用途?是什么人在用?其堆积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但在所有的这些问题面前,有一个问题是普通人都会想到的:圜底和尖底具有不稳定性,加之没有发现放置它们的器座,它们是如何放置的?



炮弹杯和角杯。炮弹杯上下颜色的差异显示:可能是制盐过程中二次受火所致。



德国赛勒河流域井盐生产所用陶器,这些陶器的组合引发了人们对灯形器和尖底杯(圜底罐)组合的联想。

最早,人们怀疑这种器物的器座不是陶质的,而很可能是木质或竹质的。尖底杯和圜底罐盛行的四川盆地,盛产竹子,只要将其中间任意截取一段,其空心部位就可以安放尖底杯了。角杯的口径呈圆形,约有5~8厘米大小,长有8~15厘米。从其尺寸看,一般的竹子内空稍大,不是很好直接套接;而且由于尖底杯是逐渐由大变小的,所以竹子的器座必须要比较长才行,这样由于重心的向上偏移,其稳定性依然不是太好。

但是,竹子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见到它的机会微乎其微。事实上,在所有的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这类器座。是否尖底器和圜底器就没有器座了呢?有的考古学者指出,早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两湖平原的大溪文化就盛行圜底器,而与这些圜底器共存的就有大量的陶支座。每三个支座放在一起,就能解决圜底器的平稳放置问题!

支座虽然能很好地支撑圜底器,但却不能支撑尖底器。况且重庆峡江地区至今也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陶支座!看来使用支座来支撑的说法难以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是,许多考古工作者仍然深信这类器物是有器座的。

这个问题甚至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加拿大曾经有一名学者,在观察了三星堆文化的一种中空的“灯形器”之后,认为尖底杯(包括一种叫做尖底盏的器物)可能是放置在灯形器上面的。灯形器一般是磨光陶,上部有一个酒杯状的器身,中间是一节十分长而细的柄,下部外敞以便稳定搁置。灯形器上、中、下三部分中间是连通的,不能盛装液体或粒小的东西。许多学者因其精美且缺少实用功能而认为灯形器是一种法器!将尖底杯或尖底盏置于灯形器上,其大小和搁置吻合程度都很合适,难道尖底杯是巫师作法时用的道具?显然不是。尖底器的数量太多,与灯形器相比,大多数也过于粗糙,显得极不协调。最



三峡水库二期回水后的中坝遗址

重要的是,外国学者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两者盛行的时间段完全不同,属于张冠李戴。灯形器出现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而尖底杯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尖底杯并非不可能与器座相配。20世纪90年代初,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发掘了一批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古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带有圈足的尖底杯,这些与尖底杯紧紧连在一起的圈足,完全起着器座的作用!这表明,尖底杯原先可能是搁置在器座上的,后来发展到器座与尖底杯粘连到一起。尖底器中的尖底盏,发展到战国晚期时,亦出现了圈足,被考古学者称之为“巴蜀式豆”。

尖底器和圈底器的放置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功能问题却是最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决定性的。最早注意到这个深层次问题的是忠县文物管理所的曾先龙先生。曾先龙是一名落户忠县的重庆知青,长期从事忠县文物工作,对忠县的历史文化了解极深。在多年的工作中,他感到忠县的盐文化在古代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忠县古代的一些历史,多与生生不息的盐业相关联。但苦于缺少直接的物质材料,难以对古代的制盐工业进行详细的研究。

1997年下半年,三峡工程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正式拉开了大幕。忠县库区的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将要沉没江底。对于这些古代遗址的抢救发掘,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机遇。也许,曾先龙们关心的问题将在江水到来时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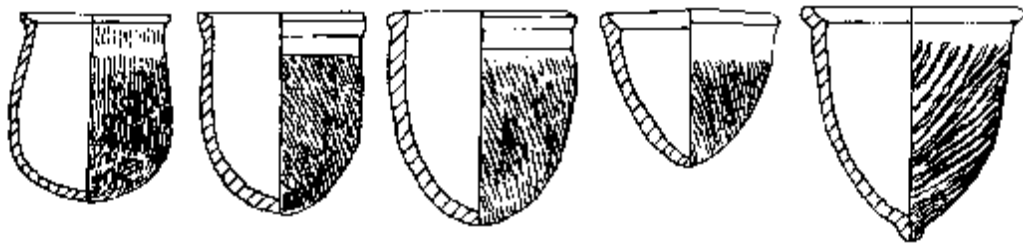
那一年,在忠县境内有两支重要的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来到这里支援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其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正是我们前文说到的中坝遗址,而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了盐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和崖脚墓地。北大考古队的领队是孙华教授,他是一名四川人,长期关注着西南地区特别

是四川盆地的考古工作,在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着力极多,著述甚丰,堪称这一领域的权威级专家。北京大学考古队的发掘首先在哨棚嘴遗址开始。参加这一遗址发掘的除了少量北京大学的学生外,主要是当时集中在孙华等北大教授们手下进修的重庆市的一些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哨棚嘴遗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属于当时所谓的~~窖~~井沟遗址的一部分。在这次工作中,哨棚嘴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东周、六朝等多个时期的大量文物,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其中,有的发现还属于重庆地区文物考古中的第一次,改变了人们对重庆先秦文化的一些固有认识。

在哨棚嘴遗址的商周遗物和遗存中,曾先龙似乎寻找到了尖底杯的答案。在这里,角杯、炮弹杯或多或少都有出土,而且不少是完整器。在紧接着的瓦渣地遗址发掘中,也发现了少量的尖底杯和大量的圜底罐。曾先龙在这次工作中,还亲自发掘了一个探方。这个探方的面积有5米长、5米宽。当他发掘到商周文化层和新石器文化层时,出现了一些圆形的坑。坑的直径一般约有1米大小,深约0.5~0.6米。经验丰富的他发现,这些坑和考古上一般所谓的“灰坑”不同,坑壁涂满了很纯净的黏土。开始,他推测这些坑可能是制作陶器、用以和泥料的坑。因为那些坑壁的黏土是制作陶器时的最佳材料。但经过仔细分析,他旋即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和料坑的黏土应当不会只出现在坑壁上,坑内多少应有一些残留才对。那些几千年前的黏土至今仍有黏性,厚薄均匀,似乎经过特意抹平,具有很高的致密性,这会不会是储藏水的坑呢?曾先龙认为,像这种坑壁涂抹了黏土的坑,液体显然难以渗透,其储藏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他联想到工地出土的尖底杯,联想到文献上记载的古代忠县发达的盐业,这很可能是与制盐相关的遗迹。虽然有据可查的忠县盐业最早可到汉、六朝,但其盐业历史应当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许商周时期甚至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滥觞了!曾先龙为自己的想法激动不已,忠县的盐业历史很可能要改写,要大大提前!作为当时的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曾先龙带着自己的想法来到了中坝遗址。在中坝遗址,曾先龙看到了与哨棚嘴遗址同样的场景,只不过这里的尖底杯多得不可计数,涂泥的坑也要多出许多。中坝正是古代忠县著名的盐井——~~窖~~井所在地,曾先龙认为这里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曾先龙回到哨棚嘴遗址后与孙华教授就自己的想法进行了交流。孙华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些奇异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陶器,曾先龙的认识无疑为解开这道谜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要确认尖底杯、圜底罐是制盐工业的遗留,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联系的桥梁,也



山东沿海发现的煮海盐用的盩形器

要弄清楚这些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器物在制盐工业中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在当时,要在二者间寻找联系显然是困难的,或许可以先推测其功用。孙华教授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力图勾勒出古代制盐的方法和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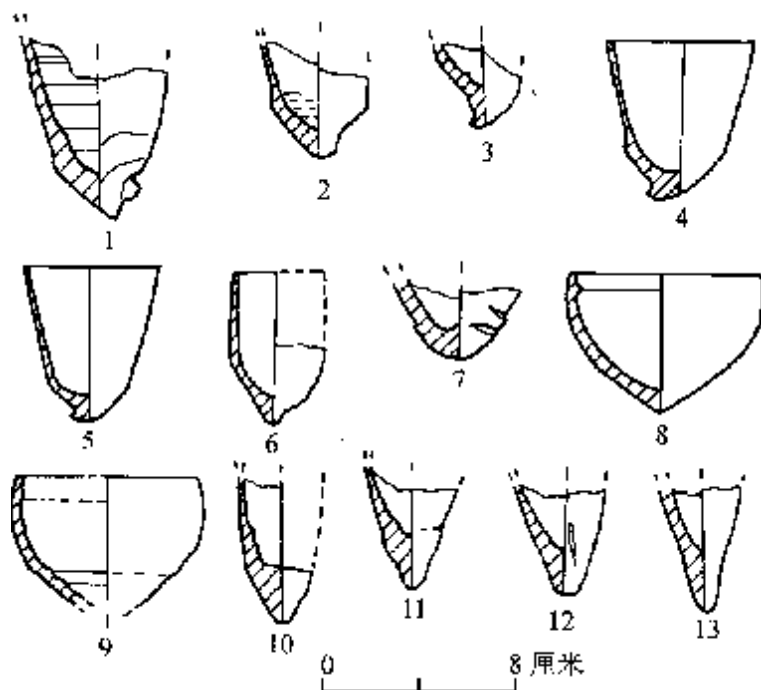
孙华先生了解到,在山东北部沿海的商周遗址中,经常发现一种圜底陶器和尖底器,由于很像古代战士作战时所戴的头盔,故被考古工作者称之为“盩形器”。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盩形器的用途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主要形成了“制盐工具”和“汲水工具”两种观点,但一直缺少确凿的科学检测数据支持。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最早的海盐在渤海南岸一带,就是周代时的齐国境内。到了东周时,齐国曾以鱼盐之利而富甲天下,并称霸一时。那么这些陶器是制盐遗存的可能性就极大了。山东和渝东地区虽远隔千里,而且一个是制海盐,一个是制井盐,看似两者全无关联,但考虑到无论是制什么盐,制盐工业的初创时期,其基本原理应当是一样的,那么两地同出的器物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足奇怪了,其内在的原因就是同为制盐工具。

既然可以基本确认尖底器和圜底器是制盐工业的遗留,那么它们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考虑到放置的难题,孙华教授和曾先龙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尖底杯是插在沙地上使用的,圜底罐也可以平稳地放在沙地上!

他们认为,这些遗址均位于江河边,两岸沙滩丰富,面积巨大。将尖底杯插入沙中,很容易就解决了其平稳放置的问题,也就不需要什么器座了。

但是沙中的尖底杯能起什么作用呢?孙华认为,古人向插入沙中的尖底杯倒入卤水,利用日光和风力来制盐。他说,峡江地区夏季日光强烈,热量丰沛,江边的沙粒在阳光照射下,可以达到炙热的 $60^{\circ}\text{C} \sim 80^{\circ}\text{C}$,这些热能透过杯壁,就能对杯内的卤液进行热传导,使卤水中的水分蒸发,很快就会完全干涸,杯底就剩下白白的盐晶了。同时,插在沙滩上的一排排密密匝匝的尖底杯,也可以利用自然风吹干,虽然要慢一些,但也不失为一条途径。

孙华和曾先龙先生的这一假说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在当时,这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一假说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三峡博物馆内的大胆而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圜底罐展览,这也就是那些圜底罐的所谓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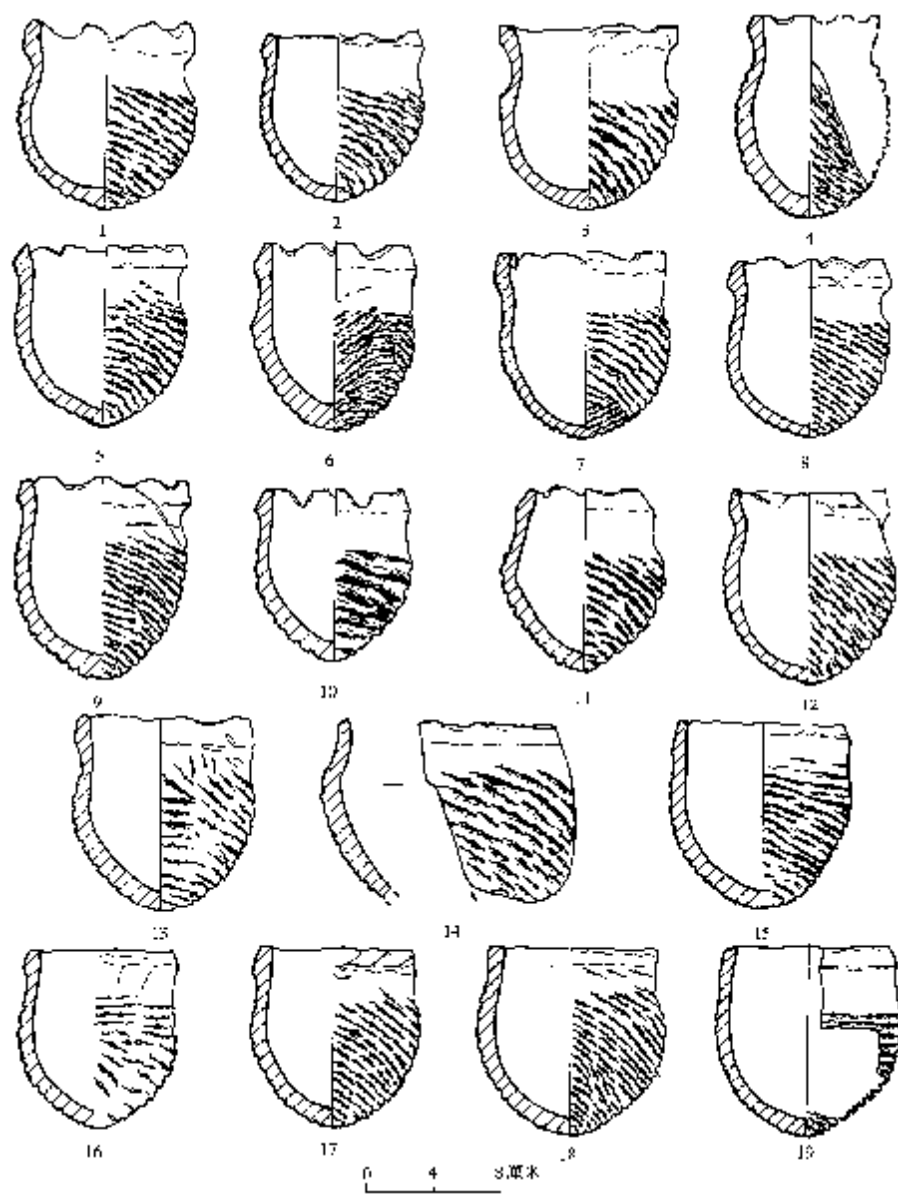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出土的角杯和尖底盏

孙华、曾先龙先生的认识无疑具有开创性,也很具启发。但是晒盐说的漏洞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三峡地区不具备晒盐的气候条件。虽然从气温上来说,三峡地区属温湿的中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在长江流域较高,甚至接近岭南地区。但是三峡的气温更多地是受到了盆地和峡谷地形的影响,空气流动性小,热量不易散去,冷空气难以进入,故形成了冬季温和,夏季炎热,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这种“高温”并不是日照带来的。三峡地区除了秋季天多晴日,云淡天高外,其余季节多阴天,而且夏季常有雷鸣电掣,大雨倾盆,是全国的暴雨中心之一,峡谷内“朝云暮雨”,变化无常的天气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在难得一见的艳阳天,由于峡谷深邃,谷底接受日照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多年气象观测表明,冬季,仅中午前后二三个小时可见阳光,夏季日照也仅五六个小时。要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晒盐,又缺少风力蒸发,是难以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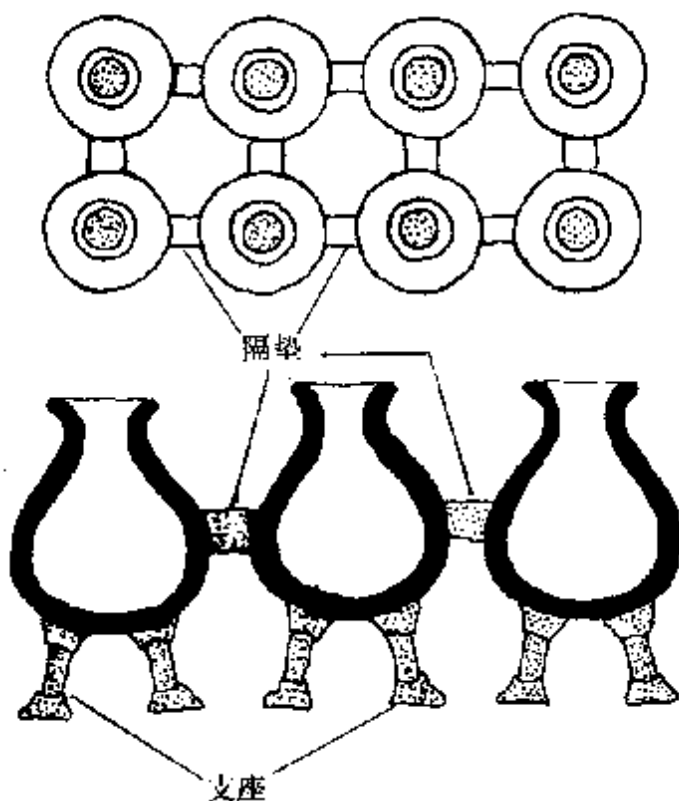
其次,尖底杯和小圆底罐一般均极小。炮弹形尖底杯一般口径约8~10厘米,高15~20厘米,可以装水约0.4~0.45千克;角状尖底杯一般口径约4~7厘米,高9~13厘米,可以装水约0.2~0.3千克;常见的小圆底罐较炮弹杯也多装不了太多。以地下卤水



中坝遗址出土的小花边圆底罐线图



近代沿海的盐田



玛雅文化圆底罐及煮海为盐示意图

一般的浓度,这样的容量只能晒出极微量的盐,难以大规模生产。如果在晒制过程中不停地添加卤水,虽可得到较多的盐分,但极大地增加了劳动量,也增加了晒盐的时间,从生产的角度看,难以维持。此外,尖底杯和圆底罐放在沙地上,虽然能解决稳定问题,亦能增大与沙粒的接触面积,有利于热传导。有过沙地生活经验的人就知道,阳光下沙地表面的沙粒温度可以很快升得很高,但下面的沙粒温度却并不高。由此看来,深插沙底的尖底杯很难得到足够的热量。而尖底杯腹深、口径小,圆底罐口径相对于器身亦偏小,甚至还有束口



近代盐场晒卤

的,它们得到阳光眷顾的面积亦十分有限,何以晒盐?

第三,据文献记载来看,我国采用晒盐技术的时代偏晚,且一般不借助陶容器,而是利用大块的平地做盐田。池盐的制作是我国最早采用“晒盐”技术的,山西解湖的池盐最早就是利用风力和日照制盐的,但在先秦以前,这种技术一直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一直到唐代,垦畦营种法(晒制池盐的方法)的成熟才使晒盐技术真正成熟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改变了池盐“天然即成”的原始方法。垦畦营种法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唐代池盐生产的发展,使池盐年产量达到 80 万担以上。这种方法也开创了制盐史上人工垦畦、天日晒盐的先河,走在当时世界晒盐技术前列,不仅为后世所沿用,而且对今日制盐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海盐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煮制而成的,“夙沙煮盐”的传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山东沿海地区商周时期海盐考古工作中,频频发现一些制盐的房址(作坊),在房址的角落还发现有煮盐的盐灶。唐代时,海盐生产还处于煮制阶段,主要有取卤、试卤和煎煮等工序。元代海盐的生产依然主要是“煮盐而后成”的煮盐方法,时人陈椿的《熬波图》共有图 52 幅,每幅图都有文字说明和诗歌题咏,记录了煮盐生产的全过程。此时海盐生产开始出现了“晒曝成盐”的晒盐方法。到了明代,海盐生产中的晒盐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盐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盐产量不断提高。从此,晒盐技术成为盐业生产中的主流。

综上所述,晒盐技术明显不适合三峡地区。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应当另有他途。

3. 制盐猜想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对于忠州,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当时忠州煮盐的盛景,亦被白居易写入诗中。他在《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一诗中写道:

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
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
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畚烟。
赖此东楼夕,风月时翛然。

.....



耸立在谿井河畔的无铭阙,应是汉代谿井因盐致富者的墓阙。

“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畚烟。”

白居易亲眼见证了唐代忠州的制盐工业。但是以中坝为代表的忠州制盐业应当自汉、六朝以来就已经间接见载于各种文献中了。

中坝遗址所在的河流名叫谿井河,谿井河虽然是一条极小的河流,但在四川盆地的制盐历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清道光修《忠州直隶州志》记载:“谿井在州北会溪中,其地产盐,相传汉关西杨震过此谿井,俗称官井。”把谿井制盐的历史推定在汉代。新修的《忠县志》亦记忠县的谿井、涂井、古市井、小井溪皆产盐,仅谿、涂二盐场就有盐井 34 口,这些盐井在民国时期还在生产,民国 8 年知事江宗海的上书中有“忠县有数千年制盐历史,数万人赖此求生”的文字。其中谿井和涂井的盐厂在 1962 年才最后停产关闭。

谿井河原名盐井溪。据《水经注》卷三十三载:“江水又东径临



盐井沟航拍照片：箭头所指为中坝遗址

江县南。王莽之盐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胸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沿注溪井水。’”这里的盐井溪水即盐溪，即现在的盐井河。同时，从这段文字看，现忠县在王莽时期一度被称为“盐江县”，后又被改称为“临江县”。

同为六朝时期的古籍《华阳国志·巴志》向我们透露了盐井的另一个名称——监溪。“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胸忍。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由此说明，盐井也曾被称为“监井”。

在这些有关忠县、盐井的故纸堆里，“盐”、“监”、“临”是始终相互纠缠的三个字。从字形上看，它们是极其相近的。或许可以这么说，“监”、“临”均是“盐”相关联或派生出来的字。“监”应是此处产“盐”，曾设盐监的缘故。据可查的文献，唐代时盐井便设有“盐监”。监字是古代政府在一些特色物产产地设立的一种特殊政府机构。“监”和“临”的字形结构几乎是一致的，显然，“临江县”的得名应与该地产盐曾设盐监有关。

相对于古老的盐井溪这一名字，盐井河的得名是较晚阶段的事了。盐井的“盐”字，一般人并不认识，查康熙字典，此字为这条河专用。“盐”原文左为两点水，右边一个“合”字，下面是一个“甘”字，据当地老百姓传说，“盐”字的意思就是二水合一，河水甘冽之意。其味或许与出盐相关。

光听盐井之名，就知道这里应当有井，这种井就是古代的盐井。盐井河所在的羊子岩一带，正是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大盐盆的边缘。万县盐盆盆底埋藏虽然深达 3000 米，但靠近山麓的盐盆盆缘则埋藏很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河流的下切作用，有许多地下盐卤汨汨地自然涌出地表。自然露头的盐泉数量有限，盐卤又容易被河水淡化，在自然盐泉周围加筑围堰，或在发现盐卤的地方凿井取卤，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浅源的盐泉或大口浅

井,出卤不多,经过长期提取盐卤,卤水的浓度可能会降低,在井盐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扩大再生产规模,势必设法加深盐井的深度。所以到了汉魏时期,这些自然露头的盐卤地点就获得了类似“盐井溪”这样带“井”的地名了。

2005年8月,北京大学地理系崔之久教授、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朱诚教授等一行来到中坝遗址,他们也早就听说了中坝的鼎鼎大名,来此开展环境考古研究工作。崔教授一行沿着现已成湖的~~潜~~井镇一带周旋了一圈,又浮舟登上仅露出一个头的中坝岛,了解了中坝遗址的埋藏状况,又驱车沿河上行至黄金镇,那里有一条汇入~~潜~~井河的支流——黄金河。崔教授在详细地看了地形和地质情况后说,中坝遗址之所以能形成堆积深达12米厚的这一世界罕见的埋藏景观,除了遗址属于盐业生产场所产生的大量遗物来填充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埋藏条件:那就是~~潜~~井河进入~~潜~~井镇,即今羊子岩公路大桥一带后,有一个巨大的断层,这个断层数万年来一直处于下沉的过程。崔教授指出,~~潜~~井河在羊子岩大桥以上部分的河床基岩出露,河道较窄,一直处于下切的过程;而羊子岩大桥以下部分突然变得很宽阔,形成一个盆地状的地形,河床底部多为砾石,基岩未出露,这是由于基岩下沉,泥沙淤积而成的。他认为,如果河床不下沉,处于河中央的中坝遗址很难不被河水冲刷,也难以形成高耸的“土岛”!况且遗址底部的海拔高度与现河床底部基本持平,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在这样的地面上生存的?而且河滩受洪水侵袭也形成不了堆积。崔教授的结论是:中坝遗址最下层的高度应比现在见到的高,与当时的河床应有一定的落差,后来断层的不断下沉导致原河床和遗址底部下沉,进而淤积形成新的河床,遗址上人们的堆积也正好填补了断层的下降!

崔教授的论断不仅从地质学角度解释了中坝遗址堆积的成因,而且提醒我们,正是羊子岩断层的存在,使古老岩层内的盐卤得以流出!这些岩石缝中日夜奔涌的盐卤,就是流淌着的黄金和财富,养活了~~潜~~井千百年来的人们!

~~潜~~井的卤水属于黑卤。冬季干旱的时候,~~潜~~井河露出河床底部,那些咸咸的卤水注入羊子岩附近的河中,就像墨汁滴入清澈的水杯,河水因此会被染黑,像极了一幅写意的水墨画,成为当地的奇观和著名景致。卤水日夜流淌,~~潜~~井人砌井把泉卤圈起来,引入各家各户的盐灶中,经过熬煮,就成了远销江汉的白花花的食盐了。

~~潜~~井因盐而生,中坝遗址亦因盐而兴。昔日,~~潜~~井河在~~潜~~井镇附近的许多盐井,至今仍有少量矗立在河边村庄中。这些林立的盐井,据说最盛时有72口之多。那时,~~潜~~井镇的家家家户户都汲取卤水,在盐灶上煮盐。现在这些古老的盐井,虽然早已被废弃,可那存留

下来的几口井,依然是当地村民们日常生活的依靠。从井中取出来的井水,虽然不再用来熬盐,却被拿来做饭、洗衣、淘菜,因为水中的盐分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那里的人们都健康长寿。

2003年,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行将上涨,使中坝和沱井将成泽国之前,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忠县文物管理所发掘了中坝遗址附近的一口古盐井。这口古盐井由石条砌成,井盖则由大石板镶砌,凸起的井沿上早已被昔日卤桶的提绳磨出若干凹槽,井盖上则被古人的脚印踩得光滑发亮。考古者在发掘这口井时,发现它太深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到底。这口井的井口和井壁直径并不大,且越往下越狭小。考古者们发现,这口井井口标高海拔136米,井底标高海拔116米,井深达20余米,先民们的开采难度可想而知。

令人惊讶的是,此段沱井河河面冬季最低水位一般约海拔129米,井底负于水面13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卤水是怎么被发现的?无井时代的古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卤水的?这些萦绕在考古者脑海的疑问,为后来的崔教授的考察所解释。考古者们认为:早先盐泉确实可以流出地面,因盐井的位置正好处在地球岩石的断层地带,此段基岩一直在下沉,意味着盐泉也在缓慢地下移,而河床则易堆积、易升高,经过几千年的沉积上升,致使盐泉渐渐沉入地下了。

综上所述,中坝所在的沱井镇一带不但产盐,而且上古时候的盐卤就在地表出露,这就为专家们确认中坝遗址属于盐业遗址提供了环境依据。那么,有什么直接的依据来证明这里是古人留下来的制盐遗存呢?

考古者们设想:如果那些尖底杯和圜底罐是与制盐相关的工具的话,那么上面或许



考古者发掘的中坝官井

残留有一些盐分,俗话说,“雁过留影,人过留痕”,通过检测器物上残留物的微量元素,或许能为世人揭开这个谜底。

于是,考古者们展开了国际合作,终于在 2005 年 8 月,中坝遗址的制盐猜想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实。下面是一篇报纸对这一研究成果的报道,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盐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可分离,我国最早的盐业生产在哪里进行?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继平副教授通过艰辛研究,为世人揭开了谜底。他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Rowan Flad 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王昌燧教授等合作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论证了我国盐业生产的发源地,而获得这一成果的研究方法也是国际首创。

据介绍,朱继平副教授与 Rowan Flad 博士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他们的合作论文《中国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和化学证据》,第一次通过科学论证证明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盐业生产发源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的中坝一带。世界著名综合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网络版已于 8 月 22 日全文刊登这一研究成果,该刊印刷版将于 8 月 30 日刊出。美国《新科学家》杂志也已联系作者,于 8 月 27 日进行专题报道。

两位研究者在盐业研究领域采用了国际首创的研究方法,他们对在长江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进行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 射线晶体衍射分析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时,找到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盐业生产的科学证据,证明井盐最初的发源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一带。

1000 多年前,世界著名的宋代卓筒井就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盐都”自贡也在此区域。因此,考古学界往往认为四川盆地中部是中国早期井盐的发源地。中坝遗址是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中国考古学家初步确定为古代盐都,但是一直处于推测阶段没有科学证据,朱继平副教授与 Rowan Flad 博士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关于早期盐业生产的空白,对国际盐业研究也贡献巨大。朱继平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开辟了盐业研究领域的新途径,这一研究成果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科技史教授王昌燧认为,盐业问题一直以来比较难分析,说不清是发掘出来的文物中含盐还是地下水本身成分中含盐。从未有成功地运用科学鉴定方法确定遗址与制盐业的关系。他说,中坝遗址中发现的与制盐业有关的陶器外层都不含盐,内层含盐,排除了盐分来自地下水的可能。

既然尖底杯和圜底罐可以确认为制盐工具,于是有的研究者开始设想,既然文献记载四川盆地历来采用煮盐的技术,它们是否就是早已失传的商周时期的煮盐工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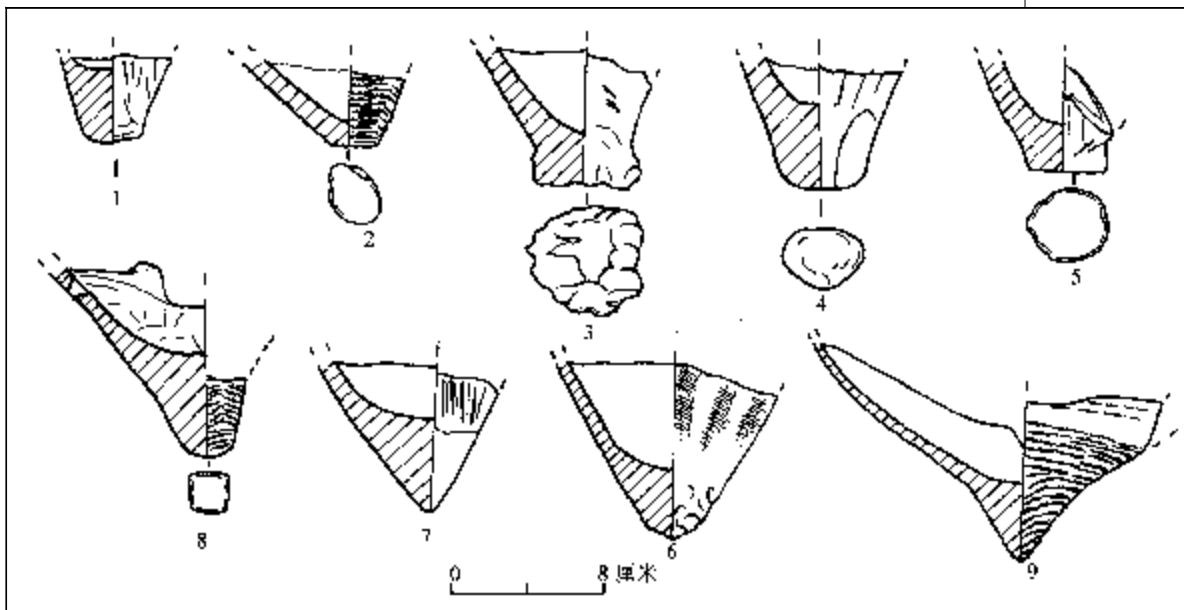
2000 年,郑州大学考古队发掘了忠县邓家沱遗址。在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出土的器物中,尖底杯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在一个面积不足 60 平方米、体积约 20 立方米的单位中集中出土 2 万余枚,而其他类型的器物则不足百件。在这 2 万余枚尖底杯的厚约 40 厘米的堆积中,从上到下看不出有层次之别,而且近三分之一是完整的,有不少完整器是套叠

在一起废弃的。根据发掘者的初步观察,尖底杯整体火候差别明显。一般底部火候高,呈灰褐色、灰色或红皮灰胎。上部火候低,多呈红色,易碎,在清理过程中难以保存。

李锋教授认为:这种现象难以用烧制过程中摆放位置不同来解释。因为无论如何摆放都无法达到大部分器物一半呈还原焰一半呈氧化焰的烧制效果。他说:“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在盛有液体的情况下再经火烧后形成的,这种液体就是盐卤。”李锋教授进行了一次实验,他将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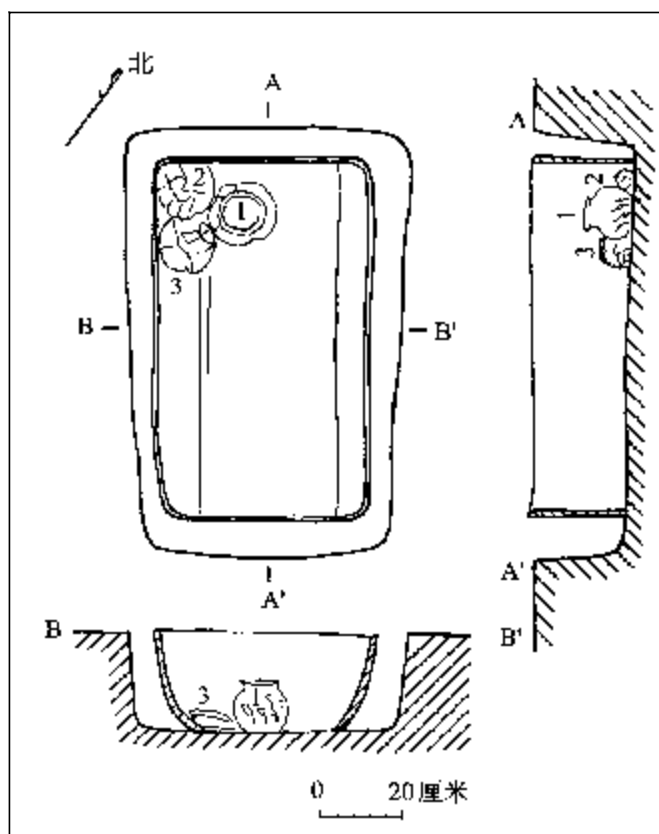
瓦渣地遗址发现的西周陶窑:它可能专门烧制制盐用尖底杯,但也不排除就是早期的盐灶。



中坝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尖底缸底部线图



中坝遗址发现的东周时期水槽遗迹



中坝遗址发现的“水槽”线图

的一只尖底杯装上盐水，置放在烧柴做饭后的炭火上，发现不足40分钟，杯内的水就全部蒸发，器壁上留下发白的盐粒，略加刮削，便可集中到底部，非常容易采集。由此，他认为，尖底杯就是煮盐的器具！

但是，如果说尖底杯是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圜底罐是西周中晚期至战国的制盐器具，那么中坝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尖底缸呢？这种敞口深腹尖底缸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主要器物，考古队曾安排两位有丰富经验的山西技工对这类器物进行拼对、修复，但经过近3个月的工作，一件也未能修补起来。孙华教授认为，尖底缸与尖底杯一样，也是制盐器具。

有关中坝的谜还有许多，如果不能加以解释，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坝的制盐工业。这些谜当中比较重要的有：

“窖藏”之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灰坑和窖藏，它们关系复杂。“像中坝这样密集分布和关系复杂的情况，在其他遗址中很难见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智彬先生说。它们用来储藏什么？怎样储藏？目前还没有答案。

“墓葬”之谜：在对春秋战国时期地层的发掘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类长方形的坑，坑壁用黄色黏土加工，内壁常常留有灰白色钙化物的遗迹。最早发现时，他们把这类遗迹定性为墓葬，但随着发掘的继续，这类遗迹日渐

增多,却始终未见人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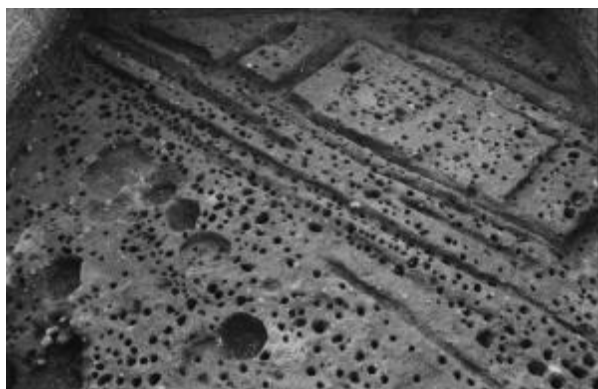
“柱洞”之谜:从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地层,专家均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柱洞类遗迹。这种“柱洞”十分密集,在一个探方内有几百、上千个,可谓密密麻麻。直径约5~10厘米。孙智彬说:“这种遗迹现象,我们从未见到过,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记载。”

“房址”之谜:中坝遗址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房址,这些房址一般不太规整,房屋内有很多密集的“柱洞”,并且有大量的灰烬。它们是古人居住的房屋或是制盐的作坊?

“龙窑”之谜:中坝遗址发现了十多座长条形的“窑址”,自商代到汉代都有发现。这种“窑”与我国东南地区发现的烧造早期瓷器的龙窑很近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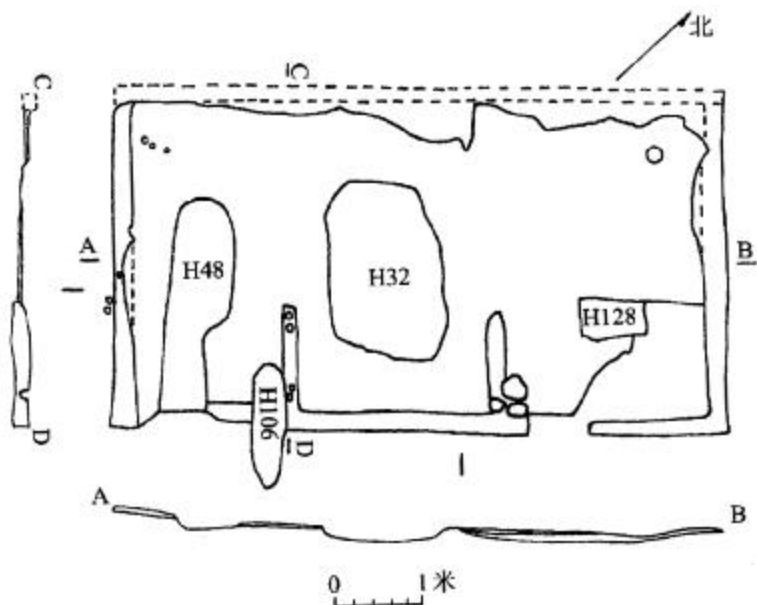
人们对于尚未认知的事物总是冠以“未解之谜”,如果我们将中坝的众多谜与盐业生产相联系,或许就能解开这些谜了。



中坝遗址一个探方内发现的密集的“柱洞”



中坝遗址发现的制盐作坊:白色硬面可能是制盐沉淀物



1997年发掘的中坝作坊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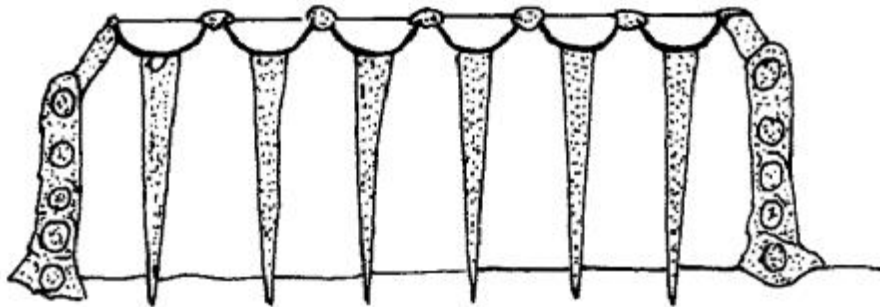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发现的“龙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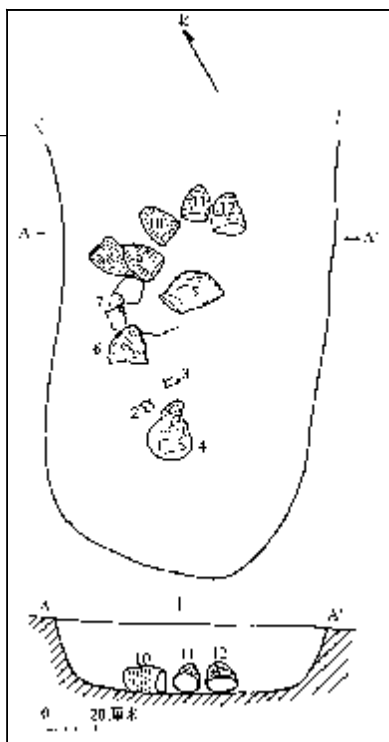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水槽”内的圆底罐

首先,尖底杯和小花边口圆底罐这类器物,应当与制盐工业相关。2001年,一名法国盐业考古专家指出,这类器物的底部,与他在非洲看到的盐业生产工具十分相像。但它是否就是煮盐的器具呢?不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人类学专家巴盐(Bar Ian)教授提出:尖底杯可能是制作盐块的模子和运送时的容器。这一看法无疑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民族志材料显示:澳洲的新几内亚 Baruya 部落在制盐时,将湿盐放在模子中夯实,最后形成非常结实的盐块。东非 Kibiro 人将锅放在石支架上熬煮,当盐开始析出时便捞出放在大的圆锥状容器中,这些锥状的盐干了以后变得很硬,可以运到市场交换农产品。那些主张尖底杯是煮盐、晒盐工具的学者,无法回答下列问题:在整个重庆地区,迄今已有上百个遗址发现了这类器物,且遍布长江、乌江、嘉陵江,只是涪井河附近的遗址数量最多而已!人们无法想象在巴渝大地,到处都飘扬着煮盐的盐火!那么,将这类器物理解为制作盐模和盛盐的器具,并由盐产地运输到各地进行交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考古专家在中坝的发现表明,尖底杯和小圆底罐都有逐渐变得大小一致的现象,这是适应商品生产标准化的需要,更是买卖过程中计量等值化的需要。

其次,那些坑壁涂抹了黄色黏土的新石器时代“窖藏”和东周“墓葬”,应该是当时盛放卤水的卤水池,因为黏土可以防漏。先秦以前制盐应当还没有引卤设施,人们需要将盐泉处汲取来的卤水加以储存,以便制盐时使用。考古者们在“墓葬”内发现了很多圆底罐这类单一的器物,它们应当就是舀卤的工具。“墓葬”坑壁的白色附着物,不是埋藏过程



非洲尼日尔曼歌地区煮盐窑炉示意图



中坝遗址发现的蓄卤池线图



涪陵镇安遗址出土的炮弹形尖底杯：杯身有二次受火的痕迹

中受浸染形成的。物相分析显示,这种凝结物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即食盐形成过程中沉淀析出的钙化物硬层。同时,我们知道,制盐的关键是分离水分,所有的工艺流程都是围绕提高卤水浓度工作开展的,直至提出净盐。盐卤储存在这些坑里,经过风吹日晒,可以自然蒸发掉大量水分,有利于下一步制盐时节约燃料和时间。非洲坦桑尼亚西部的一些地方,19及20世纪时Uvinza的制盐者就用靠黏土壁制成的储存槽来浓缩卤水。

第三,“柱洞”和“房址”应是当时制盐的设施之一。考古学者们发现,“柱洞”的大小,刚好可以放置下一只尖底杯,如果是小圆底罐,也可以平稳放置其上,这正好解决了尖底杯和圆底罐的放置问题。此外,考古者们经常发现,一些尖底杯上下颜色分明,这应当是先在洞底搁置刚燃烧过的木炭,利用炭火余热为尖底杯加热所致。尖底杯内盛放的“液体”是从盐灶上的“盐锅”内转移出来的盐卤,这些盐卤在盐灶上经火舔舐后,已经达到快要结晶的程度了。倒在尖底杯内后,利用“柱洞”底部的炭火或平铺在地表的炭火(堆至杯身一半高左右)余热,很快就将残余的少量水分蒸发,形成了盐晶。由于现代制盐工艺中要添加松散剂,所以多为散盐。而古代没有这种添加剂,所以尖底杯内的盐显得很坚硬,其形状与尖底杯一致,这就是直接可以拿去贩卖的盐模了。

房址内的灰烬应当来自于盐灶熬盐的燃料,其作用有二:一是用余热加速盐晶的结晶过程,形成盐模;二是可以提高卤水浓度。中坝遗址的灰烬为有规律的多个薄层,呈大面积水平分布,明显是人工形成的遗迹。现代化学分析表明,草木灰中的可溶性盐,能与盐卤中的钙离子或镁离子发生反应生成氯化钠,从而进



中坝遗址发掘探方内的灰烬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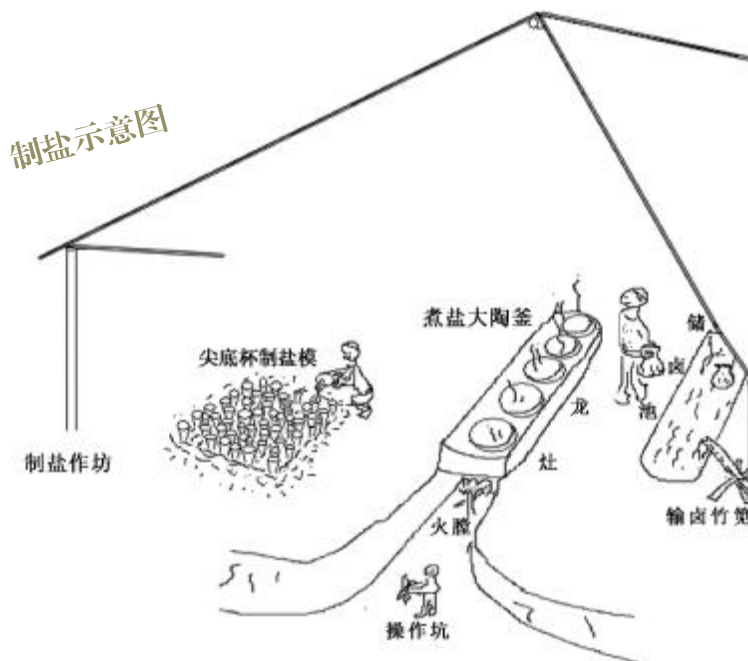


羊子山出土的制盐画像砖

一步提高含盐量。

据《熬波图》、《天工开物》等文献记载,我国在明代以前主要用淋煎法生产海盐,即先把草木灰水平摊在海滩上,再引海水浇在草木灰上,使析出的盐花附着在草木灰表面,然后再刮取这些高盐分的盐灰放入坑中,再淋水使盐灰溶解成卤水,然后把卤水放入锅中煎煮。结合这些文献记载,我们认为,中坝发现的上述遗存应是淋煎法产盐的遗存。

第四,“龙窑”就是熬盐的盐灶。早期龙窑多发现于我国东南地区,主要是为大规模生产瓷器而发明的一项技术。东南地区的龙窑最早可到汉代,而中坝遗址的所谓“龙窑”能早到商代,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窑”,这就让人有所疑惑了。在商周时期的中坝,既不产瓷器,“龙窑”能起何作用呢?上世纪50年代,西南博物院在成都附近发掘羊子山遗址,发现了一块汉代的制盐画像砖。画像砖左下角有一盐井,井上有高架,挂着起重用的吊桶,四人站井架上以辘轳汲卤。高架旁边有储卤的器具,并有一竹筥过山溪将卤水引至右下角的灶上。这口灶呈长条形,下有火口,灶上有五个大灶孔,孔上放置有五个釜。此场景描



述的虽是汉代制盐情况,但对于中坝的“龙窑”却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可以认为,中坝的长条形“龙窑”与汉代画像砖上的盐灶是十分相似的,呈狭长形,顶部可以放置多个大陶釜(大圜底陶罐),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灶内热量,并且扩大生产量。可惜的是,中坝盐灶的顶部已坍塌,我们现在难以找到实物证据了。但是,在一个长盐灶上顺势摆五口大锅的情况在现代的宁厂盐厂还能见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龙窑”的属性。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复原中坝遗址先秦的制盐场景:

人们将露出地表的盐泉采汲到中坝,倒进储卤池中,经过若干风吹日晒,储卤池中的卤水已经少了很多,显得很咸了。人们从盐灶中撮出一些烧过的草木灰摊到地上,然后用陶罐将卤水从储卤池中舀出来,淋在上面,待干后又淋少量的卤水使盐灰溶解。经过这两道工序,卤水的浓度已经提高了很多。此后,人们再将经过淋灰的卤水倾倒在盐灶上的大陶釜内,盐灶孔内的火苗从前部一直燃烧到后部。陶釜内的卤水在逐渐变浓,人们不时往里添加卤水,直到快结晶的卤水将要盛满。他们认识到,不能让卤水在陶釜内结晶,不然他们就取不出那些大坨的盐块来,否则只有打碎这个不易制造的大陶釜。舀取盐卤的时机可是一门学问,不过中坝人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他们恰到好处地把盐卤转移到尖底杯(小圜底罐)内,并在尖底杯下堆放刚从盐灶内取出的冒着青烟的灰烬,灰烬不多的热量使尖底杯(小圜底罐)内的水分蒸发,再在上面撒几粒“盐种”,盐卤很快就结晶了,整个尖底杯(小圜底罐)内塞满了一个坚硬的盐模。这些盐模大小一致,可以直接远销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的市场上,一个盐模就是一个硬通货,当地的人们在交换其他物品时,也常以值几个盐模问价。



大花边圜底罐:可能是熬盐的锅



海盐晒盐过程中的撒“盐种”,盐种可以加速卤水结晶。

第三章 从《山海经》说开去 ——宁厂白鹿盐泉

1. 上古盐都

著名盐业史专家任乃强先生认为,巴族发源于巫山巴地,那里的盐业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巴人,“综合巴族历史兴衰、起灭之变,都是与巴东盐泉分不开的”。他认为,巫盐与巴、楚文化关系极深,并首倡巫盐文化之说。

任乃强先生的“巫盐文化”主要就是指的巫山大宁河一带的盐业文化,这里堪称盐业生产的活化石。

巫山地区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神秘奇妙而又灵光四射的区域。自 200 万年前,这里有了第一批人类活动以来,它就一直创造着神奇而迷人的文化。巫山以巫文化、盐文化以及各种有关的神话传说,成为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富集之地。

巫山的“巫”,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中。其字形为一立一倒相互交叠的两个“工”字。在众多古籍文献中,直接记载上古时代有关大巫山神话传说与史实者,当首数出于周秦间人撰写的《山海经》。《山海经》一书中多涉及到我国上古时代的南方民族,对研究我国南方古史特别是巴、蜀、楚三地的历史、地理、风俗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山海经》中有一条间接与巫山有关的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海内南经》)

此事在《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约记载: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宋人罗泌《路史·后记十三》明确指出:“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道光《夔州府志·坛庙》和光绪《巫山县志·坛庙》均记“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说明丹山很有可能就是今巫山。



三峡地区出土的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陶器：小平底罐、器盖、鸟头柄勺

孟涂“如巴苴讼”，为什么选择在巫山？原因就在于这里自然盐泉涌流不绝，得盐之易，取盐之便，吸引了夏人垂涎的目光。夏人虽有自己的河东池盐，但随着力量和势力范围的扩大，池盐已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同时，盐业生产具有巨大的利润，这也是夏启派孟涂莅巴的主要原因。

孟涂司神于巴，袁珂先生认为“孟涂之所为，盖巫术之神判也”。但实际上，孟涂“听其狱讼，为人神主”（晋人郭璞语），不过是入乡随俗，借重当地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的信神好巫的习俗，目的是为了维持夏人在当地的控制力。

《山海经》中与巫山直接有关的记载如下：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大荒西经》）

对于《山海经》的这类文字，似乎有些神怪荒诞，但如果细加揣摩，则不难发现它蕴涵



三峡地区出土的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高柄豆和灯形器



大宁河大昌附近出土的商代三羊三鸟铜尊



爵



盂



三峡地区出土的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商代大口缸



盂



封口盂

三峡地区出土的具有中原夏商文化特征的陶器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文中所谓“夏耕之尸”的“尸”字，此处不能讲作“尸体”之义，根据先秦典籍中“尸”字的习惯用例，其义应为指代“接受祭祀的活人”。“无首，操戈盾立”，应为对代受祭祀的活人所装扮之先灵神像的形象描绘。重庆三峡学院任桂园教授认为，在商汤灭夏桀的过程中，章山一战，中原地区一部分被以夏桀为首的奴隶主集团裹挟参战的农耕部族，在首领被斩败北之余，“为逃避罪”，而径直逃进了长江三峡地区，在大巫山一带定居下来。他说，这里的“故”字，主要是表明在回述余部逃亡巫山之后，“立尸”祭灵，其先灵神像装扮之所以“无首”而又“操戈盾立”的缘由。

但是，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原部族因战争原因而逃难避罪，为什么却偏偏选择了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巫山地区？究其缘故，主要还是此地虽山高水险，然而却拥有天然盐泉等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种选择，既可借地势之险而藏身避难，又可依仗盐泉之利谋生安居，这正是巫山地区对逃亡中的夏耕余部最大的诱惑力所在。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夏代的时候，三峡地区基本属于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三峡地区的三星堆文化普遍发现了少量具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物，如双耳圈足杯、袋足盂等。到了商代，三峡地区的考古文化虽然较复杂，但具有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物依然有发现，如三羊三鸟铜尊、大口尊、假腹豆等。这样看来，上述有关孟涂、夏耕之尸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应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巫山在古代又被称为“灵山”。灵与巫原本是同一个字。“灵”字繁体写作“靈”，从“巫”，《说文·玉部》解释：



有学者认为，大溪遗址就是巫觋国文化的遗存，这是大溪出土的双面石人。



三峡地区出土的具有中原夏代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双耳陶杯



三峡地区出土的具有中原夏代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觚



大溪遗址出土的彩陶筒形瓶

“灵，巫也，以玉事神。”可见，灵是一种奉玉请神的巫。《山海经》中就有关于灵山的记载。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但是在巫山地区的最早生存的有据可查的应为巫载人，他们曾在这产盐之地建立过叫做“载”的国家。《山海经》上有两条关于他们的记载。

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载国在其东（疑为西，因下文一曰在东）。其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载国在三毛东”。（《海外南经》）

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大荒南经》）

这两条综合起来，可以概括地说：三苗国的西方，有个“载国”，又叫“载民之国”，又叫“巫载”。传说载民的首领是帝舜的儿子“无淫”。那里是个极乐世界，耕地很少，却为“百谷所聚”。其人不耕不织，而衣食有余。山谷多是森林，富有鸟兽，其人不狩猎，自然就有肉食。让那些鸟兽们成群结队，载歌载舞。

“赤水”即今陕南流入汉水的丹江。三苗之国还见于



云阳大梁岩画：可能反映了早期巴人的聚落生活

《国策》，《国策》中吴起对魏王说“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其具体位置大概就在古云梦盆地（今湖北、湖南之间）一带。云梦盆地之西，正好是今长江三峡一带的大巫山地区，那么巫载国的位置是基本可以确定的。

巫载国最令人神往的就是不耕不织，人民就能生活得很好。奇哉！这是怎样的一个极乐国土？人们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各种鸟兽歌舞相处，一派安乐景象。在古代社会，这可能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翻开《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那上面说：“当虞夏之际，巫国以盐业兴”，其卤盐历史距今应有约 5000 年之久。在古人的诗词里，有“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利分秦楚域，泽沛汉唐年”的描述，无一不是赞美这里丰富的盐业资源。巴史学者任乃强、管维良都指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巫、巴民族掌握着古人类生存所需的重要资源——盐和药物（百药之中重要的是丹砂。《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冥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除了巫载外，古代巫山地区还有其他以巫著称的国家——巫咸国。《山海经》上说：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巫既是国名，也是这个国家的首领兼大巫师。登葆山，就是大巫山地区出产盐的地方。

长久以来，人们更愿意把巫载国和巫咸国想象成真正的“乌有之国”。但在今天，《山海经》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可。这两个国家的故事可能是远古人类与盐的最早的篇章。

大巫山的核心地区，就是大宁河。大宁河沿岸是让人赞叹不已的地方，那方水土是“一溪前陈，可濯可沿。众峰巉岩，如削如画”。沿着大宁河与长江巫峡交汇处上行，有风光旖旎的小三峡，小三峡以上，既有大片开阔的平坦地，又有峭壁千仞。平坦地方则是古人生产生活的地方，峭壁处以宁厂盐泉为代表，为古人带来了丰富的资源。沿河上行，可通陕西南部，往东北则通鄂西北，是古代四川盆地东部通往北方的重要交通孔道。

大宁河，古代又称为昌河、巫溪水、盐水。在三峡一带，古代称为盐水的河流除了大宁河外，还有鄂西的清江（清江的一条支流至今还称为咸池河），以及曾称为盐溪的沅井河。看来，盐水之名均因产盐之故。

《水经注》卷三十三：

（江水）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

同书卷三十四：

（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道源梁州晋兴郡之宣汉县东，入南径建平郡泰昌县南，又径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井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溪水又南屈径巫县东。县东北三百步，有圣泉，其水飞清洁石穴，并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

这里明确指出了巫溪水又称为盐水，并说有盐井，是当时整个建平郡的支柱产业。

后周时的《舆地广记》也记载道：

故北井县，晋属建平郡，宋齐梁因之，后周省入大昌，有巫溪咸泉。

咸泉即盐泉。唐代杜甫有诗曰《盐井》，感叹了盐井的盛况乃天然赐予宁厂人的宝藏。

卤中草木白，青者关盐烟。
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
汲井岁骨骨，出车日连连。
自公斗三进，转致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
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

这些文献无一不提到大宁河流域的盐泉和盐业。正是那些含盐的飞泉流瀑，使大宁河乃至整个巫山地区，遍布古人的身影，使大宁河流域孕育了光辉的古代文化。



宁厂古镇半边街

2. 白鹿引泉

在大巫山深处，那里的水叫大宁；在大宁河的深处，有一个谜一样的古镇，它今天的名字叫做“宁厂”。宁厂坐落在后溪河深山峡谷中的宝源山下，地处大宁河与后溪河的交汇口。在南北走向的高山之间，一道峡谷穿越镇的东西。

宁厂古镇现在是重庆的历史文化名镇。



大昌古镇一隅——这里历史上曾设北井县、泰昌县、大宁监



宝源山

仅仅是僻在深山,靠一些破败的老房子显然不能成为历史文化名镇。宁厂最值得骄傲的是它的盐泉和悠久的盐业文化。

宁厂的盐泉至今仍流淌不停。现在,沉寂的古镇中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唯一能听到的就是大宁河与盐泉那已经流淌了千百年的声音,一切都仿佛浸泡在一个不曾醒来的梦境中。在盐泉被发现后的几千年来,盐业一直是这里的经济产业。宁厂是一个不足4公里长的集镇,曾承载过空前绝后的繁荣与喧嚣。极盛时,这里曾有多达数百个盐灶,号称“万灶盐烟”,从事盐业生产及相关产业的人达数万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不忧冻馁,不织不耕,持盐以易衣食。”

宁厂的盐泉最早被称为咸泉。“盐,咸也。”《说文》在很早以前就给了我们这个解释。当代学者任乃强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咸字加心,为感觉的感;加水,则为减,为减退之减。故可设想,咸即古人用以表示食盐的字。”《舆地广记》中所记的咸泉大抵就是说的宁厂的盐泉。西晋左思《蜀都赋》刘逵的注中就说:“滨以盐池……出巴东北井县,水出地中,涌泉可煮以为盐。”晋代的时候,宁厂地属北井县。

这个地下的涌泉,就在宁厂。至今这泓泉水仍在汨汨流淌,从山石间倾泻而出。现在,人们把它叫做白鹿盐泉。白鹿盐泉在宁厂镇北,这里是一座山,山名“宝源山”,当地老百姓简称“宝山”。宝源山正是我们前面曾提到的登葆山。古时候,“葆”与“宝”是同源字,《辞海》上说:葆,珍贵,通宝。后来的《大明一统志》进一步证实说:“宝源山,在县北三十里,旧名宝山。”宝源山“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咸泉也”。

宝源山的盐泉在靠近山麓的地方,远远就能看见那像瀑布一样的山泉。可以想见,远古第一支人群走到这里的时候,就一定用双手捧起这白花花的清泉,他们本希望缓解长途旅行带来的饥渴,没想到这泉水却咸咸的,富含盐分。他们也没有多想,就在这大山沟里住了下来,就因为这股盐泉。

但是在宁厂人和各种史籍的传说中,宝源山盐泉的发现历史比人们的想象更有趣、更浪漫,这个故事也是宁厂的男女老幼都能讲的——白鹿引泉。

传说很早以前,大宁河一带还是荒山野岭、毒蛇猛兽占据的地方,很少有人到得了这里。住在下游河滩一带的巴山人以打猎捕鱼为生,他们经常乘着独木舟往来于大宁河上。

有一天,一个青年猎人背着弓箭,带着猎狗进山狩猎。他顺着河边



宝源山白鹿盐泉



《大宁县志》中对白鹿盐场的描述及示意图

走到一座林木茂密的大山下歇息。抬头一看,发现山顶正像一个两端上翘的元宝。猎人正看得出神,忽然眼前闪起一道银光,煞是耀眼。定睛一看,只见森林中蹦出一只白色的鹿子来,正站在河边一尊突出的岩石上望着猎人。

一般的鹿子都是黄色或有斑点,白色的鹿子还很少见到。猎人暗自称奇,不免被白鹿吸引,更加仔细地看鹿子。那只鹿子一身纯白,在阳光映照下还闪着光亮,有如冬天山顶覆盖着的白雪。猎人决心把它捉住带回去,让乡亲们也看一下稀奇。可是,还没等他行动,那只白鹿已经扭头跑出很远了。猎人于是带着猎狗紧紧追赶。白鹿身手矫健,弹跳有力,在林间像舞蹈一样。猎人愈加被吸引,始终追赶不舍。

但他追了很久也没有追上,但又总能看见白鹿。猎人感到惊奇的是,人追得紧,白鹿就跑得快,人追得慢时,鹿也慢下来。猎人与鹿子总隔着一定的距离,既捉不到,也射不到。白鹿边跑还边回头看,就像是在为猎人引路似的。就这样追啊追啊,跑了不知多少里路,最后来到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却见白鹿拐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猎人追到洞口,又见银光一闪,白鹿不见了。猎人随即钻进山洞,发现并没有别的出口,他不明白那只白鹿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猎人到底没有捉住白鹿。出洞口的时候,却见到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洞里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水。此时那山泉正淙淙地顺山崖流进大宁河,山洞距河面有几丈高,泉水飞起来恰好形成一条宽宽的瀑布。猎人正觉口渴,便蹲下身去,双手捧起泉水喝了一口。他发现那泉水的味道是咸的,而且还有回甜。他只喝了一口,立刻觉得精神百倍。猎人也不再因为没有捉住白鹿而沮丧了,干脆俯下身去喝了个痛快。

之后,猎人从河边砍来一截竹筒,盛满泉水带回家,他想让乡亲们都来尝尝这神奇的咸泉!猎人将竹筒放在家门前宽大的青石板上。跟着猎人追赶白鹿的猎狗因为口渴,围着竹筒要喝水,但因为够不着,着急的猎狗不料把竹筒碰倒,筒内的泉水便全部倾洒在青石板上。猎人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念着猎狗一向忠诚,也没有太在意。

过了一天,猎人却发现门前的青石板上结起了一层白花花的亮晶晶的盐粒,他拿手指沾上一点品尝,发现其咸味更加醇厚。他把打猎得到的麂子肉沾上盐晶,烤熟后再吃,味道更是非同一般。猎人于是知道那咸泉正是人所需要的宝物。此后便带领乡亲们,从山上林子里砍出一条路来,用竹筒把咸泉引下来,洒在石板上晒干取盐。从此山里人专心制盐,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就是白鹿盐泉的来历。这个故事在《巫溪县志》、《巫溪县盐厂志》、《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巫溪县卷》、清乾隆《大宁县志》、光绪《大宁县志》等多种出版物上都有记载。

白鹿引盐的故事最早形成于何时,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宝源咸泉,其地初属袁氏,地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上下,猎者逐之,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最迟在明朝末年之前,白鹿引泉的故事就已完全成形,因为两部《大宁县志》中引用的前朝作品已将传说写成了碑记和诗歌。如明末“夔东十三家”的抗清名将贺珍,在为宁厂龙君庙写的碑记中就已经有了这个故事的概要:“龙君庙创自汉代,相传猎者见一白鹿而逐之,遂得盐泉,始庙祀焉。”如果这个说法可信的话,则白鹿引泉的故事在汉代人修建龙君庙时就已经流传下来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白鹿引泉的故事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应当是在传说的



荆竹坝悬棺近景——说明宁厂以上的大宁河流域战国时期已经有人居住



白鹿盐泉及龙君庙



白鹿盐泉分卤板

基础上,经年累月层层加码逐渐形成的。须知,宁厂盐业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那么宁厂盐泉的发现应不晚于汉代。

千百年来的白鹿盐泉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财富,人们对这眼洞穴恭敬有加。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鹿盐泉,泉洞口刻有一条健硕的石龙,清泉从龙嘴喷出。也许人们不相信这是自然界的财富,他们宁愿相信那是吐水的龙的杰作,他们也许想,泉洞就是龙身,它还需要一个龙头。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只有传说中的祥龙才有这巨量的无尽的盐卤。他们还要给这盐泉和龙修一座庙,这座庙就叫“龙君庙”。

现在,白鹿盐泉所在的地方,就有这样一座木房,房屋把龙头罩住。虽然这座房屋看起来已经无比破败,但它正是宁厂人心目中的龙君庙。龙君庙是一座穿斗式的木结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和四壁已经露出大片的空洞。站在远处就能透过漏墙看到后面的盐泉,因为有了障碍物,泉水哗哗跌落的声音肆意地扩散。龙君庙木地板下就是一屋的平静的盐卤,虽然相隔咫尺,但它们永远也不会漫到屋内地面上来。因为在庙前,就有几十个小泉眼构成的分卤板,无数的管道插放其间,把卤水源源不断地分到宁厂各个盐灶上。龙池和分卤板是宋代大宁知监雷说设计的。外侧拦木板,在木板上开凿 30 个一样大小的方孔,后来孔眼增加到 68 眼,在孔眼外承接竹管,分泉接引,分配各灶。雷说的办法解决了卤水分配不均的问题,避免了因争卤而时发的纠纷,这既是引卤方法的一大改进,更是卤水管理办法的一大进步,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

明代潮州知府陈镇的《白鹿盐泉》一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宁厂盐泉,兹录于下:

盐井平分万灶盐,引从白鹿记当年。
行郊曾应随车雨,逐野欣逢涌地泉。
天遣霜蹄通潏潏,人从去卤觅清涟。
出山已被和羹用,玉液功名鼎鼎先。

3. 千年盐场

宁厂与白鹿盐泉还隔着一条河。从盐泉出来,过剪刀峰,绕“十八罗汉”,跨过一道晃悠悠的木索桥,西进后溪河,便来到了盐泉古镇——宁厂。宁厂镇,坐落在后溪河的深山峡谷之中,南北高山横亘,东西峡谷透穿,街道偏窄,依山傍水,三面板壁一面岩,古称“七里半边街”,镇上建筑古色古香,多数楼房系竹木结构,不少临河而建,下面斜立木桩,桩上支撑木楼。这些悬空的房屋,称之为“吊脚楼”,貌似东侧西歪,有倒塌之险,实则牢固耐用,无倾覆之忧。后溪河从吊脚楼下穿过,把古镇一分为二,又有江南水乡之妙。后溪河水浅流清,大片白色的卵石与天空白云相映。河坎上的吊脚楼倒映在河心,而那些条石砌就的堡坎,不知存在了多少年,依然规整坚固。

宁厂是一座简单而和谐的古镇,峡谷、远山、碧水、涓流、方石、木板……在这里,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纯粹到了极致。现在,宁厂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古镇。这个活了几千年,堪称中国最古老的小镇,由于失去了盐分,它正在死去。在宁厂,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循环,从盐卤如何带给深山峡谷以生命,到繁荣昌盛,再到失血而亡。自然、颓废、淡漠、静谧,宁厂如一位苍老得已经失去人形的老者,即使他一声不响,我们也只能低头倾听那无言的诉说。

从居住环境看,宁厂峡谷众多,地势险要,土地贫瘠,并不是人类聚居的理想场所。令人欣慰的是,盐带给人的力量将这一切都克服了,因盐而聚众,聚众而成邑,盐泉、盐灶、盐仓、盐道、盐神、会馆,无一不是盐的杰作!盐是宁厂的生命,是血液!

宁厂的生命之源就是白鹿盐泉。盐泉从崖壁上流出,成为最独特的瀑布景观,也许那是



宁厂吊桥



宁厂及后河



自贡盐场的输卤管道,由此可以想象宁厂的过虹盛景。据载,自贡的竹笕即有从巫山、彭水贩卖过去的。

中国唯一的盐瀑。盐泉经过储卤池、分卤孔、绞渡,将盐水输送到灶房熬制。白鹿盐泉的大小决定了宁厂能够成长多大。据《巫溪县盐厂志》记载,几千年来,盐泉的出盐量几乎是恒定的。“每年自溢含盐总量为1万6千多吨,多年无变化。夏秋浓度为2波美度(浓度通用计量单位)左右,冬春为4波美度左右,最浓不过5波美度,有淡旺季之分。”盐泉的浓淡变化也使宁厂有了自己的忙和闲,人们就在这波峰浪谷中走走停停。

宁厂每年溢出的1万多吨食盐,虽然数量说不上特别大,但它撒播到广大的三峡及其邻近地区,却满足了广大人群的需要,也解决了大量人群的生计问题。宁厂的盐是一种十分优质的盐,其盐泉是天然生成的白卤,透明甘醇无异味。白卤主要分布在奉节、宁厂和开县,其余的地方多黑卤,有臭味。白卤由于富含硫酸镁和硫酸钙,能治一些皮肤病和疾病。“宁厂出美女”,这是大宁河流域民间盛行的看法,大概就与当地人的皮肤好有关吧。

盐泉从龙池(储卤池)经分卤板流出来后,如何输卤显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卤水不能引到南岸,北岸地势狭窄,始终不能扩大生产规模。聪明的宁厂人采用的是渝东地区遍地可寻的竹子。他们把竹子对剖开,将其中的竹节刨去,然后将竹子再合拢,接在分卤板上,这样先进的管道运输系统便建成了。据光绪《大宁县志》记载:“笕竹,大可数握,长三四丈不等。场灶用藤密缠,由龙池接卤入笕,连缀至数十百根,上系过篴,引卤入灶,每年十月必换一次。咸丰年间有溯流运至富场、自流井发卖者。”这个方法是宋代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在孔嗣宗的主持下想出来的。为了让管道过河,用竹篴绞织成碗口粗的牵藤,绷紧固定在两岸,然后将竹笕吊在上面,一藤一笕为一虹。初引13笕,即13条虹,这13条藤与笕横空跨越南北两岸,远处看去,犹如道道彩虹,形成一道壮丽的景观,人们便称这



宁厂古镇龙舟赛,有绞笕节遗风。



宁厂古镇的现代龙舟赛



宁厂吊桥和现代输卤过江铁管道

景观为“过虹”。因虹用竹箴织成,其高度又大大超过洪水水位,用这个方法既能将北岸的卤水引到南岸,又能避免洪水的危害。由于虹与箴同音,箴者,竹在洪之上,故将“过虹”改作“过箴”。又因箴的粗藤是用箴条绞织而成,既粗又大、既重又长,要将其安装到位并非易事,施工难度极大,非用绞车拖拽不可,故而又称过箴为绞箴。

但是竹子经过风吹雨淋,特别是夏日阳光的暴晒,容易损坏,所以每年必须更换,更换的时间就在冬季来临前。因为那时盐泉出水量少,浓度却要高一倍,卤水显得比其他时候更珍贵。这样,年年换箴的时间差不多都定在10月。由于换箴是大事情,意味着一个新的丰产期的来临。这样日积月累,到了南宋时期,竟成了当地一大民俗节日,这个节日就是“绞箴节”,并被固定于每年农历的十月初一日。《舆地纪胜》云:“绞箴在盐井,引泉踏溪,每一桄用一箴,其桄与箴经一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陈。郡守作乐以临之。井民歌舞相庆,谓之绞箴节。”绞箴节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了600多年,至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以后,箴箴才逐渐被铁箴所代替。铁箴是指用铁管引卤,铁管耐用,生产周期可



宁厂圆锅灶



宁厂土锅熬盐场景复原图

达 10 年之久,但铁管的重量大,需要架设铁索道或铁索桥,绞筴节的习俗亦随铁筴的出现而逐渐消失,往后的 70 多年里,为铁筴和篾筴并存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篾筴越来越少,但并未很快消失,直到解放后的 1959 年,南北两岸才全部改为铁管输卤。

卤水进入千家万户后,并不直接进入盐灶,需要先储存在卤桶内,然后再按需煮制。宁厂的卤桶是木质的,非常庞大,堪称天下第一桶。卤桶一般高约 2 米,直径约 2 米,桶壁都是由大树锯下来的大木板合围而成,外以三圈粗大的竹箍加固,每一个竹箍有 20 多厘米宽。这样的一个卤桶可储卤 6 吨多。在高大的卤桶内舀卤显然是一个问题,为了便于将卤水输送到盐灶上,宁厂人又在卤桶下部钻孔加管,这样就可以将卤水输送到不同的灶上了。

卤水已经走到它的最后一步,下面就是如何将其熬制成盐了。由于宁厂地区从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工作,我们无法实证那里先秦以前的制盐方法,或许与中坝相似吧。《巫溪县盐厂志》为我们介绍了今人所知的宁厂几种熬盐方法:砂锅制盐、土锅制盐、平锅制盐。据说,这三种制盐方式代表了制盐工艺的三个发展阶段。

平锅制盐是一种现代制盐技术,只有几十年历史,是 1949 年以后才广泛采用的技术。其特征是使用平面钢板作坩锅,钢板斜置,让卤水自上而下从平锅上流过,卤水快速蒸发而得到盐。平锅制盐必须有足够大的火力,一般下面以煤炭燃烧,现代有的以电加热。平锅制盐以塔灶高炉的形式进行。



巫山县城发现的汉代陶灶,这种双排的九孔陶灶在峡江其他地区较少发现,可能是当时盐灶的模型。



汉代酿酒画像砖上的灶

土锅制盐实际上使用的是圆形圆底铁锅,因其垒在地面,与平锅相比效率低下,方法相对较原始,故称土锅。土锅制盐一般是在平地起长灶,一端有灶火口,灶身沿纵向排列五个大的圆灶孔,上承大铁锅。土锅制盐的灶两个常修建在一起,可以扩大规模和方便操作。宁厂土锅灶的燃料多用山上砍来的柴薪,自清道光年间开始逐渐改为烧煤。

据说砂锅制盐的历史最长,已有四五千年。至迟 20 世纪 40 年代,宁厂仍有用陶制砂锅熬盐的人家。方法是用小陶罐做坩埚,通常把十多个陶罐架成一排,盛满盐泉水,在依土坎挖成或用石头垒成的灶上熬煮。待砂锅里的水蒸发完毕,便可得到盐了。但陶罐易碎,取盐必须先打破砂罐,陶罐成为一次性用品,因而制陶便成为制盐的相伴产业。

在今天的宁厂,仍能看到上述三种方法留下来的遗迹或遗物。宁厂制盐厂内,耸立着一座钢筋和石头筑成的塔灶高炉,一直延用到 20 世纪 90 年代。类似土锅制盐的方法至少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在宁厂,我们可以看到一座保存完好的这种盐灶,跃入眼帘的场景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这种灶在汉代画像砖上已经有其雏形了,只不过那是单排而已。同样的灶在前文中坝的制盐方法中我们亦曾描述过。砂锅制盐应当是最原始的技术之一,它的制盐工具我们在中坝的先秦时代已经见识得太多了,但它制盐的灶却并不适合大规模生产,只适合贫穷的个体制盐者,它应当不是制盐工业的主流技术。

宁厂所知的制盐工具并不仅限于上述三种。在汉代,还有一种全国通用的煮盐工具——铁牢盆,亦曾经在这里得到过推行。虽然时代久远,现在已经见不到铁牢盆了,但它却在离汉代近 1000 年的宋代现身过。

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获罪,贬官黔州(今彭水县),后又徙戎州(今宜宾)。公元 1101 年春,被朝廷召回,黄顺江东下,途经巫山,其弟黄嗣直正好在巫山做官,兄弟相见,黄庭坚就在县衙中住了下来,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大铁盆。这个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当时盆内种有莲花,黄庭坚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于是去泥洗涤后,辨识了其中的文字。据他的《盆记》说,这几个字是“巴官三百五十斤,永平七年第二十七西”。

对于铁牢盆 16 字的解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永平七年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年号?宋代赵明诚有详细的考辨,他说:“前代以永平纪年者凡五:汉明帝、晋惠帝、后魏宣武、李密、伪蜀王建,唯明帝至十八年,其他皆无及七年者,以此知为明帝时物也。”即东汉初明帝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

而所谓的“巴官”之“巴”,当是标志当时铁官所在之地。所谓“三百五十斤”指的是煮盐大铁盆自身的重量。因为在东汉明帝时,用于煮制食盐的铁盆是由官府统一铸造的,标志出铁盆的重量,目的在于出售给百姓时可按量收取食盐。

至于“第二十七西”,有学者认为,由于原铭文为篆书,当作“第二十七卤”讲。《说文》在解释“西”字时,就认为古文写得像“卤”。又解“卤”字云:“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安定有卤县。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汉代在今巫山巫溪一带设有盐官,所以“第二十七卤”,当为其时划属南郡的产盐之地——古巫县的编号,“卤”,即指采卤之地。



大宁河下游的大昌古镇,其城镇布局还保持着宋代大昌县的痕迹。

4. 永远的宁厂

作为一个古镇的宁厂,历史十分悠久,但其名称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就连宁厂镇的居民们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

宋代以前,宁厂所在的大昌县缺少次级行政区的文字记录。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37年),设置大宁监收盐税,“宁”字始现。宋代实行乡镇保甲制,将大昌县划分为四乡一镇,唯一的镇子叫江离镇。新编的《巫溪县志》认为江离镇就是今天的宁厂镇,这是宁厂第一次以建制的名字出现在史籍中。

元代将大宁监升格为大宁州,但没有见到有关宁厂的文献。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以大宁州直属地及大昌县地置大宁县,大宁盐场所在地属于石门里,因白鹿引泉的传说中,传猎人姓袁,宁厂被称为袁溪镇,同时称大宁盐场。

清代同治年间,四川省分全省盐区为24厂,大宁盐场始称为大宁厂。到了1931年,“宁厂”的名称开始正式出现在地方文献中。1937年,宁厂属巫溪县第二区的第四联保。又到1940年,实施新县制,改联保为乡镇,全县设14乡、2镇,宁厂才与县城所在地城厢镇一道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镇。“宁厂镇”之名由此确立。

如果仅从宁厂镇名看,远远谈不上古老。但从有关宁厂盐业的文献记载来看,又是非常悠久的。

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诏在全国推行盐铁专卖制。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政策,在全国设置了48处铁官,35处盐官。盐铁的产、运、销三项,皆由国家垄断。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以及分布广泛的管理机构,使盐铁的生产与经营全部纳入到国家工商管理体制之中,成为了政府的一大主要财源。根据史载可知,当时位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南郡巫

县设置有盐官。

东汉初期,政府在出盐多的地方直接设置盐官,主管盐税的征收,而煮制食盐的大铁盆又由官府统一铸造。前文的“巴官永平七年牢盆”便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它现身于巫山,说明宁厂早在东汉初年,就已有人在用从官府买来的煮盐大铁盆煮制食盐,抑或有贫民受雇煮盐。在那时肯定已经有和制盐相关的产业了。

到了唐代中期,为平息安史之乱,军费倍增,为资军国之用,朝廷起用刘晏治理盐政,推行就场专卖法。刘晏治盐之初,即整理场产,于全国设置四场十监,并亲自统领。《新书·食货志》说:“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即‘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络,以当百余州之赋。”位于长江三峡地区腹心的大昌县(西晋泰始五年由古巫县析置,北周时又省去原刘备所置北井县并入大昌县),即列于十监之中。当时四川盆地山南道所属井盐设置有场监的,只有大昌一处,可见唐代宁厂盐业已相当繁荣,在全国盐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宁厂盐业生产的一个高峰期。史载,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宁厂盐泉岁产盐400余万斤,外销陕西、湖北、川西等地。时人以盐营商,红极一时。据宋人祝穆《方輿览胜》卷五十八《大宁监》云:大昌县“田赋不满六百顷,藉商贾以为国”。又引《图经》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这样一个以其实力影响一方经济的地区,其集镇的规模和繁荣程度,无论怎样想象,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因如此,宋代朝廷在大宁盐场设置特殊的行政机构,称大宁监,其权限与州府同级而高于县,以监管盐业生产并征收盐税。

明清时期是大宁盐场发展的顶峰,盐业生产处于极盛时期。最多的时候,宁厂有盐灶337个,锅984口,真可谓“万灶盐烟”了。光绪《大宁县志》卷一《风俗》载:“旧志亦谓:‘士习诗书,农勤稼穡,商贾盐利,吉凶相助,有周恤之风;土地贫瘠,农末相半。’”同书卷三《食货》又记:“竹、房、兴、归,山内重冈叠岫,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扛,赴厂买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可见,当时盐业带动的商业之繁盛。“今我国家休养百余年,



大宁河大昌镇双堰塘遗址西周陶窑:可能是当时的盐灶



自贡盐场的圆锅熬盐场景



如今的大宁河两岸，树木葱茏，江水碧绿，童山已成过去。

(大宁县)生齿渐繁，英贤辈出，商贾络绎，田赋之增，咸泉之利，山川之胜，实媲于宋明。”

那时，大宁河一带与盐业相关的产业，如采煤、包装、运输等，均得到极大发展。光绪《大宁县志》卷一《物产》记：“慈竹，《竹谱》云：竹之丛生，子母相依，曰慈竹。土人种之织为盐包，以谋利。”又说，“煤炭，一名乌金。产东西两溪者，附场最近，专为煮盐之用，岁值巨万。严如煜论川盐：‘近年谭家墩出有煤洞，煤载小舟，顺流而下，更为便当。’盖指此也。其西南乡亦多产煤处，陆运舟载，供城乡炊爨之用。”在运输方面，清代大宁河“小舟自盐厂至巫山，水程二百八十里。小舟上下运载盐米杂货，至两河口则运煤薪而已”。大宁盐场的盐远销千里之外，雍正年间，四川实行计岸授盐，“由大宁场运巫盐至大江沿岸，有巫楚计岸9处，即巫山、巴东、秭归、兴山、长阳、鹤峰、恩施、宣恩、长乐九县。至长乐岸途程最远计1240里。”故有“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之誉。

民国时期，由于川盐济楚等客观条件，大宁盐场依然生产繁忙。大宁盐场的生产规模与云阳云安盐场接近，位列川东前两名。因雨季卤水浓度太低，宁厂要停产半年。即使如此，宁厂依然聚集了大批相关人员。据民国《四川盐政史》载，大宁场时有产业工人8000名左右，加上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员当在万人以上，如每人供养2~3人，食其业者亦有3~4万人之多。此时，大宁盐场历史最高年产量达10798吨，一般年产在6~7千吨之间。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这是唐代杜甫记夔州妇女的《负薪行》诗。这些柴薪实际上主要卖给盐场。大规模煮盐对林木需求量极大。单在明代以砍伐林木供大宁

盐场专用的各省流民就达一二万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六“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清代大宁河沿岸“柴块居积如山,用以熬盐”,“土人砍取薪,编列牌号,逐渐至场,利可倍蓰”,后山“嗣以人稠用广,斧斤频施,尽成童山”。所谓的“童山”,就是山上没有草木,裸山。这种大规模的砍伐活动,导致大宁盐厂两岸童山秃秃。清代晚期,随着熬盐采用煤炭,这一环境问题才有所缓解。

盐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使人民得利。一些大的盐商和灶户大量聘请工人,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他们压榨剥削工人的劳动。此外,由于盐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支柱,政府也往往实行很严苛的盘剥政策。《明正德实录》卷二十二载:“四川盐课,大宁最上,云安、仙泉则上次之”,也就在明代正德年间,大宁盐场爆发了盐工大起义,其肇始就与明王朝统治者对该地灶户盐工实行高压盘剥政策直接相关。

1949年之后,宁厂盐业公私合营,原先的数百眼锅灶合并为四个大型车间。宁厂仍为巫溪县最主要的经济支柱,生产昼夜不息。河里舟楫相逐,河道近于堵塞;岸边人来骡往,码头货物成山。后来通了公路,公路上运盐运煤运粮的车辆也是穿梭不息。但是,随着现代盐业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宁厂的盐受到海盐的强烈冲击。古代蔚为大观的大盐场,在现代不过是一个区区小盐厂而已,加之受到规模和低卤水浓度的影响,成本较大,效益低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千年宁厂终于倒下了。如今的宁厂古镇只有残垣颓壁,只有老人和小孩,还有那不知道世道变迁的白鹿盐泉,仍在执著地流淌。



引到现代厂区内的盐卤



宁厂已破败的龙君庙，曾经无比珍贵的卤水，现在直接排入河中。

第四章 大山里的盐业基地 ——云安镇的兴衰

1. 白兔井的故事

如果说宁厂是上古盐都,那么云安就是历史时期的三峡盐都。现在,她也成了一座即将消亡的古镇。云安镇在重庆市云阳县,距离云阳老县城 15 公里。云安镇因盐而立,因盐而兴,因盐卤的消失而衰老,又因三峡水库工程而没。今日再往云安,老街古庙已无影无踪,盐井卤管更成昨日回忆,可以看到的只有倒灌的白茫茫的长江水,只有在高处的一些新楼房里,还可以找到迁居者,向人们述说云安旧日的掌故。

云安镇位于内陆的大山内,幸好有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河流将她串了起来。这条河虽然小,但却是长江的一级支流,而且是一条名气很大的河——汤溪。汤溪河发源于巫溪县,贯穿了云阳县的全境。

早在 1000 多年前,汤溪河就已经名见经传了。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曾提到:

江水又东径瞿巫滩。即下瞿滩也,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



云安民居,透着昔日的繁华。



汤溪河一景



清澈的汤溪河与重见阳光的古代制盐作坊

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其县。

文中的汤溪水,就是现在的汤溪河,可见汤溪河得名甚早。汤溪河历史上也曾被称为东瀼河。明嘉靖《云阳县志》载:

东瀼河,县东一里,自汉中万顷池出,经五溪巡河,云安盐场入大江。

依照其流经地域和方位看,此东瀼河即汤溪河。历史上叫做东瀼河的不止这一条,奉节县的草堂河也曾以此名。据《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九称:

东瀼,在县东北,流入云安场下流入江,以水在东而名,非奉节之东瀼也。

从文献上看,汤溪之名要早于东瀼之名出现。东瀼河之名估计始于唐宋时期,为汤溪河的别名。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把汤溪河单独大书特书,是因为这条河出产盐卤,因为有了盐卤,

才有了我们要重点介绍的云安。同样,因为有了盐,汤溪河就显得很重要了,也对它的水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唐代,汤溪接近云安的 15 里河段,“澄清如镜,舟楫无虞”,可以安全航行。但靠近长江口的 15 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到清代后期,“小舟运载可至云安塘”。汤溪河一直是云安盐场运输的重要航道,无疑是云安的生命线。

云安镇位于一个小盆地的边缘,汤溪河穿镇而过,把镇分为南北两岸。汤溪出峡谷后,在这片相对平坦的盆地内显得婉约而抒情。它在云安镇的场头,用优美的弧线画出一大片浅色的卵石;到了镇中部一带,又随意地抛洒出秀气的长滩;接下来,又在岸边勾描出一处银白色的沙滩。

汤溪的名气并不在于它的美丽,而是它盛产的盐泉。据《水经注》记载,汤溪“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众多盐井中,以白兔井最为著名,是云安盐井的始祖。在传说中,白兔井有着悠久而动人的故事。

公元前 206 年,汉王刘邦为准备与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采纳谋士萧何的建议,与将军樊哙入蜀召兵纳贤。这年秋天,他们来到时称巴郡胸忍县的现云阳地界募



1949 年前的云阳白兔井。图为井架、滑轮、储卤桶、汲卤工。



云阳出土的半两钱范，说明秦至西汉早期，云阳的经济活动较频繁。

兵，但收获甚微。原来是一个来自中原的名叫扶嘉的秦遗民，在人民群众中做反战宣传工作。由于扶嘉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带了进来，深受老百姓爱戴，人们都愿意听他的话，当地人都不要去当兵。刘邦又气又爱，决意把他收过来当谋士。

恰好有一天，樊哙在云安一带公干，当时他正饥渴难耐，突然看见一只很大的白兔从河滩前跑过，立即张弓搭箭向白兔射去，白兔被射中后并未立即倒下，而是负箭逃跑。樊哙紧紧追赶，白兔跑到山坡上一片草丛中，突然就不见了踪影。樊将军也跟着钻进草丛，不料却摔倒在地。原来这里很潮湿，不远处还冒着腾腾白雾。樊哙顺手将草拔掉，却冒出一汪泉水来。他正觉渴得慌，捧起就喝，发觉又涩又咸，但同时又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樊哙回去后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刘邦，刘邦知道这是难得的上好盐泉，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

资。于是刘邦通知附近的老百姓,要他们开发盐泉。

群众闻讯赶来,围着刘邦看盐泉。刘邦注意到其中一个看上去像北方人,气质高贵,与众不同。刘邦对着那人突然直接喊:扶嘉。那人一惊,承认自己就是扶嘉,表示既已被识破,任由处置。没想到刘邦却对他礼仪有加,要封他做官。扶嘉对刘邦不计前嫌、礼贤下士的态度很感动,但他又不愿离开,只想过平安日子。

刘邦于是尊重扶嘉的选择,答应不在本地征兵,但要他率领群众凿井汲卤、开发盐利。于是扶嘉主持了盐井的开发,以大量优质的盐输往前线,为刘邦的统一战争作出了贡献。

扶嘉派人在涌出地表的自然盐泉周围,以土石围筑成井口,向下挖掘,直到卤水涌出。在开发盐井成功后,以白兔引领樊哙将军发现盐泉的事迹,扶嘉把第一口井命名为“白兔井”。而天下一统后,刘邦感念扶嘉和胸忍百姓开发盐井、支援军队的功绩,以樊将军追赶白兔,看见云雾缭绕,而天下百姓终得安宁为名,将白兔井所在地命名为“云安”。

白兔井的传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与宁厂白鹿盐泉的发现惊人一致的地方。其实,在渝东各地,凡有盐泉分布的地方,都有一个动物引泉的美丽传说,可谓是有盐泉必有传说,但将这些传说汇集到一起时,便会发现,这些传说全是一个模式、一个样子、一个套路,连动物引泉的时间都很接近和雷同。不同之处在于有的说是白鹿,有的说是白兔,有的说是白羊,还有的说是白斑鸠。于是,有的人对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认为至少有一些地方的传说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之作。不过,虽然人和动物都有嗜盐的本能,但是动物的一些器官经过长期的演变进化,对某些物体及其征兆特别敏感,再加上草食动物的觅食习惯总是头朝下,嘴接地,不停地在地面寻找食物,为区分食物与杂物,还往往先用鼻子闻一闻,或用舌头舔一舔,这样,这些“找盐能手”就有可能先于人类找到盐泉。由此看来,动物引泉的传说又有可能是真实的、可信的,其关键不在于人类是否需要动物的引见来发现盐泉,而在于被动物引见的时间值得商榷。

动物引泉的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这些白色动物尤其让人感兴趣。问题是,为什么引泉故事的背后,不是黑色动物、黄色动物呢?或许对于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吉祥;或许,白色是盐的颜色,尤其受到产盐地人们的喜欢。考虑到发现盐泉的地方,盐卤自然晒干后,



已废弃的古井长满植物根茎



云安古盐井井口壁石条

容易形成白色的盐渍,远远看上去,容易形成似像非像的动物。在大地的颜色中,白色也是最吸引人目光的颜色。当人们径直发现它,或追赶动物的过程中,晃眼一下,极易被认为是白色的动物。

白兔井虽然已废弃多年,但依然挺立在云安镇的南岸,后来的云安盐厂的主要生产区内。它是保存至今的世上唯一的大口井。现在所见白兔井深有 43.3 米,口径有 3.33 米。井壁石木结构,外壁用条石垒成,内壁用木板相连为多边形,整体又成近圆形。原井房四角上有立柱,八木支撑房顶,四方无墙。白兔井的生产设施及工具比较简陋。在井口上方高 2.5 米处悬空架设云盘,垂挂耳板,两耳之间穿滑轮,绳子系挂其上,两头各系木桶一只,用手带动滑轮旋转,来回上下提取卤水。井底卤水自溢不绝。白兔井轮共设滑轮 20 架,一人一架,汲卤工人一年四季赤身裸体,腰系保险绳,靠汲卤生存。

“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白兔井开发成功后,扶嘉吸取经验教训,终于认识了盐卤的地脉。他在去世前将这句宝典告诉女儿。其女依照所说,又挖出了 9 口井,大大扩大了云安盐业的生产规模。这九口井依次是上温井、下湿井、东井、南井、西井、北井、石渠井、浣纱井、土窝井。由于扶嘉在开发汤溪盐井方面居功至伟,他死后,被人们立为“井神”。

2. 首屈一指的制盐业

“乱世能潜草莽中,叩关容易庆相逢。三秦早劝高皇定,百里先叨采邑封。似与中原同逐鹿,偏于大泽一占龙。至今汲绠分余润,市井盐鱼又一宗。”有关白兔井的传说还有不同的版本:刘邦与将军樊哙到胸忍招募板楯蛮当兵,屯军于路阳坝,刘邦由樊哙陪同再前行至云安,遇扶嘉于洞口。嘉劝刘邦早定三秦,完成大业,刘邦以嘉志在扶翼,赐嘉姓扶,官至廷尉,食邑胸忍。上面就是清人杨垟曾所作的诗,对扶嘉的功绩作了高度的概括和颂扬。



云安古盐井



远望现代云安盐场

在三峡各个产盐基地,几乎都有一座像宁厂那样的龙君庙。云安也不例外,当地称龙君宫。由于扶嘉是云安盐业传说中的先驱者,于是人们便视扶嘉为云安盐业的祖师爷,长年供奉。云安龙君宫里面就供奉着当地传说中的盐业圣祖——扶嘉的神像。最先发现盐泉的人为什么会被放在龙君宫里呢?原来由于盐卤与水有关,传说水归龙管,遂又将井神与龙联系在一起,称为龙君。云安龙君宫现已不存,据当地长者回忆,昔龙君宫正殿供案上,还立有龙君的牌位,上书“汉扶嘉先生之神位”八个大字。

在三峡各盐场,除建庙祭祀当地的盐业祖师爷外,对我国历史上曾对盐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十分崇敬,同样建庙供奉,年年祭祀,视同井祖。云安盐场由于传说与刘邦、樊哙有关,因此,在建龙君宫的同时,还建了一座高祖庙,供人们对汉高祖刘邦及将军樊哙进行祭拜。

在云安,祭祀井祖的民俗——龙君会,已成每年的定制和盐场必不可少的传统节日。龙君会的形成与盐业生产息息相关,但这还仅是盐业生产中的一个方面,在制盐生产过程中,产盐的多少,除卤水的数量和浓度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是火力的大小。当然,工艺、设备及人工的操作技能也很重要,但卤水浓度的高低与火力的大小乃是制盐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要素。所以除祭祀龙君外,云安还有举办火神会的民间习俗。火神会在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节日期间,当地官员、士绅、民众都要出席,十分隆重。



考古发现的制盐窑灶



云安昔日的制盐作坊



考古发现的储卤池,上面有白色附着物,是盐卤的沉淀。

白兔井又被称为大井、祖井,是我国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大口浅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云安后来开凿的盐井多有白兔井的影子。云安人工凿浅井,口径大的呈八边形,直径3米多,小的呈四边形或圆形,直径不到1米。井最浅的有25米,深的达70米不等。凿井时,先选定井位,向下挖至1.6米处,始钉贴木板保框,以后随下随贴,直到卤水涌出。依据井身大小深浅,设计成多边、方、圆等形状。

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云安盐井逐年增多。汉代时,云安只有10口井,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宋代。宋以后,原有的井卤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逐渐新凿了多口盐井。首先就在河的南岸增开章井。乾隆八年前,又开东桥井。乾隆九年,又开中源、长源等35口井。乾隆九年后,又新凿井82口。到了民国时,云安盐井数量达到极盛,最多时有126口井。

在古代,要人工开凿一个深达几十米的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凿井的费用高昂,一般人家很难开凿盐井。据新《云阳县志》记载,清朝末年的时候,一口上等井需要银元6.61万元、中等井8680元,下等井1430元。因此,大多盐井都是由多人合资开凿的。

云阳井卤明清时期采用谁投资、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井权、卤权均为投资者所有,故清代云安的盐井数量突然大增,与这一政策的施行有极大关系。一般按井总投资额、总股数、总滑轮架数、股权由原主权人分摊,增架不增股。同时,拥

有卤权者自煎、出租、转卖听便。以 1929 年时每股卤水为例,上等井(4 波美度左右),每年租银元 60~100 元,中、下等井(波美 3 度及以下),年租银元数元至 10 元。

云安盐厂盐灶的类型多样,有单灶、堽灶、田灶等。单灶以柴薪作燃料,灶呈方形,前低后高,火力直达灶后部,火门较大,便于加放柴薪。灶上安置大圆锅 1 口,配灶工 1 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 年),云安有单灶 120 座,清雍正八年(1730 年)增至 159 座,是单灶发展的高峰。单灶是迄今所知云安最原始的灶,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后逐渐消失。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为适应烧煤的需要,灶户王天渭、陶正帮赴郁山盐场学习“烧堽法”,回来后遂将单灶改为堽灶。它是在单灶基础上,用卤水浇淋泥砖,在灶后垒成“堽”形,在表面铺上煤渣,利用余热浓缩卤水,提高产量。堽灶开始只有 1 口大圆锅,配灶工 2 人。清代末年,又将堽灶灶身延长为长条形,变为一灶四锅,产量较以前有了极大提高,而灶的数量却反倒有所下降。堽灶在烧堽时,将余热集中在笼子内,温度可达 500~600 度,不断泼以原卤。熄火后,将笼子挖出,打碎沉入原卤,卤水浓度可提高 1~2 倍。

堽灶煎盐,色质较差。为此,1914 年又改堽为“田”。田灶改烧卤为灌卤,增辟出烟孔,灶身进一步加长。烧田时,逐日将原卤灌入“盐田”上,用余热蒸发部分水分,每 10 日挖“田”1 次,浸泡 1 天,再入锅。田灶可以放置大小圆锅 6~8 口,灶工增加到 10 人。此外,进入现代以后,云安又出现了火管灶、塔炉灶、平锅灶等。

云安盐场传统煮盐的锅是圆锅,乃用含硅的生铁铸成,圆形、敞口,底面呈球状。大锅直径达 1.42 米,重 350 公斤;小锅直径达 1.13 米,重 175 公斤。卤水从井中提出来后,用笕管输送到各家各户。笕管传统上用楠竹打通竹节制成,利用地形自然落差由井铺设至灶,如转弯处则安“别支”,可使笕管向任何方向铺设。储卤设施以前一般用巨大的黄木桶,圆形,可容水 600 立方米左右。盐田缩卤的土砖淋卤完毕后,则用一种叫做大“冰桶”的工具浸泡出卤。



考古发现的云安盛卤的水槽



邛崃县出土的反映汉代制盐汲卤场景的画像砖，与云安盐场一样，都采用了以轱辘提卤的方法。

盐井的出卤量一般较大。根据具体情况，云安人确定在每一井上安多少滑轮数量，最多的可以达到 20 架。汲卤的工人视滑轮多少而定，一架滑轮，咸井 6 人，淡井 4 人。1930 年平均每灶有汲卤工 8 人、跑井工 4 人、巡查工 2 人。汲卤最初以“炷香”，后来以“滴漏”记时，到时鸣钲交换。交换一次为一轮班，每昼夜 36 轮，一人汲 6 轮支付一日工资。有时钟后，咸井汲 4 小时为 1 工时，淡井汲 6 小时为 1 工时。汲卤桶一桶卤水重 5~6 公斤，一般大井每小时可汲 170~180 桶。过去，汲卤工手脚为卤水所渍，以致皴皱脱落，苦不堪言，民谣有“头顶千斤耳板，脚踏万丈深渊，热天汗如雨下，冬天冷如冰山”流传。

云安的盐除了煎卤之外，还有另一种不见于古代四川盆地的产盐方法。《水经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盖蜀火井之伦，水火相得，乃佳矣。”这种能直接煮盐的石头就是固态的盐矿，它很少直接暴露在地表，除了在岷江上游边远山地的汶川县外，就只有汤溪河了。这些石头溶于水能产生大量的盐分，可见云安盐卤资源的丰富程度。

云安不仅盐卤资源在渝东地区首屈一指，盐的质量也名声斐然。早在六朝时，云安盐就已经赫赫有名了。《水经注》说：云安盐“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寸大小的伞子盐是什么样子。清康熙中期以前，云安盐场以柴薪作燃料，生产柴花盐。柴花盐色纯白，颗粒均匀适中，质量上乘。据传这种盐曾于唐代被列为贡品。康熙中期以后，由于逐渐改烧煤炭，所产之盐被称为“炭花盐”。炭花盐色泽清白，比较细，间有少量杂质，但依然是“川盐上品”。

3. 三峡盐都

云安由于产盐,早在西汉的时候,其所在地就设县了——胸忍县。北周时,将县治由万户驿迁至汤溪口,将县名更为“云安”。到了唐代,以云安盐的重要地位,太宗在云安盐场设云安监,以收盐课。宋元时期,云安监一直隶属于云安军。

以白兔井为首的云安盐井,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究竟流出了多少盐卤? 又有多少盐卤熬成了盐? 这些数据可能我们永远也不可不知,但是一些基本数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象。

早在宋代时,云安盐就已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了,那时,云安监年产量约 814 000



云安盐场出土的南朝至宋代瓷器



云安盐场遗址出土的明清青花瓷器

斤。明代洪武年间,云安盐产量突飞猛进,是宋代盐产量的2倍多,达2 124 620斤,到弘治时年产盐更是达2 490 000斤,是宋代的3倍。但是盐产量的过度增加,意味着燃料的大量消耗,云安附近的山林几乎都成了童山。到了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终因柴薪奇缺,产量大幅萎缩,仅产67 200斤。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终致停产。

清初,为恢复和发展云安的盐业生产,开始鼓励私人凿井熬盐。又由于逐渐采用以煤替柴,解决了燃料的问题,云安制盐业逐步恢复,并有较大发展。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盐产量达13 000 000斤,是明代年最高盐产量的5倍,也使云安一举跃入四川最大的盐场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令川盐济楚,产量又有较大增长。清末,由于改一锅一灶为一锅多灶,云安日产盐70 000斤,年产盐达创纪录的24 600 000斤。

宣统三年至民国24年(1935年),云安盐的年平均产量约为31 400 000斤;其中颇有戏剧性的是,1920年云安地震,盐井卤水变丰,导致年产量提高10%左右。第二次川盐济楚期间,云安年产盐达49 400 000斤,创造了历史纪录。

从以上冗长的数据来看,云安盐的产量在三峡地区首屈一指,其他盐场难以望其项背,堪称“三峡盐都”,甚至与川南的自贡井盐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又有人将它与自贡并列为四川两大盐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靠盐的则吃盐。盐业为地方乃至国家的财税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学者估算,清代盐业正课加上各项摊派,每引可高达百两以上岁银,一个年产量有2000吨的盐场,实征岁银便可逾百万两之多。在宋史传记中,有一位名叫李周的御史,曾任过云安知县。他在任上时,为安抚百姓,免征盐课达百万之多,此举还得到了皇上的赏封,由此便可见其一斑。免征且百万,实征之数就可想而知了。总之,盐业生产事关国计与民生,稳定的盐业生产,既是当地贫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府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又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为古代“下川东最巨之盐场”,清代云安围绕盐业生产谋生的灶户、佣工、商贩等在十万人左右,光是专为煎盐运送煤炭的就有上万人,“业此谋生者无虑万数”,因此,“邑人食盐利多,男女付贩”。在明嘉靖时,云阳“邑共九里,场家则四里,县家则五里。于四里煎丁优免以责,供煎于义为当”。可见,云阳县的盐业人口几占全县人口的一半。

“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筋力登委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食盐是生活必需品,许多人都在围绕它谋生。大诗人杜甫寓居云安,目睹汤溪河畔运盐船队穿梭如织的繁忙景象,在《负薪行》诗中为我们记录了反映劳动妇女不辞辛劳,不顾生死,上山砍柴,到盐井负盐贩卖的情景。当地的男孩长大成人后,或扬帆远行,或在山间奔波,或投



杜甫雕像。杜甫一千多年前在云安的见闻诗,成为今人研究云安盐业史的重要资料。

身盐场养家糊口。“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便是杜甫在云安的亲身见证。经营盐业,销量大,获利丰。渝东自古以来就是产盐区,富商多出自渝东,而且多为盐商。如被称为“三蜀大贾”的龚播,《太平广记》卷四百一《龚播》就记:“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为业。”就是靠贩盐而致巨富。盐业使当地人摆脱了落后状态,生活在渝东地区算比较富足的。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诗赞叹道:“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

由于盐业生产的繁盛,云安的商品交易也极发达。唐代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载云安:“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云安甚至超过县城,成为域内最大的城镇。正如民国《云阳县志》所云:“蜀盐之利,比于全国,率在中上,县盐务之于全蜀,率于如此,然任土所出,于县境食货,实为大宗,利之所凑,食其业者,自卤主、煎户、运商、肆夥、汲拽、都养、泊乎沿江煤窿、舟挽、驮驱、转移执事于其间者,无虑数万人……亦为县境一大都会。”一代代的商人运盐出川,又带回本地没有的物品,使峡江内外的交流逐渐增多。



云安水巷子街



明月坝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



明月坝遗址出土的唐代莲花纹瓦当

云安的盐除了本地销售外,还一度远销重庆、成都、渝东南和鄂西等地,这样,除了本地人在云阳贩运食盐外,还聚集了大批外地人来此做各种生意。在明代中期以前,盐业生产一直处于官方的严格管理之下,由具有特殊户籍、承担产盐徭役的灶户充任。到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逐步将盐井卖与私人;至清代,更是允许私人开凿盐井和从事盐品交易。于是很多外地人携资到此投资。一时间,云安镇商贾云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地商人依靠自己手中的资金实力和特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行业分工:江西、陕西巨贾购置井灶,湖北黄州人拽扯卤水,忠县、丰都、万州、涪陵人熬盐,茶陵人刘、张、彭、陈四姓成立“四合店”总揽运输。这些离乡背井前来开拓新天地的人,依据自己的籍贯,逐渐在云安镇上开设了各自的会馆,有陕西会馆、湖北黄州的帝王宫、忠县的川祖宫、湖南的炎帝宫等。在清乾隆时期,云安有商号 300 余家,成为川东重要的工商业重镇,富甲一方,有“银窝场”之称。

盐是云安的特殊物质,是云安人的衣食父母。如果说盐是血液,被输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那么云安镇就是心脏,是盐铺就的网络的中心。云安的兴亡,关系到好多古代场镇的兴衰。

在离云安不远的长江边,就有这样一个与云安荣辱相连的古镇——西沱。西沱是古代闻名遐迩的“盐镇”,以经营云安盐(包括自贡盐)享誉巴蜀内外。早在宋代,云安盐就通过西沱转运湖北恩施、利川、来凤一带,西沱镇就是千里盐道的起点和转运站,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更是长江岸边商业贸易往来的重镇。西沱镇上的“下盐店”就是云安盐业商史的历史见证。下盐店依山面江,与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忠县石宝寨隔江相望。下盐店建于清初,相传为清代举人杨氏所建,建筑面积达 1.3 万多平方米,现存有正厅、回廊等。整个建筑系木质结构,金黄色的木楼掩映在重重叠叠的古民居之间,别具一格。下盐店的盐仓为封闭式建筑,墙壁全用木板横装,木板与木板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玲珑剔透,古色古香。西沱镇有一条著名的云梯街,街梯直上山顶,两边则分列各式店铺,云梯街就是一

部不断运盐进山的梯子。在云梯街的下面,是始设于元代的水驿站。据说,每到夜里,停泊在这里的大都是装运云安盐的盐船,声势浩大有上百只,把整个江边挤得水泄不通。正是这些来自远方的盐,让西沱兴盛了上千年。

云阳县境内,除了汤溪河外,另一条著名的河就算澎溪河了。在澎溪河的高阳镇,有一大片平坦的土地,现在上面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居住劳作。可是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却是一处繁华的江边小镇。1998年以来,四川大学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考古发掘,他们揭露了唐代的街市、寺庙、交易市场等,城镇的格局活灵活现。这个已经消亡的唐代古镇与距此约几十里的云安镇有一些关系。考古领队李映福教授认为,这个唐代小镇,有可能是食盐集散地,或者食盐集市交易场所。他这样说是根据的,宋代《云阳县志》说,云安盐在盐渠道上(水市)起滩(转陆运),运往高阳(明月坝)这里,再转水运,可通开州、利州等地,这条盐路的通道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云安盐造就了这些古老的城镇,云安镇就更是一座闪烁着盐之精华的古镇了。

如今的云安古镇,在两千多年的繁华后,终于抵挡不住现代制盐工业的冲击,日渐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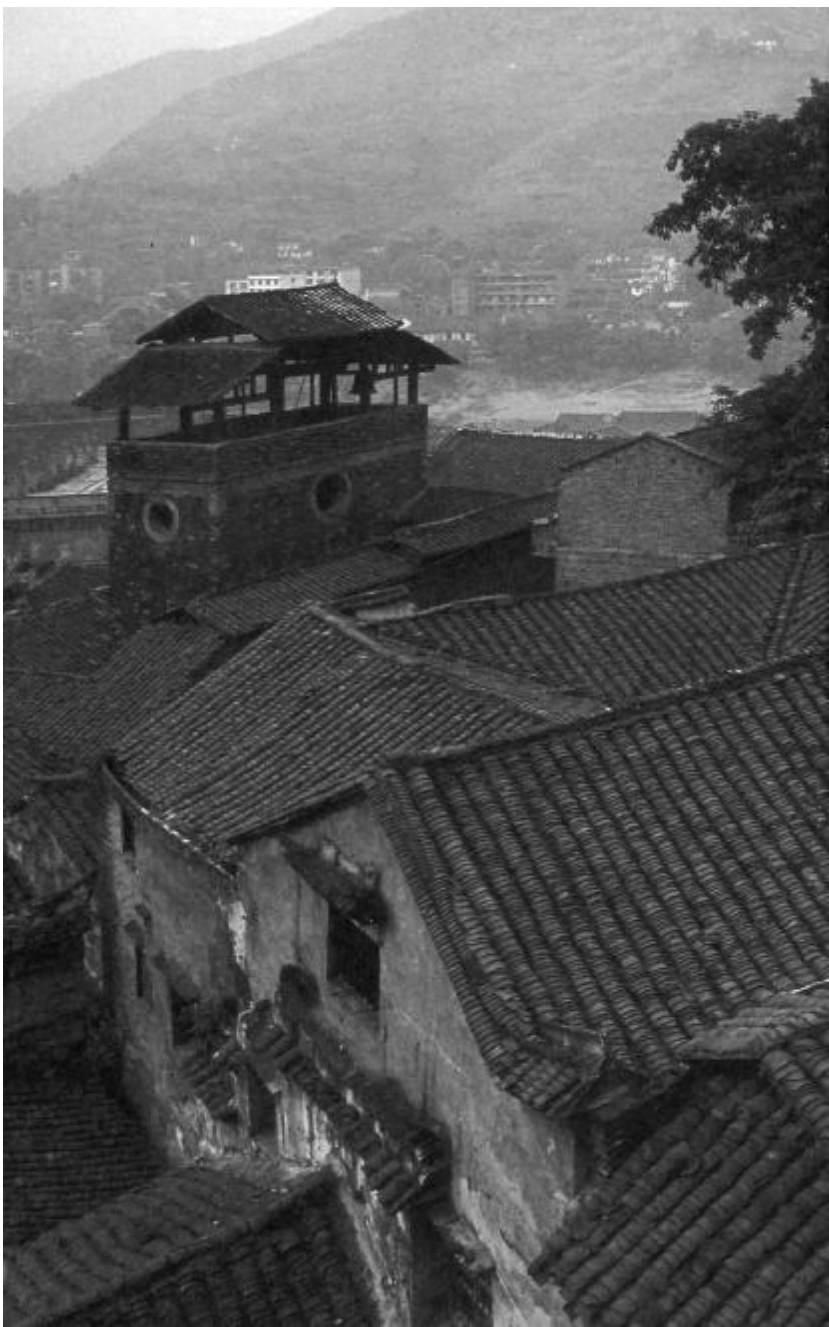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云安盐场遗址



盐场发掘现场

落了。1988年,与云安同在一个大盐矿——万云盐盆的万州高峰乡“万盐一号”井钻通后,云安的千年卤井正式废止了。自此,那些浸满卤味的盐井成为了人们凭吊的遗迹。2002年,考古者来到这里,发掘了一些远古的盐井和盐业作坊,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制盐遗迹,以及盐工们用过的遗物。考古学者的到来,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和记忆时代的开始。

云安,一个曾经富商云集,一个积淀了厚重历史的古镇,它的柜台、祠堂、会馆、龙君宫、五显庙、陕西箭楼、九间铺,它的幽深的附着青苔的盐井,如今都已沉入江底。那些盐井上的井架,提卤的木轱辘,蒸盐用的尖底锅,汲卤的桶,如今都被怀旧的人们珍藏着,但它们再也没有实际用处了。古老的云安,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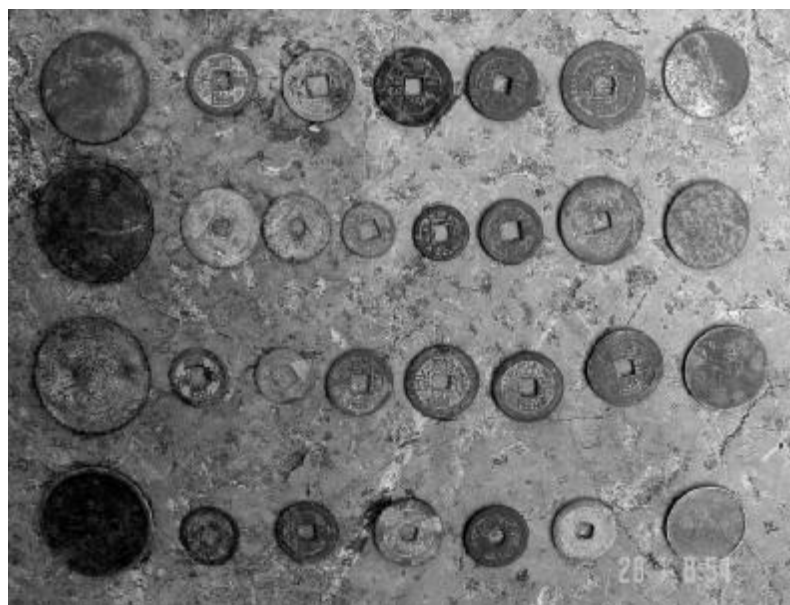
云安陕西箭楼:上面的钟声是汲卤工换班的标准时间。

第五章 巴盐遍天下

1. 川盐济楚

先秦的盐业管理思想与制度,总体上是以自由放任的思想为主体的,国家采用贡法控制盐业,纳贡以后,百姓可以自由经营。盐业管理相对比较宽松。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推行盐铁专卖制,盐的产、运、销三项皆由国家垄断。东汉光武帝刘秀时罢除了专卖制,任由百姓自己煮盐、自由贩运,国家只是在产盐较多的郡县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后汉书》载:“郡有盐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其后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很明显,刘秀之后,其盐政管理体制主要实行的是征税制,与汉武帝后的西汉时期迥然不同。此后的近二千年,我国的盐业管理基本思想一直在“官营专卖”和“私营征税”二者间摇摆。



乌江龚滩镇熬盐房出土的钱币



近代某运盐码头停靠的运盐船

对政府而言,盐业专卖的确有必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盐业专卖带来的各种收入,总体上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官员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财源,政府岂可放弃?以清代两淮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 25 项、考核正课共 9 项、不入奏考正课 4 项、不入奏考杂项 30 项、不入奏考杂费 25 项。以两淮到汉口的盐为例,一引盐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间经过清理整顿,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 12 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可见,盐对于农业社会的国家财政有多重要。

隋代至唐初,政府一度放弃了食盐专卖管制制度,任凭民间自由产销。到了宋代,引岸和专商制度逐渐形成。所谓引岸,就是分场分岸的制度,即在规定的区域内(岸),自由贩运指定产场之盐(场)。据《四川通志》载:

宋朝之制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邛州九井……夔州路则夔州有永安监,忠州五井、达州三井、万州五井、黔州四井、开州一井;云安监一井、大宁监一井,所出盐斤各给本路监,则官掌井,则士民于煮,如数输课,听往旁井贩卖,唯不得出川峡。

就是说,民间可以煮盐,但政府控制了盐井,依井交税,食盐只要不出四川,可以随意买卖。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只是在清代,食盐的销售由政府 and 专门的盐商共同垄断。民国初,改清代官运为民间自由运销,即在场完税后,听凭盐商销往各地。

按照盐引制度,三峡各盐场虽然只能就近销售,但事实上运销范围却极广。以云安盐为例,宋咸平五年(1002 年),朝廷决定其销往施州,即现在的湖北恩施地区。宋熙宁九年,又决定销济成都。到了明代中叶,云安盐仍然销往重庆,甚至更西边的茂县。

在清代,食盐在本省销售称为“计岸”,销往外省称为“边岸”。其中,川盐销两湖地区



酉阳龙旦沟廊桥



彭水县乌江万足古镇上的老铺子,昔日主要经营食盐、桐油等日用品。



清代以来,海盐采用晒制方法,大大提高了产量,对三峡井盐产生了强烈冲击。图为晒制海盐。

又习惯上称为“楚岸”。清代,我国人口激增,创纪录地达到3亿多人。三峡周边地区人口增长极快,原有的食盐计岸已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开始允许川盐销往楚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川盐济楚”。

乾隆元年(1736年),首先准许湖北建始“照例行销川盐”,次年又准巴东、兴山、归州、长阳四县在淮盐不能上运时购云安盐。乾隆三年(1738年),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州、鹤峰、长阳等七州县“改土归流”,乾隆皇帝提准:“改土归流鹤峰等七州县,就近美食川盐”,具体办法经由四川巡抚划定: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四县食云安盐,其余县份食彭水的郁山盐和大宁盐。

自清代以来,川盐一直在供给鄂西及其他周边地区,但川盐济楚曾产生过两次高峰。第一次川盐济楚高峰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占领了两湖以下的长江流域,致使海盐和淮盐上运受阻。川盐济楚的运销范围不仅限于湖北,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湘南三府二州,比乾隆时猛增十倍销售量。到了清同治八年(1869年),太平天国的威胁虽已除,但川盐仍然大量销往楚岸。导致川楚两省发生争议,经两省督抚协商,最后划定湖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和湖南澧州行销川盐。川盐销岸达到顶峰。时盐船多时竟达千余只,可谓船帮林立。在长江及乌江夹角内的渝东南以及三峡南岸的广大山区小道上,运盐力夫络绎如织,使川盐运输进入历史鼎盛期。区域经济的兴旺必然导致相关城镇的兴旺,城镇空间猛烈扩张。一些山道上的“么店子”也伺机向道路两旁建房,形成聚落进而衍变成场镇。所以在这些地方的建筑和场镇,处处均可见“川盐济楚”留下的痕迹。

此外,除了政府规定的销往外省边岸外,三峡地区尚有大量的私盐在邻近的外省泛滥。由于中国古代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使盐价奇高,很自然地就导致了私盐的盛行。私盐的规模往往较正规盐还要大。清雍正时卢询

就认为私盐“数倍于引盐数目”。三峡各盐场销往湖北、湖南、陕西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私盐的低价占领了不少的市场。

此次川盐济楚高峰前,正值海盐生产由煮盐向晒盐大规模转化后,川南盐区井场采卤迅速朝着近代机器工业转化之际,三峡各盐场受到强烈冲击,正处于困顿之中。川盐济楚的机遇使三峡各盐场获得了生机,而且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稳步发展。

第二次川盐济楚高峰为抗战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产盐区逐渐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盐产量减少了一半。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武汉告急,鄂岸盐务办事处西迁宜昌。旋即武汉失守。同年11月,鄂岸盐务办事处就近移迁万县。战事延及鄂境,商人裹足不前,济楚盐运告阻。而湖北、湖南等省的海盐销区全赖川盐济销。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七省军需民食。1940年10月,川东区盐务分局设立,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对湖北省原准盐销岸,以及川东万县、云阳、大宁、开县、奉节、忠县和彭水郁山盐场,并万计、楚计两大销岸为川东区盐务局管辖区域。

同时,为了支援抗战,因川东区接壤湖北沦陷区,对盐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井盐业的地位急剧上升。

1939年春,国民政府首先在万县开办官运业务,将川盐转运鄂西济销。1940年1月,又将川东盐务管理分局从川康盐务管理局划出,改为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负责川东及沦陷区湖北盐务。至此,三峡地区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六县产盐场厂和原川东鄂西各销盐计岸,以及原湖北准盐销岸和豫南部分地区,均成为川东盐务管辖区域。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在奉令增产赶运的同时,又对盐务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编制,截至1941年底,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共达42个之多。同时征用民船,组织押运警24队,武装护运赴鄂西、鄂北及湘西等地之盐。1943年2月,原涪河盐务运输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涪陵盐务监运督销办事处合并,成立涪陵盐务支局;湘、黔驻龚滩镇盐务督运机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龚滩盐务督销分处合并,成立龚滩盐务分局,同时增设彭水盐务分局。6月,川东区盐务管理局在鄂北光化县老河口设立鄂北盐务一等分局,所有驻于鄂北和豫南的盐务机构,均归鄂北盐务分局节制。同时还设置了“川东区鄂西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香溪盐务支局”、“川东区鄂北盐务分局鄖阳盐务支局”等,专司各地食盐专卖管制事宜。1943年,供应区域共52县:川东10县、陕西2县、鄂西北40县。



龚滩古镇,民国川盐济楚时,曾于此设立龚滩盐务分局。



现代郁山盐厂内的砖柱



郁江支流中井河——左侧为郁山盐厂。

由上述三峡地区盐业管理机构领属关系的频繁变动,以及其分支机构的渐次增设等情况,我们可以窥知,三峡地区各主要产盐井场和各主要运销口岸,在八年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领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到来之际,三峡地区各产盐井场均被激活。云阳盐场公署为增盐济楚,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食盐生产。从1939年起,云安盐场及云阳县境内的龙角、外郎等处井场共开灶102座;至1945年截止,七年中平均每年产盐23 928吨,最高年产量达24 70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对于1932—1938年七年期间年均产盐18 330吨而言,年均增产食盐5598吨,该场所产引盐运销湖北宜昌、秭归、兴山、巴东、恩施、宣恩、利川、建始、鹤峰、长乐、来凤、咸丰以及鄂北老河口、襄樊等地;所产票盐除销售本地区外,亦供应鄂西、湘西挑贩。为川盐济楚、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巫溪县大宁盐场,为增盐济楚,亦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生产。对全场每年生产和收购的食盐,必须先由盐场公署编拟计划,并上报上级管理部门核定额产,然后由盐场公署再根据核定额产分别下达各灶,各灶必须照数制盐,不得无故短产,更不准无故停产。1938年全场产盐5301吨,但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9543吨,1940年竟创历史上最高产量,达10 798吨。其销区除销巫溪、巫山两县外,主要销往湖北竹山、竹溪、房县以及陕西安康、汉阴、镇坪、平利、旬阳、白河、紫阳、石泉、凤县等地。1940年后,由湖北省第八区动员委员会与川东盐务管理局签署《运盐合约》,将该场所产食盐以每月5000担计,交由湖北第八区动员委员会运济鄂北郧阳。

开县温汤井场,抗战爆发之前业已凋敝不堪,全场盐灶已减至33座,其中能长年维持生产者不足一半。但自1938年于温泉镇改置盐场公署后,则全力集聚资本,扩大生产。有灶基而无资本开煎者,或与外来豪商富贾合伙开办,或典卖井灶以吸纳外来资金。不到两年时间,温汤井盐灶已多达72座。1938年产盐2795吨,而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上升到3875.8吨。

奉节碳坝盐厂 1938 年产盐 2795 吨,但从 1939—1944 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亦上升到 3123.7 吨。忠县涂井盐场自 1938 年后亦尽力增产,时全场拽卤、挑卤、制盐工加辅助工等总计达 1800 多人。迄至 1944 年,七年内年均产盐 588.1 吨,基本上解决了本县各乡镇的食盐需求问题。彭水郁山盐场,抗战前,每年食盐产量保持在 3 万至 4 万担(每担 100 斤)。1938 年秋,湘、鄂盐荒,郁山盐场存盐 30 余万斤销售一空。为扩大生产,1939 年和 1942 年于后灶河畔相继新凿歧井和貽兴井。抗战时期,郁盐产量猛增,1939 年产盐 50740 担(计 2537 吨),1940 年产盐 48000 担(计 2400 吨)。当时郁盐行销毗邻川、湘、黔、鄂四省 29 县部分地区以供民食。

此外,一些原已封停的小井场,在抗战爆发后也得以复产。万县长滩井场,于 1930 年被勒令停止盐业生产,但在抗战爆发后,周边地区食盐供给紧张,于是国民政府允许长滩井场恢复井灶取卤煮盐,并于长滩乡设置万县盐场场务所,隶属川东盐务管理局统领。在此期间,长滩井场前后恢复的盐井有东流井、南溪井、小井、山门井、黄金井等,烧灶制盐最多时为 23 座,有拽卤、煮盐等工人 172 人,另有水陆运煤工 1688 人。原被国民政府一再勒令封停的城口县明通盐井,也于 1940 年 8 月正式复开,准由城口县地方公营,以解决开县温汤井盐运济不足,以致食盐断绝民生困扰的问题。

第二次川盐济楚的高峰中,三峡各主要产盐井场,在制盐技术上也有所革新。1942 年,巫溪县大宁盐场,为节能增产,全场柴灶土垆,普遍改为柴灶塔炉。该年中,云阳县云安盐场于汤溪北岸试建小型枝条架一座,以利用日光、风力浓缩卤水。1943 年 7 月,大宁盐场亦于本场李家岩修建枝条架,作卤水浓缩试验;同年,在开县温汤井场,借资赴场开办井灶的共产党人郡开源,一面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一面亦积极引进枝条架卤水浓缩工艺,同时又率先对自办的两座盐灶进行改垆为塔的试验,并获得成功;是年年底,云阳盐场江南龙角樟井灶户亦试建小型塔灶煎盐。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随着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的到来,古老的三峡井盐业于衰败的困境之中再次获得生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为满足三峡地区及周边鄂、湘、陕等省县地的食盐供给,以稳定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为支援抗战前线,充分保障军事游击区的军民所需,为战时大后方国民政府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源,而且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盐遮断”的企图。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峡江纤夫雕塑



峡江木船

2. 栈道千里

蜀中盐井知多少，
功利端能与海分。
倘若此山真可煮，
商功计利更纷纷。

王十朋《白盐山》诗描述了古代四川盐业的繁盛，和人们对盐利的追求。盐作为一种商品，不但给生产者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也给经营者以巨大利润。古代的三峡食盐要销往各市场，就涉及到运输问题，而大宗运输首选船舶。杜甫《最能行》诗：“峡中丈夫绝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菑子。”就说明三峡地区人民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很大一部分亦依靠它生存发展。而这些船舶在沟通峡江内外物资的流通方面功不可没。“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盐麻等生产生活资料成为水上运输的大宗。

古代的三峡地区，主要的水上通道就是长江，一般这一段也被称为峡路或峡江道。以峡江道为主轴，各支流形成三峡交通的纵深，使广大的三峡腹地在这张叶脉状交通网络中，得以自由交流沟通。以云安盐的运输为例，以汤溪河为主线，水路运输延伸到汤溪各支流，由云安至洞村、水市口、南溪、江口、沙沱等地的运盐船，每天达 600 多艘。而这些地名，就是汤溪各支流上重要的场镇点，再由此发散出去，食盐就到了各家各户的灶头上。

除水路以外，一些陆道也成为盐业分销的重要通道。如食盐由船沿江运到今西沱镇后，起岸再翻七曜山，进入鄂西南地区。又如今巫山县城对岸的南陵山道，可达建始、恩施县，沿清江东入湖北。大宁盐即沿此途济销鄂西。抗战时期，又先后开辟了湖北香溪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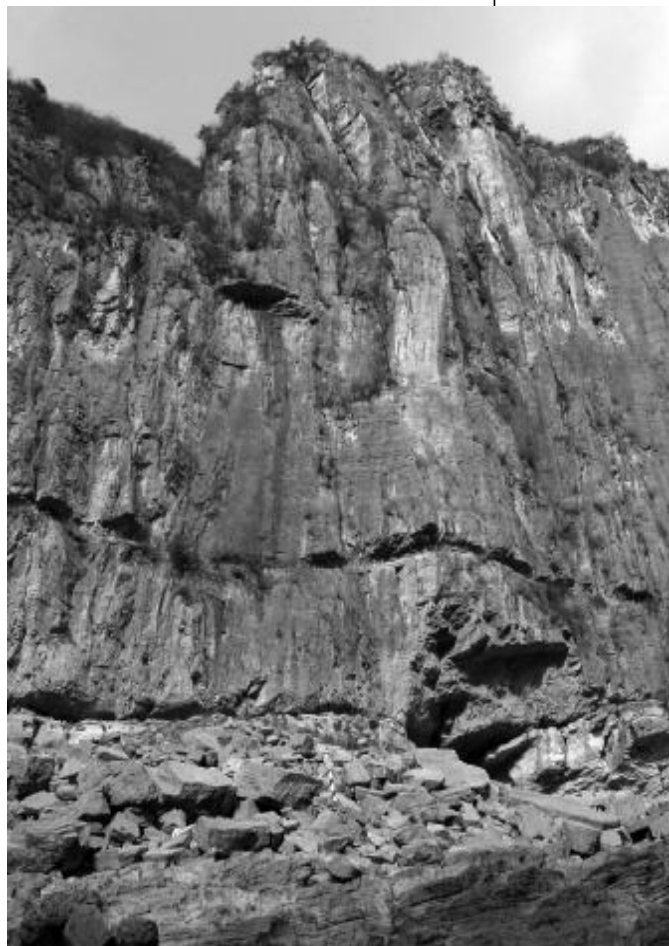


峡江道：纤夫拉船

城、大宁至湖北郧阳两线的陆上运盐通道。但总体上说,陆上通道属于水运的补充。

在三峡地区,除了水路和陆路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交通方式——栈道和纤道。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它们既属于陆行的交通方式,但往往又是沿江河开凿,既可连接两端的康庄大道,又可在水恶时上岸行走。

所谓的栈道,是指在峭石陡壁上凿孔楔木,上铺木板形成的通道。从历史文献看,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修建有栈道。《战国策·秦策》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后来《史记》载楚、汉之争说:“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刘邦识破项羽居心,“用项羽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于陈仓,雍兵败……”这就是后来戏文说唱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定三



瞿塘峡绝壁上清代开凿的凹槽式纤道



瞿塘峡栈道



偷水孔栈道

秦,劫取五国”的故事。

三峡地区自古交通不便,特别是峡江两岸绝壁夹江而起,壁立千尺。在一些特殊的江段,每遇洪水季节,川江航行中断,上下往来交通便中断。为了便于通行和运输,先人在峡江两岸留下了许多古栈道遗迹,比较有名的是孟良梯栈道、偷水孔栈道、大宁河栈道等几处。

孟良梯栈道位于瞿塘峡南岸粉壁墙一带的绝壁上,系在坚硬的绝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排石孔,全长约 136 米。栈道现存石孔共 61 个,由下向上呈之字形排列。石孔略呈方形,间距 1 米左右。该栈道据考证是南宋抗元战争时期所开凿的通往瞿塘峡口和白帝城的一条通道。

偷水孔栈道位于白帝山南面山脚,是在白帝山上开凿出来的上下错落排列的两排石孔,全长 80 米。据记载,栈道系西晋末年益州刺史鲍陋开凿,主要是为解被敌军包围后的白帝城水荒而开凿的。

三峡栈道中最可能与盐业相关的是大宁河栈道。大宁河栈道何时开凿?何人建造?



大宁河栈道遗迹,图中的成排方孔即为栈道桩孔。



大宁河栈道孔



北门村崖墓

用途如何？一直是学界争讼不绝的问题，也成为让人困惑的三峡几大谜题之一。

从巫山县坐船逆大宁河而上，在有“小三峡”美誉的峡谷西岸的绝壁上，便可看见呈水平排列、6寸见方、2尺进深、相距5尺的整齐石方孔，这就是大宁河古栈道遗址。《巫溪县志》记载：“从宁厂起，沿大宁河右岸南下，至巫山龙门峡口……岩壁上现存架木石孔6800余个。”《巫山县志》提供了更精确的数字，这些整齐的小方石孔共有6888个。2000年4月，巫山县原旅游局龚源鼎先生，带领一些年轻人对大宁河小三峡的栈道孔进行了实地考察，逐孔逐段地数，获得了“从龙门峡口至涂家坝50公里长的小三峡，共有栈道孔4288个，占大宁河古栈道孔6888个的62.3%”的准确数字。宁厂以北的大宁河尚有许多栈道孔，有学者推测，大宁河栈道孔总数当在10000个以上。

有关大宁河崖壁上栈道孔的来历，当地倒是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鲁班爷和观音菩萨见老百姓生活艰辛，决意为他们做点事，两人打赌，一夜之间鲁班为老百姓在绝壁之上修一条路，观音为老百姓做100双绣花鞋，看谁能赢。鲁班用他的角尺在绝壁上一敲，每隔5尺便一个眼，速度很快。观音在天亮之前去偷看鲁班的进度，发现他快要完成，恐自己要输，便学鸡叫。鲁班以为天亮自己已经输了，便停手，绝壁上便余下长长一列整齐的石孔。

这样的传说或许表达的是老百姓最淳朴的观点，在那如刀削般直插入水中的悬崖绝壁之上，要建成大宁河古栈道这样艰险伟大的工程，除非是天工，由常人来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大宁河栈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光绪《巫山县志》载：“石孔，沿宁河山峡俱有。唐刘晏所凿，以引盐泉。”据此文献，大宁河古栈道似乎修建于中唐时期刘晏主持国家盐政之际。但《舆地广记·图经》说：“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指宝源山咸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由此看来，大宁河古栈道修造的时间又似乎应上推至东汉永平初年。

2002年，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受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的委托，调查了大宁河栈道遗址。调查组在北门村一带发现了崖墓，给破解大宁河栈道时代之谜带来了一线曙光。这处崖墓开凿于古栈道之上，其下安装建筑构件的石孔与栈孔几乎相并，但令人惊奇的是，墓



利用原有栈孔复原的小三峡栈道。从所有栈道孔向内水平开凿的情况看,大宁河栈道似乎与诸葛亮提到的子午道栈道搭架方式略有区别。

葬的石孔内留有清晰的凿痕。这说明崖墓的开凿可能较晚,栈道的开凿相对要早一些。而这一带的崖墓一般都是东汉到南朝时期开凿的。北门村崖墓口部还雕刻有古朴的斗拱,具有东汉风格。这就暗示说,大宁河古栈道的实际年龄极有可能是秦汉时代开凿的。

战国到秦汉时代,秦巴山地开凿了很多栈道,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栈道最为集中的地区。大宁河栈道应当就是这些栈道系统的一部分。大宁河栈道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平梁式栈道,大部分开凿于人烟稀少、峡谷幽深的险恶环境中。工程艰巨,规模浩大,因所处之地人烟稀少,很少破坏,保存完好,是我国现存最大规模的古代栈道遗址。

大宁河栈道除宁厂以下的主河道外,北上的各条支流都有类似的栈道孔。从宁厂古镇沿大宁河北上,转西溪河及主要支流东溪河,东接湖北竹溪县,北连陕西镇坪,西通城口县境,形成了上千里的庞大古栈道网,这样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可以推测,这片规模宏大的栈道网,为古代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然而,这样大规模的栈道,是何人修建,用途如何,史书上却几乎没有记载。

一种说法是用于军事。有学者推测说,大宁河古栈道就是春秋时巴、楚、秦三国灭庸时,为运输兵马、粮草而开凿的军事栈道。又据传说,诸葛亮曾屯兵今城口一带,出兵伐魏时,便把准备好的木桩插入石孔中,铺上木板,沿着木板大道突出奇兵。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前赵子龙退军,烧坏刺岩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疆也。”说的就是赵云烧毁栈道,无法行军,“失利于箕谷”的事。也有人据《蜀碑记》所载,传说宋太祖出师平蜀,也曾走过这条栈道。

另一种说法是用于送荔枝。天宝年间,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爱吃荔枝。这荔枝盛产于涪

陵,为了保鲜,用专船顺流而下,送至巫山,由大宁河栈道进入陕西,用驿马络绎相送,直抵长安。故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更多人认为大宁河栈道是一条盐道。2003年,三峡盐业史研究专家刘卫国、任桂园撰文,对大宁河栈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指出,栈道以宁厂为界,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栈道应当与运盐有关,南段栈道则与引卤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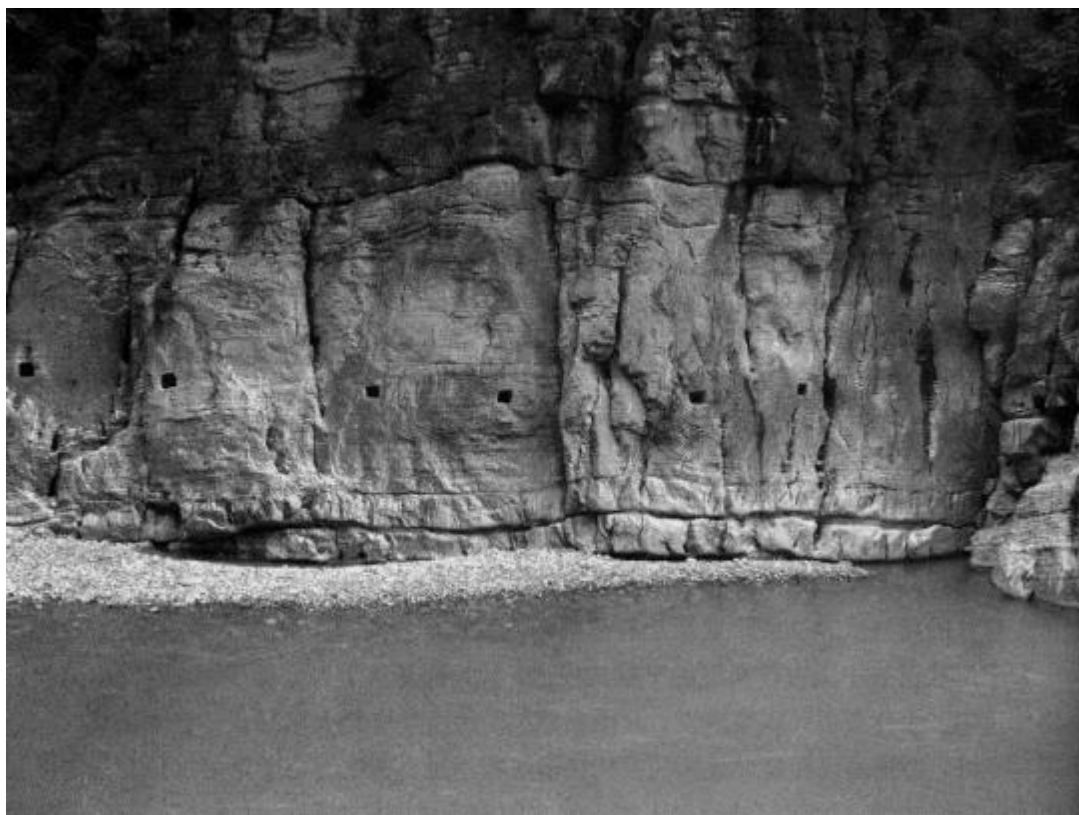
北段栈道石孔的排列有高有低、孔距或远或近、孔径若大若小、孔眼亦浅亦深,与南段石孔的整齐划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溪河荆竹峡中西岸的陡崖上,有上中下三排各自独立的栈道孔,其孔径大的有23厘米,小的仅16厘米,中等的在20厘米左右;孔距20厘米至两米不等。这三排孔主要起分岔的作用,即栈道至此一分为三:上排西进,因该段河沟不长,故石孔位置较高,以便于上山连接西去的山路;下排就地下到河边,然后涉水过河,连接河东各条山路,直至湖北竹溪县和竹山县;中排则顺东溪河西岸继续北上,至白鹿一带与湖北竹溪县羊角洞山路连接,又沿河道在白鹿折而向西,进至陕西边境与镇平县的母猪洞和小渝河山路相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说明北段栈道与各条山路实际上连成了网络,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山地交通格局。这样,就可将宁厂古镇所产食盐以及其他日用生活所需物资运到后溪河以北、大宁河上游各地及周边各省、县销区,又可从这些地区贩运回当地所产物资。正如清嘉庆年间严如煜所云:“山民饘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

南段栈道与北栈道最大的区别是:石孔位置在一条直线上,犹如用水平仪测量过的一般。但从全程看,它是按一定的坡度在逐渐下降。南段栈道在宁厂古镇的起点位置海拔高度237米左右,末端的龙门峡口石孔位置的海拔高度只有140米左右,全程80公里,自然落差97米,降幅为1.21‰,所以,在小范围内看,几乎是水平的,且中途没有高低起伏,这正是古时引卤之必需。

此外,南段栈道的有些栈孔往往通过凹崖之下,且栈孔与凹崖间的高度很难容得一人直立通过,其供人行的用途便大受怀疑。有的栈道,其崖上较缓,如为行人,可以走高处



大宁河栈道。上为清代开凿的凹槽式纤道,中间为一排古栈孔,下有阶梯接入江边。



大宁河二墩崖栈道孔

陆路,完全没有必要修凿栈道,这也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学者指出,文献记载的引白鹿盐泉至巫山可能是南段栈道最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栈孔是用于架设输卤管道的,其材质主要是竹笕。

为了解决竹笕转弯的问题,于是人们在转弯处置木盆,即文献上说的“别支”。那些栈孔密集处或多排栈孔,就是架设“别支”留下的。

秦汉时期,今巫溪、巫山同为一县,史称巫县。巫县在西汉时期即置有盐官。到了东汉初年,今巫山大昌坝和巫山县城郊等地,即在用自宁厂古镇宝源山麓引来的天然盐泉煎煮食盐,但巫山境内并无盐泉,卤水从何而来?由大宁河南段栈道将宝源山麓天然盐泉输送至巫山县,是巫山县煮盐用卤的唯一来源。从地理位置上看,巫山是巫溪盐走出宁河峡谷,运往长江流域各地的必经通道,巫山虽不产卤,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不可取代的,加之巫溪道路的艰险,卤水自流到巫山要比从巫溪运盐出来方便、经济得多。看来“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的文献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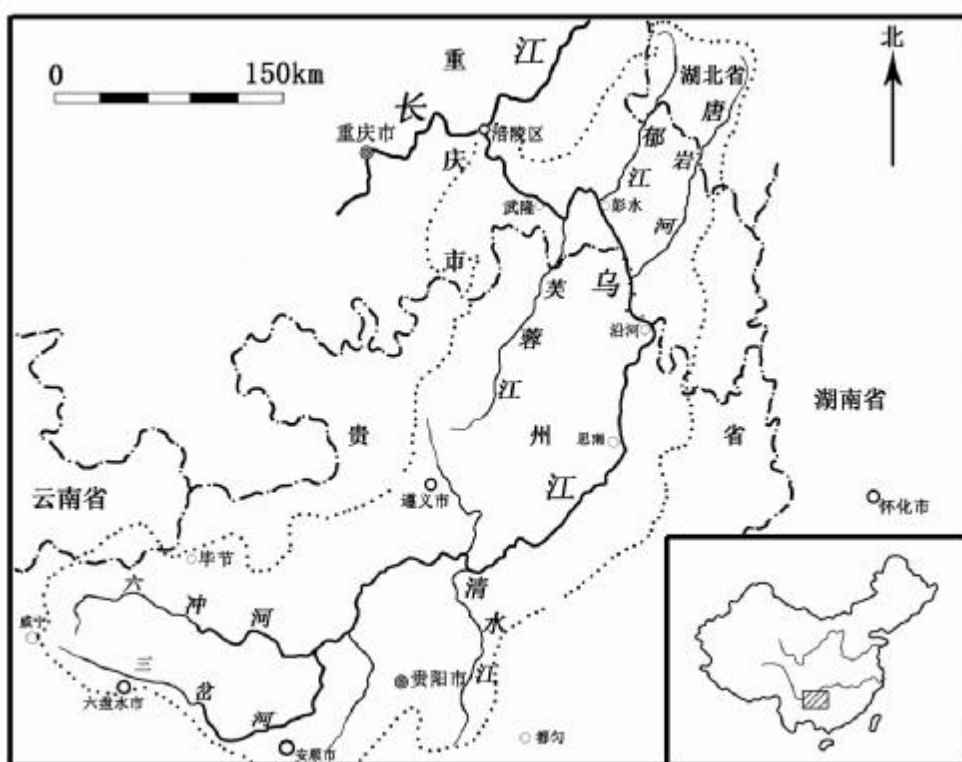
3. 乌江通道

渝东南地区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在地理上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上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其文化面貌相对较接近。这一地区,西北连长江,南界黔东北,东邻湘西北,东北与鄂西南接壤,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是古代沟通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的重要交通通道。其境内主要属于乌江水系。

乌江,历史上又称巴江、延江、黔江、涪水、涪陵江,是长江三峡地区川江流域南面最大的支流,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是渝东南地区交通的生命线。早在战国时期,秦国攻打楚国就是沿着这条线上溯行进的。《华阳国志》载:

涪陵郡,巴之南郡,从枳南入,溯舟涪水,本为楚商于之地,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乌江流域图



乌江武隆县土坎遗址出土的具有夜郎文化特征的青铜剑,可能早在战国时期三峡与贵州就通过乌江有了包括食盐在内的经济文化交流了。



美丽的乌江,左岸为清代开凿的纤道。

历史上,乌江通道一直是进兵、转输食盐、茶叶、山货等物资的交通要道。现在,我们就从这条道路的末端出发,去看看昔日的盐巴沿途留下的痕迹。

由现涪陵长江边的乌江口上行,可以看到沿岸山势高耸,江水湍急,不少地方几无人烟。乌江进入武隆县境后,在沿江的公路边,有一处顺江排列的古镇。古镇不大,也就一条小街,背靠大山,把山脚的一小块狭长形平地塞得满满当当。这个古镇就是白马镇。白马镇夹在大山里,一眼望出去,除了脚下碧绿的乌江,头上一块不大的蓝天外,就是两岸的高山绝壁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周围几乎没有人烟、没有耕地的地方,是如何形成这个小镇的呢?查阅文献资料,我们好不容易发现,原来,清



白马古镇一隅,盐泉即出于对岸纤道下的江水中。

代川盐济楚的时候,渝东地区的各盐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食盐供不应求,经营盐业者均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人们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但是,盐卤资源却是有限的。对于后来者,他们很难从生产经营秩序已经形成的各盐场插进足。正在这时,传来了武隆白马发现盐卤的消息。于是人们开始在此投资生产食盐。然而,对于一个没有生产经验的盐场来说,熬盐工艺就显得特别重要。他们熬出来的第一桶盐色泽既不好,又耗费了太多的资金。于是,人们从云安这个川东最大的盐场请来了技术能手,经过他们对盐灶的改造,以及传授各种经验技术,终于熬出了达到要求的白花花的食盐。

白马的盐卤就在镇子对岸的乌江边。每到枯水季节,江水下降,那些从岩石缝里流出来的卤水就被人们接走,运到对岸的盐场里熬煮。那些溢出的,则漫过江边的石滩,被太阳一晒,隔江就能看到像覆盖了一层白雪的石头。但是,夏季的洪水常常淹没卤源,咸咸的卤水融入江水后,被稀释得一点盐的味道都没有了,这时候,白马的盐灶就全部熄了盐烟,处在一片寂静中了。

其实,白马的盐卤早在宋代就被发现,并且那时已经得到开发。但不知道为什么,白马一度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白马的再度复活,除了机缘之外,或许与那些被盐渍白的石头有关,或许与人们查阅文献知道了这里曾出产盐卤有关。

《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四《涪州·景物下》称:“白马津,在武龙县北三十五里,有盐官。”这个白马津就是现在的白马镇,既置有盐官,就必定盛产食盐。自发现盐泉后,这里



武隆白马镇乌江对岸的纤道

很快就开始大规模制盐。“未已已有四百余灶,由是两山林木芟薙,悉成童山。”因为盐业生产的繁荣,白马津成为当时武龙县(现武隆)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草市镇。在《宋会要·食货·商税杂录》中就有记载。白马由于盐卤量少,浓度不高,再加上受江水影响较大,导致了宋以后的一度沉寂。

乌江由武隆南上,至现彭水县城附近,有一条墨绿色的河流汇入。这条小河被称为郁江。郁江是渝东南盐业生产的中心。著名盐史专家任乃强先生在其《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强调指出:“郁江上游的郁山镇有伏牛山盐泉自山麓涌出,被人类利用甚早。早在巴族尚未立国以前,即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食盐来源。”郁山镇位于郁江支流中井河、后灶河与郁江交汇处。这里一直是古代“黔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早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置涪陵县,县治即位于今郁山;三国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又设涪陵郡于此;此后,北周时奉州、黔州,隋代的彭水县,唐代的黔州、黔中道均置于郁山。到了宋嘉定元年(公元1228年),因“盐泉流白玉”而置“玉山镇”;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因避讳(代宗朱祁钰即位)更名为郁山镇;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置黔彭军民厅,辖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

郁山之所以一直受到历朝的青睐,与出产盐有关。这里以盐业产地为中心,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涪陵(今彭水县)在乌江流域最早设县,与郁盐直接相关,因盐利而聚众,聚



郁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彭水县城,其南有卤水出露,第二次川盐济楚时曾短暂开发。



穿郁山而过的中井河

众而成邑。据《晋书·地理志》，到西晋时期，涪陵郡的人口数量比巴郡还多，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谢本上表刘璋要求独立时，“求以汉发、丹兴为郡”，目的就在于郁山的盐和丹兴县的丹砂。

专家对这一地区盐矿进行地质考察后认为，郁山具备两种典型的储盐地质构造：既位于褶皱构造背斜轴部，卤水受压，易于富集；又沿断层面卤水富集并沿断层上升或渗出。郁山背斜长 100 公里，呈波状起伏，轴部开阔，两翼陡峭，盐矿储存于寒武奥陶两纪地层中。由于中井河、后灶河呈东西向侵蚀切割郁山背斜，使含盐岩层出露或接近地表，再加上多断裂，卤水极易开采。和四川盆地其他井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被著名盐矿专家袁见齐教授命名为“彭水型”卤水，其主要特点有：地质时代早；盐矿埋藏浅，多天然出露。郁山古代盐井深皆在 2~10 米之间，多建立在天然盐泉出露的基础上。郁山盐井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位于喀斯特溶洞中，如长寿井、歧井、黄泥泉井、飞水井等，这在四川井盐地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专家实地考察，郁山现存盐井有 13 口。这些盐井主要分布在郁江支流中井河和后灶河上。中井河和后灶河之间为伏牛山脉，即任乃强先生所说的“伏牛山盐泉”。据文献资料看，郁山现有的盐井最早属于东汉时期。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也曾发现一些汉墓。但是，郁山在西汉即已设县，那时就应当有比较发达的盐业生产了。任乃强认为，郁山盐泉的开发应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四川师范大学李小波在考察了郁山后认为：“郁山盐泉具有天然性和浅层性的地质特点，很有可能是井盐最早开发利用的地区之一，郁盐开发与巴蜀、荆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无独有偶，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



郁山盐井：中井河对面平房内



已破败的郁山盐厂



现代郁山盐厂盐灶



从废弃的礅礅可见郁山昔日的繁华



永定成规碑



龚滩西秦会馆建筑群

照是始为巴人。”按照这一说法,后照应为巴人始祖,比廩君还要早。后灶河是否就是因为巴人始祖“后照”在此开发盐泉而得名的呢?

弯弯古盐道,静静石板街。如今的郁山,盐厂虽已停产,但镇上那些古老的街道、商铺,还有雕刻精美的礅礅,无一不在提示我们,郁盐曾经带来的繁华。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郁山)有盐井,比年以来,井更旺而灶更多,邻省商人,行盐其地者,往往家焉。虽彭地贫确,百产不滋,彭民托业经商绝少,而卤泉涌出,利本自然,富民之挈资而来结庐而处者踵相接,衡相望也。”

郁山食盐除供渝东南地区外,还远销湖北和湖南。“郁山厂盐运赴楚之咸丰、来凤二县。”的记载便是明证。郁盐出郁江,沿乌江上行,有一处必经之地——龚滩。龚滩主要得益于乌江山险水恶。龚滩早在晋代就有县治设置于此,但明万历元年(1573年)凤凰山崩后,所有过往龚滩的载货船均不能行,需要转输。郁山盐及其他沿江上溯的川盐亦不例外。在龚滩古镇上,有块名叫“永定成规”的碑。碑文内容显示,龚滩镇是川盐入黔的重要中转站,所转运之盐称“客盐”。另外还规定了上下船搬运的力价,每包盐上载船仓的运费为5文,从船上卸运下来抬至盐仓处则每包加6文。

龚滩因为在盐业转输方面的重要地位,曾设盐运办事处,置盐务防护军。在龚滩镇上,有一座保存十分完好的古建筑——西秦会馆,相传即为陕西帮商人张朋九所建的盐号。

乌江并不仅仅是盐业运输的专道,在古代,它还是沿江人民运输桐油、茶叶、苎麻、蓝靛等物资的通道。为了改善乌江航运,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祜转奏官运盐务总局批准治理乌江,整治航道,开凿纤路。各地绅耆商民纷纷捐资集款,乌江航运大有改观。以龚滩为例,并筑闸坝数处,开凿纤道,先后共计15段,500余米。乌江纤道的开凿,使乌江自古以来作为渝、黔、湘物资交流和商旅往返的主要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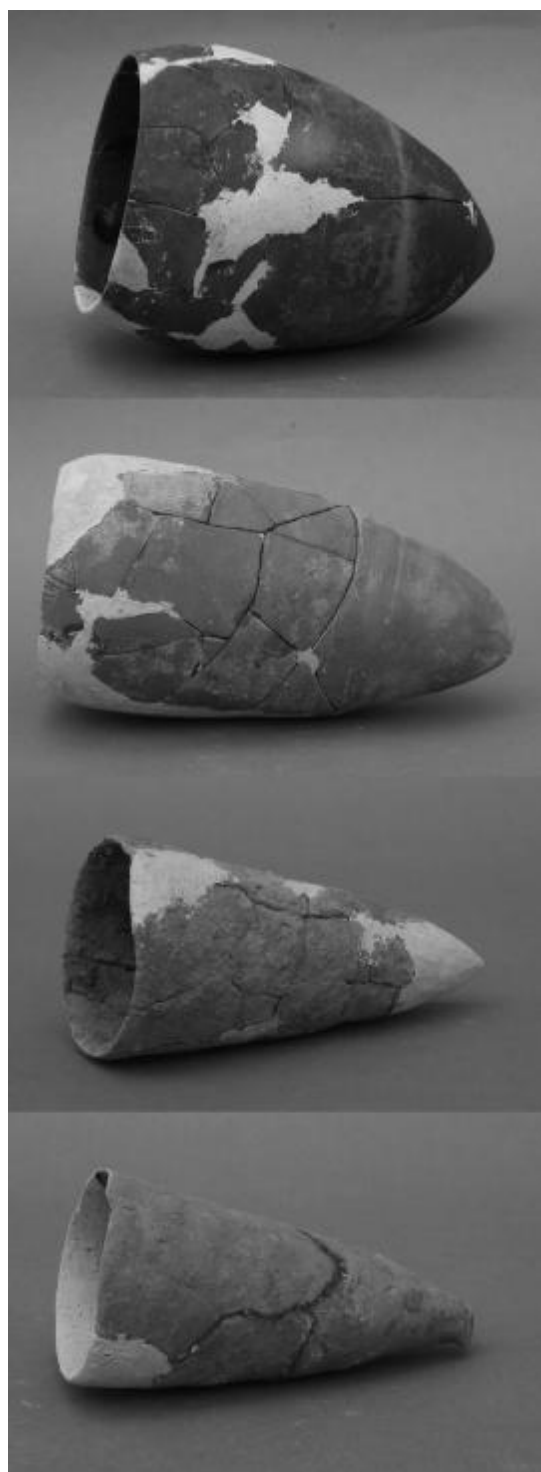
乌江纤道

更加通畅。同时也应当看到,乌江纤道是乌江航运二千多年发展的结果,是乌江流域经济、交通、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在龚滩镇的附近,有一条名叫阿篷江(也叫唐岩河)的河流注入乌江,它发源于湖北西南部。沿乌江上运湖北、湖南的郁山、富顺食盐,即转此而上。但那些往贵州的货物,则可以沿乌江继续上行。近年来,川盐行销贵州的历史,在考古者的手铲下,已经被推进到了商周时期。

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贵州沿河县乌江边的黑獭遗址发现了少量的炮弹状尖底杯,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发现,无疑表明三峡或郁江的食盐在商周时期即已行销到了贵州。此外,基本只现身于三峡地区的一种叫做船形杯的陶器亦在这里现身,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船形杯也是一种与盐有关的制盐工具。

2006年下半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酉阳县邹



清源遗址发掘出土的商周时期炮弹杯和角杯

家坝遗址、清源遗址。这两处遗址位于龚滩镇上游约 10 公里的乌江边,隔水与贵州相望。考古工作表明,邹家坝和清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人群在此活动。到了商周时期,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尖底杯和尖底盏,数量相当可观。同时,考古者们还发现了带有巴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甲骨多枚,有可能这里是早期巴人在乌江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邹家坝和清源遗址所在地并无盐泉出露,显然,尖底器并不是用来制盐的,而很可能是外地运销到此的、装满食盐的盐模!可以设想,这些食盐不仅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还由此分销到附近地区。



清源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卜甲